



引用格式:郑小九. 从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看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4): 1-8.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01-08

从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看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

On the CPC's distinctive features from "July 1 speech" by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郑小九

ZHENG Xiaojiu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结合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是阶级性与人民性、思想性与实践性、革命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是由党的政治基因、文化基因决定的,是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锻造的,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规定性。

关键词:
习近平;
“七一”讲话;
中国共产党;
鲜明特质

[收稿日期] 2021-07-20

[作者简介] 郑小九(1968—),男,河南省温县人,河南理工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历史情怀、宏大的历史视野,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望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光明前景。结合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入学习这篇重要讲话,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是由党的政治基因、文化基因决定的,是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锻造的,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规定性。

一、中国共产党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是指其工人阶级属性,即党的诞生是以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为基础的,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3}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产业工人自1894年的大约10万人发展到1919年时的超过200万人,非产业工人的数量约有4000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显现出变革社会的强大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组织、教育、引领下,工人阶级开始认清本阶级的历史使命,逐渐实现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包含以下两重含义。其一,一切为了人民,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11-12}习近

平总书记在该讲话中精辟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其中的“践行初心”“不负人民”就是党的人民性的经典表达。其二,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11}。讲话中特别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1]12},就是把民主贯穿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全过程,实行广泛的、真实的、完整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切实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与人民性二者是根本一致的统一关系。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既是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是其人民性的基础、主导。工人阶级与先进生产力相关联,有高昂的革命积极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能力的阶级。有这一明确的阶级属性作为保证,党的人民性会有坚强的依靠。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是其阶级性的扩展、补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这种拓展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力量是有限的,必须聚集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包括团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形成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够战胜敌人。这种拓展也是可能的,因为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他们都有参加革命的愿望和动力。正是以牢固的阶级性和广泛的人民性为基础,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成为成员众多、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一致、运作高效、战斗力强的政党,组织、整合、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积贫积

弱的局面。

与中国共产党相比较,许多政党不能实现或者不好实现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不愿代表或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首先,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过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同盟,而在蒋介石、汪精卫等背叛革命后,该党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沦为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其阶级性与人民性就是冲突的、对抗的。其次,就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主要是由该国的资产阶级主宰的,资产阶级通过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政治人物来实现其对国家的掌控,其阶级性与人民性也是矛盾的、割裂的。当今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虽然也都从部分低收入群体中吸收党员,但这并不表明其阶级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两党推举出的政治精英从根本上讲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看似体现大众民主的选票政治难以掩盖“金权政治”的本质。再次,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可能发生阶级性质的反向变化,如苏联共产党,苏共中执掌党内权力的部分官员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蜕化为权贵阶级,苏联共产党不能够继续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党的生命力逐渐弱化以至丧失。

二、中国共产党是思想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政党

知行合一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中国共产党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弘扬者,将知行合一升华到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所践行的知行合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信仰与行动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其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在

《实践论》中提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2]。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3}。

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首先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土壤、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人们苦苦寻求救国的出路,中国大地成了多种“主义”的“跑马场”“赛马场”,如拜上帝会、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思想并不适合中国的“土壤”,无力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无法拯救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1471}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根源在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阶级性、指导性,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3]1515},是能够把“病入膏肓”的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危难中解救出来的“良方”。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非常精辟地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13}

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要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4]610}。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做法。对此,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4]53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3}正是在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发展出、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其二,信仰与行动的统一,即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崇高信仰和切实可行的革命实践进行有机结合。衡量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否坚定、是否真诚的标准,主要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看他是否忠实地践行了这一信仰,是否心甘情愿地为这一信仰而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6]163}。一个共产党人如果心口不一,“嘴上说着主义,心里都是生意”;或者言行不一,“口言善,身行恶”,这个人就是政治上的“两面人”,就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性的理论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7]149}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坚定的信仰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共产党人

化理论为信仰、化信仰为力量,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用生命捍卫信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烈士狱中遗著《可爱的中国》中的这段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崇高和伟大。

其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即共产党人既要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又要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态度。毛泽东说:“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8]361}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理想主义者。“革命理想高于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就确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引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现实主义者,特别注重从实际出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步步把理想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实现阶段性目标、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使我们“站得更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富起来”的理想成为现实。在新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开始朝着“强起来”的目标奋力前进。在“七一”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2}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激励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引领下,培育起巨大的精神思想力量,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的党的精神谱系。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自强不息、英勇奋斗、艰苦创业,塑造出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军事战斗能力、经济发展能力、文化创造能力、危局应对能力、困难克服能力、错误纠正能力等,表现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非凡能力。

三、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性与继承性相统一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其使命是实现中国社会的革命化改造。同时,革命并不是要把旧中国的一切都破坏掉、抛弃掉,而是在否定中有肯定、在克服中有保留、在批判中有继承,做到革命性与继承性的统一。

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主义,共产党本质上是革命党,其使命是实现社会的不断革命、改造、进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6]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6]162}。革命就是破旧立新。毛泽东曾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1439}

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巨大成果,就是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全面性。我们党所理解的革命包括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19},社会革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婚姻等方面。其二,坚定性。与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其三,持续性。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一代代的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不断深入、持续推进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1]13}。其四,彻底性。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2016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共产党人要“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9]。

共产党人在强调革命性的同时,又非常注重继承性。革命是“破旧”,但不应该打破旧有的一切,也不可能打破旧有的一切。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国走向现代性、实现现代化的最高形式,这场伟大革命是发生在中国的现实土壤、文化土壤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不可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割裂,只能是流淌着“中国血脉”的现代性。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53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其他场合,他强调要延续文化基因,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精神。他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深邃的历史眼光、睿智的哲学思考,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市的朱熹园考察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0]

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处理好革命性与继承性的关系并非易事。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具有妥协性、不彻底性,其对传统的继承难以分别精华和糟粕,实现不好革命性与继承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二者关系中有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共产党人产生深刻影响,战争年代里激烈的斗争环境使得革命性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继承性,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高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在该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越来越科学、理性、从容,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1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问题作出阐释和规划,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文化立场。

四、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的政党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以被动的、屈辱的方式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统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在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在对世界发展大势的观察和把握中,以主动的姿态推进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事业。

民族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底色。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是党的民族特性的最高表达形式。《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11]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特色非常鲜明、丰富、深厚:党以“中国”冠名,由中华民族的先锋战士组成,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为己任,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现代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表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2]

国际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性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以开放的胸襟面向世界、接纳世界、融入世界,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3]^[16],志在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开创了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近代以来

西方列强的入侵造就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陷入越来越深刻的民族危机之中；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近代工业的逐步发展造就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西方列强践踏中国利益和尊严的残酷事实，使得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心生怀疑；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国人从中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力量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出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下诞生的，是当时诸多世界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必须在世界的格局之下来思考、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以开放的胸襟面向世界、接纳世界、融入世界。毛泽东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12]。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5]373}。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13]187}

共产主义事业是国际性事业，共产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相互支持、相互团结，为实现阶级解放而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成立的。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8]28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援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支持第三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将此视为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中华民族“立人达人”“协和万邦”的传统，继续践行国际主义，致力于为人类谋大同，欢迎别的国家和地区搭乘中国发展的

“顺风车”。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16}

在处理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时，民族性是国际性的前提和依托，失去民族性底色的国际性会无所依附。同时，国际性是民族性的扩展和完善，没有国际性事业和追求的民族性是狭隘的。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协调好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以做好中国的事情为基础、为载体，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进步事业。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4]520-521}，抗美援朝战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的典范，既体现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立场。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发扬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7]252}

五、结语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

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21]}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从小小红船成长为巍巍巨轮,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基因、特质,即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思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革命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

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强调,“大就要有大的样子”^{[13][67]},他期望中国共产党要有“大的样子”,大党的每个成员也要有“大的样子”。所谓“大的样子”,就是要有深谋远虑的大智慧、高瞻远瞩的大视野、海纳百川的大胸怀、天下为公的大情怀、改天换地的大抱负、舍生取义的大仁德、当仁不让的大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共产党人要心怀“国之大者”,心怀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而党的伟大是见之于平凡的伟大。一方面是伟人的平凡。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价毛泽东时说,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也是普通一员”;“两弹”元勋邓稼先,“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战争年代立下巨大功勋的甘祖昌将军,1957年自愿解甲归田,携妻带子回乡务农。另一方面是凡人的伟大。毛泽东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14],“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送瘟神》),“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既平凡又伟大的共产党员,如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王进喜、孔繁森、申纪兰、张桂梅、黄文秀等,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伟人的平凡与凡人的伟大相映成

趣、相得益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德性世界的两道奇特景象,凸显出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伟大人格和感天动地的崇高精神。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8]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9]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12-31(02).
- [10] 习近平考察朱熹园谈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EB/OL]. [2021-03-23](2021-07-1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3/23/c_1127243217.htm.
- [11]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 人民日报,2019-11-13(06).
- [1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0.



引用格式:朱荣英. 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同向发展的价值追寻[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4): 9-16.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09-08

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同向发展的价值追寻

Marx's value pursuit of the co-development of man and society

朱荣英

ZHU Rongying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没有撇开人的发展,相反是以之为核心和目的的,对社会发展的考察与人类命运的关切始终是同频同向、密不可分的,并将二者在实践价值论上内在贯通起来。全面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并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是马克思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内在规定了其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必然要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归。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就集中表现在它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有利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不仅确保了人的本质能力得以全面彰显,而且能够促进人与社会实现全面自由的同向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
人与社会同向发展;
价值追寻

[收稿日期] 2021-06-20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开放研究中心资助课题(KH2021-05)

[作者简介] 朱荣英(1963—),男,河南省开封市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与全面深化改革所引发的现代社会的加速转型,凸现了人与社会同向发展问题的现代意义。当下,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以避免“木桶效应”,如何引领社会发展从“量的累积”到“质的提升”的转变^{[1]198},以确保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1]214},犹如一个巨大的吸盘,聚集了众多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探究。有学者^[2-3]把人与社会同向发展、协同发展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首要位置加以考量,认为其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大观点,并借此检讨了以往我们把人的发展直接等同于物质丰富、经济增长的理论缺失,指出了片面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给环境造成的压力,描述了综合平衡被打破、各种差距拉大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危机。有学者^[4-5]强调要把人与社会同向发展的理论之维、理想之维与现实之维内统一起来,并对这种同向发展的社会模式、实现条件、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动态考问,认为以财富为目的的生产必然转变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生产,促进人与社会的同向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生态、新方向。还有学者^[6-7]强调要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认为不能对人的发展做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的考察,相反,人的发展问题要受到来自社会关系、思想教育、文化素养、生态权益、个体能力、社会禀赋、遗传基质等各方面综合因素的交互影响,唯有将之置于社会发展的系统结构中予以总体考量才能揭示出人与社会同向发展的科学内涵。笔者认为,唯有基于马克思实践人学维度,对制约人与社会同向发展的各种障碍、差异、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对实现人与社会同向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机制、举措进行认真梳

理,才能真正阐明个人发展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发展的人学意义。

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诉求与终极愿景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内在交融、同频同向、互动互联的问题,马克思早年就曾经注意到并进行了深入探究。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社会教育作用旨在“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8]。正是社会化的相互教育、人与社会的同向发展,人们才结成“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发展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客体的运动过程,而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过程,是人类以往的历史活动过程的积极结果,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人以自身力量不断满足自己各方面需要的历史过程。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生活的实际过程,说到底,不过是人自己追求自己的目的并通过自己的劳动予以实现的活动罢了。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也改变了自身,推动了人与社会的全面同向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虽是曲折复杂的,但总的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社会前进中总是内在地积淀了人们创造价值活动的积极成果,并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式得以整合,使得社会发展获得一次次层次上的跃迁。社会发展不是以客体发展程度来衡量的,而是以发展的结果与社会主体的价值关系来确定的。完整意义的社会全面发展,是同人的全面发展及其自由理想的全面实现同频共振的。人要在自己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发展自身、创造并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创

造价值的社会活动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形成了人与社会的同向发展。

显然,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状况与总体情形,是衡量、评价与检验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人的全面发展及其社会存在意义的普遍彰显,也只能在获得科学发展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达到。这是因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改造自然与社会,使得物为人而存在、人人为人而存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使社会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二者是互为因果、同步完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并非一种纯粹物质力量的增长,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发展与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内含着人的发展水平,全面展现了人的现代素质与综合能力;反过来,人的发展也不只是人身心方面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发展、整体素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的实践能力的不断发展与提高。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与终极愿景。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是唯物史观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关联。不仅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价值目标,而且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活动规律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民谋利、为民造福,谋发展、促发展,着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保障其各种权益不受侵害,让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一切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1]200}。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会全面发展,致力于在制度上做出重大安排,下大力气解决制约社会和人同向发展的各种关键性问题;转变发展方式以着力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补齐发展短板以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调整发展结构以确保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预防发展风险以提升全社会抵御各种突发性事件的能力,这

是当代中国通过社会发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同向发展的基本内涵。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人民主体性,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因为,历史上的人本、民本,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的,离开社会实践活动、人的历史条件、人的社会联系,抽象地谈人的发展问题,这与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具有根本区别。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内在发展,科学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规律的内在一致性,不是通过什么抽象的人性实现发展,而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的发展。实现社会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反过来,人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发展。按照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同向性,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现代社会的综合发展,从历史角度考察,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显然是一个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

人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就是人实现社会化并彰显个性化以及二者相统一的过程。这两方面的“化”,作为人发展的两端,在人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中是须臾不可分离、同向推进的,不仅在个体发展中而且在群体发展中都是内在融合在一起的。正是依靠这种融合,个人才实现了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人;而社会也给个人提供了充分展现自己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舞台,社会成为了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都成为具有独特个性的自由人。从直接的存在性状上看,人如动物一样纯粹是自然存在物。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人、实现社会化,是由于人从自然界分离后,在参与人与人的各种公共活动及其社会关系中逐步被社会同化。成长着的个人,通过主动的或被动的、情愿的或强制的方式,参与到家庭、学校、单位、团体的各种活动中,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领域,逐步掌握了从

事各种活动的相关经验与技能,这样就被社会的同化机制打磨成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无数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汇集起来,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承继的同化机制,这是社会共同体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获得独立性的发展。社会承继不同于生物遗传,生物遗传是一种简单的基因复制,而社会承继则是一种把积极的顺应与能动的改造集于一体的互动与飞跃,是社会教化、自我提升相结合的同向性生成过程。在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人的社会传承与动物的生命个体所进行的生物遗传具有本质不同,人类所开展的各种实践性的传承活动,不仅反映在人种的生物习性的自然遗传上,而且主要通过社会文化的共同承继,能够获得更为重要的社会同化与同向发展;其二,人的社会传承与其他生命体的发展情况截然不同,人依靠自身的生物遗传所得到的潜质,在生物生存的自然环境下并不能使之获得充分发展,而必须依靠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才能获得有效的激发与活化。在社会遗传过程中,个人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有机体获得有序、稳定的科学发展的有效要件,越能达到这一点,人就越能在综合性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健康发展;而社会也逐步发展成为由个性自由的人所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统一整体,使之依靠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个人的有效推动,而在正常运转中不断获得全面性的同向进化。

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与价值指归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特别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及其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取向,这是唯物史观的另一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表现在:(1)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全部社会关系的本质与基础,正是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创造了一切、成就了一切、拥有了一切,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抽象的、大写的“人”或者“历史理性”,什么也不能创造。(2)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不是由什么神秘力量支配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一切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正是人民群众推动了人与社会的同向发展与共同进步。(3)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反动阶级统治的旧社会,社会发展主要是为剥削阶级谋利益的,得到发展的并非人民群众。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发展的成果终究都要归属于人民大众,人与社会同向发展构成了该社会获得整体性发展的当然前提,当然只有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向性才能达到高度统一。

马克思实践人学认为,人的发展快慢,全面映现了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相当缓慢,社会文明水平不高。而在现代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已取得了不少成就,这主要得益于现代生产力与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大幅度提高。当然,应该看到,现代社会中人的发展并非在各个方面获得了均衡发展,这是由于社会发展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畸形发展。可见,人的发展的全面性程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步状况,人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程度。人的发展正是通过多方面的利益维护与价值肯认才得以实现的,只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全面维护、各种权益均得到了保护,人的发展才能落到实处。促进人与社

会的同向发展与不断前进,是一个双向对象化的内在整合过程。从实际发展过程来说,人的发展越快,人的素质与能力提高得越快,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得就越多,社会进步与文明演进得就越快。全面发展的社会,一定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就必然要求有全面发展的人与之相适应,因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当然要求。

人的全面发展虽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内容来体现,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主要是指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人的素质包含自然、社会、精神、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因为人的素质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能力的发展来实现的,因而人的全面性的综合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保证人的一切实际素质的普遍提高,使得自己的多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展现。一个得到了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那种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自己先天的与后天的实际能力均得到合理、正当、自由发展的人。这就要求全面培育人的自由个性,整体提高人的主体性水平与能力,全面提高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能力与水平,增强人的独特人格与气质,通过各方面的实践锻炼和高尚的精神塑造活出自己的特定境界来。可见,唯有克服劳动中社会关系的固定化、片面化对人的钳制与束缚,使人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与狭隘的职业对人的自由个性的禁锢,才能使人在自己喜爱的自由劳动中进行自由性的创造。同时需要克服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种种限制,使得联合起来的个人能够实现对他们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共同支配,在广泛的普遍的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是在各个方面与社会发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同向性发展,离不

开现代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社会关系的合理调控。这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但就其根本方面来说,则是克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旧式分工对人的限制,如果这两种限制没有得到有效克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保证人与社会同向性的全面发展呢?就其实现途径和条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充裕的物质成果,构成了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对于确保人与社会的全面性同向发展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代替一切,它只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并不直接地就等于人的全面性的发展,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不直接归属于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上。若以牺牲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为代价而片面追求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剥夺或变相剥夺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式去获得国家的强大,以高税收带来高积累,人民群众常年生活在贫困之中,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过长,必然就会影响人的个性与能力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出于解决具体的历史任务,高积累不可避免,但这种情况必须被超越,必须使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获得同向进展。其二,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社会关系的合理建构。人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人是社会的人,而社会是人的社会,人唯有在社会意义上才谈得到全面性的存在与发展,远离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谈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的全面性实现,只能陷入空想。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构建是否和谐与合理,直接决定着人的全面性需要满足的程度与方式,也直接决定着人的素质与能力能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提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离不开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否则,就只能导致虚假的幸福和畸形的生态。要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必须扫除阻碍人发展的社会关系中的不合理因素,构建高度和谐的人文环境与社会交往,很难想象人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关系中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其三,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社会交往的普遍化。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9]。每一代人都在社会实践的维度上与以后各代人相互关联,每一代人不可能舍弃前代人的生产基础而谋划自己独立性的发展。单个人的发展不能离开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而实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必然内蕴社会关系及其交往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自觉参与社会交往能力的增强和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丰富并开拓着自己的社会关系,自我打造出全面展现自己综合实力的社会舞台,当然也不断创造出完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的有效方式与可能空间,在普遍参与社会变革的活动中谋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四,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教育的充分发展。“全面发展”不等于“平均发展”,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核心,培养良好个性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充分体现^[10]。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不可能实现积极的发展,更不要说什么全面发展了。建构与完善现代教育体系,是造就现代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全程受教育的社会,学会全面学习、实现自我教育是实现人与社会同向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

三、实现人与社会同向发展的内在契合

马克思认为,实现人与社会全面性的同向

发展,既是一种最高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自觉的价值追寻,其是一个逐步实现、不断展开的过程。人总是在现有条件、既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环境下谋取全面发展的,当现有的条件与平台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全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时,人总是会通过积极地创造条件、改变环境来加快其全面发展的实现步伐。人的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状况是直接相关的,社会发展状况的不断完善与提升,势必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水平与程度的不断提高。从历史上说,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人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功不可没,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发达的物质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又造就了一味追寻物质价值最大化的“单面人”和“单向度的社会”,物欲横流造成了对人性的全面吞噬。而真正能够把人从“人为物役”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来追寻的,那只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才开始的。努力造就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最大意义上的自由幸福,是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社会形态的本质要求与价值追寻。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内在规定,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设定,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属性与根本要求,彰显了其发展要由人民共同进行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公正本质。这种新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引入了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中,克服了阻碍社会全面进步和危害人民利益的各种负面效应,采取立体互动、协调推进的原则而确保人人公平参与、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发展,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内涵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要求,更加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民性、公正性、价值性和目的性。

衡量一个社会形态是否先进与社会进步程度如何,可以有多方面的标尺,但人是否获得全面性、自由性的发展显然是其最重要的尺度之一。质言之,人是否获得全面性的发展,就成为衡量与检验人的自由实现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整个社会就是高度和谐而自由的联合体。当然,在实现这种终极理想之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由于生产力、科技的不发达与运用的不切当,社会交往的不充分、社会制度的不健全、精神境界的不宏阔,以至于人们仅能够获得片面的、局部的、低水平的发展。此时,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对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人说来,就只能说是一种价值寻梦,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一种理想性的价值维度。

确立人与社会同向发展的这种理想性的价值之维,不纯粹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它对引领社会向前、向上发展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人所诉求的自由全面发展,除作为其理想性的价值祈求外,还具有现实性的价值之维。人毕竟都是在特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生成与完善的,人的发展也是一种过程性的集合体,其基本方向是朝着自由而全面的目标行进的,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中人还不能够立即实现这一宏大目标。此时,解放、发展生产力,创新并正当运用科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创造足够多的社会物质财富,不断缓解低水平的生产成果和低端供给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进而为缩小各种社会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就是最基本的任务和一切工作的重心。

人的全面发展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但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并

不必然地会实现人与社会的同向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贸易、公平交换,确保在经济生产领域实现自由和平等,促进社会分工和交往的普遍化,极大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技能,促进社会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的普遍化,促进社会关系和社会需求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化、社会化的能力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物质基础上准备各方面的条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残酷的自由竞争又会带来人的片面化的发展,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价值驱动使人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才能,甚至会产生各种与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相背离的异化与奴役现象,使得人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不同步。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两难的发展困境也同样摆在我们面前。发展生产力并不必然地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又是现阶段根本无法超越的,毋宁说是一种当然的选择;虽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以积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根本目的、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11],但现阶段又很难立即、全面达到,只能以之作为价值之维来进行引导。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生产力发展现有水平的制约,通过创新科技、采取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创造丰富的物质成果,这个历史阶段是不能超越的,因而,就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动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各种手段,科学合理地积极引导、规范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既能够发挥积极的激励作用,又可避免各种负面效应的产生,消除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避免资源

浪费和无序竞争,形成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同向互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上的重大差异就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来积极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的任何一项成就都不折不扣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全体人民既能共享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文明成果,又可自觉摒弃因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消极的价值负载,实现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一致。列宁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12]。既然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着它的各种社会关系,那么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会对社会发展、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人的全面发展,总体上看存在制度优势能保障其实现,但这种实现不会一蹴而就,必然是在动态中通过不断改革而实现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 李汉铃,李太杰. 论社会协同发展与人的发展[J]. 学习与探索,2000(2):64.
- [3] 张智.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协同发展[J]. 重庆社会科学,2014(8):122.
- [4] 张燕.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中的“人民性”论纲[J]. 贵州社会科学,2020(4):24.
- [5] 张凌云.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生产缘何必然: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发展片论之四[J]. 探索与争鸣,2019(11):86.
- [6] 倪志安. 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J]. 哲学研究,2012(10):30.
- [7] 熊升银,周葵,刘思岑.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述评与展望[J]. 广西社会科学,2020(8):62.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8.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5.
- [10] 陈小鸿. 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7.
- [11] 王学俭. 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9.
- [12] 列宁.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8.



引用格式:王前军,李昊芮. 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向度及其当代价值[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17-2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0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17-06

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向度及其当代价值

The better life dimension of Marx's ecological view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王前军,李昊芮

WANG Qianjun, LI Haorui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根据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和美好生活之间的逻辑关联的阐释,美好生活应是人的一种体现了其本质的、生态化的生存形式。马克思认为,美好生活源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者在合理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演绎出美好生活的共同体图景。马克思批判了资本逻辑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剥夺,阐明了如何实现美好生活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意蕴为我国人民勾勒出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并提供了实现美好生活的方法指南与价值遵循。

关键词:

马克思生态观;
美好生活;
价值耦合;
价值羁绊;
价值遵循

[收稿日期]2021-04-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KS136)

[作者简介]王前军(1970—),男,安徽省合肥市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优良的生态环境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的幸福体验,更关乎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改变世界”即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出现了自然异化、社会异化和人的异化等一系列与美好生活相背离的现象。马克思的生态观克服了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美好生活的局限性,正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是平等互助的社会组成部分,通过生产劳动而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公平公正地享有生态资源和其他各类社会资源,并在适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意蕴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对于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马克思生态观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

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必然前提,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发生的各种信息、能量和物质变换演绎出美好生活需要的共同体景观。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称赞了伊壁鸠鲁关于人的实践受制于自然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割裂、双向建构的统一体。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对“自然”概念和人与自然的能动性关系做了全面考察,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美好生活的价值前提。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对自然的唯物主义理解,认为“自然”概念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它不是某种神秘的东西,而是世界的真正本质,人类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

系”^{[1]519}。基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揭示了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二者是物质世界存在的两种不同形态。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必须依靠自然界,自然存在物的生命本质也要靠自然界才能得到确证。因此,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在肯定自然界基础地位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应当是始终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交换与共生关系,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化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原初关联性,人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209-210}。人在对象化活动中把自然界变成自己无机的身体,而且是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于一体的具体、现实的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87},这就彰显了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主体性,表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无不打上了人类社会的烙印,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193},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美好生活的源泉。由此,马克思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域,主张通过变革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摆脱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人与自然神秘化的理解,超越了费尔巴哈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感性认识,指出人类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人类自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00},进一步丰

富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客观要素和必要条件。

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生态视角,马克思赋予了“自然”概念以“社会-历史”性质,认为美好生活总是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美好生活是现实的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它不是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和想象,而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包含着吃喝穿住等生存需要以及语言、意识、生命繁殖等基本因素。现代工业生产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现实联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分化与统一,自然不仅是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自然,而且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社会的一切生产和运动,都是基于自然环境下的物质运动。无论是原始社会中单向度地从大自然中索取,还是社会生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生产资料再生产,脱离各种自然条件下的抽象的实践活动都是虚无缥缈的想象。由于人类自身也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物和构成要素,因此,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应扮演侵略者和掠夺者的角色,而是应该善待自然,“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做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2]。人的能动作用依然局限于自然,是能动性受动性的统一,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并由此影响人的生存质量和美好生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创造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和人们的需要体系不断扩大,自然界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一个“普遍有用性

的体系”,人们美好生活在新的条件下得以进一步提高。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向前发展,劳动者的需要及其美好生活被资本所建构和限制,被纳入到资本增值的逻辑之中,资本逻辑越来越成为总揽全局的结构性体系,从而破坏了美好生活的自然基础。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体制与社会机制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美好生活。

二、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危机对美好生活的价值羁绊

马克思认为,追求并实现美好生活是人类的伟大理想,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导致无产阶级生活的不美好,最直接的表现是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使得无产阶级“精神和生命正濒临崩溃和毁灭的边缘”。资本主义所推崇的过度开发、生产与消费观念,使自然在帮助人们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却遭到了无情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形成的巨大吞噬效应,使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人们无法获取更多的美好生活感受。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社会和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大体保持了对自然的敬畏态度,“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534};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4],没有对自然采取一种符合道德的观念与态度,强调对自然一味地索取,过分突出了人对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性,将自然“蜕变为工厂一样的社会组织”,造成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背离,物质生产逐步成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社会学过程,而不再仅仅是维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学手段。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对自然的占有范围不断扩大,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资本的

“魔杖”阻碍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的二元对立,致使美好生活的实现失去了客观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理论批判了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物质变换过程的双重破坏,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工艺和物质技术具有的逆生态性,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带来的生态灾难,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陈代谢思想。马克思指出,自然是有其固有规则性、规律性、独立性的循环系统,物质生产实践实质上就是控制和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与自然必须双向运动才能实现二者科学的合理置换。作为自然界完整新陈代谢过程的一个环节,人类既要从自然中获取各种物质资料,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向自然界定量回归才能实现生态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资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而控制劳动,建立起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为增值目的对自然资源的无偿占有和过度使用,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失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利润的无度追求不断地破坏自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919},迟滞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资本逻辑不断繁殖出利润最大化的生产与消费需求,物质变换增加的价值都被资本家无偿攫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在马克思看来,美好生活的在应然形态上应与人的本质相契合,但资本逻辑无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资本家对人的价值需要和生

存状况毫不在意,只会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和掠夺,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突破工人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超过工人所能够承受的限度,从而“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拜物教逻辑下,资本“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使工人受到了双重异化,处于饥寒交迫、身心俱损的境地,福斯特指出这“与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不可分割,包括他们自身的内在自然和外在本然”^[7]。人类真正的自由是要摆脱社会关系的压迫与束缚,是作为发展主体的完全自觉自愿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资本逻辑忘却了劳动的根本目的和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这与美好生活的价值目的相对立。

马克思指出,要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自然观、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彻底变革,因为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出现的,根本上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要协调好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除限制人的本质复归的社会因素,实现资本逻辑向自然逻辑的转变与回归,把人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达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社会解放的有机统一,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社会,是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形态,“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8-929}。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合理地调节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之间的物质变换,对人类能够通过合理

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过上美好生活充满信心与憧憬。

三、马克思生态观美好生活意蕴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实质,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实现美好生活的局限性,打破了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对美好生活的种种枷锁,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生命共同体,提出要在尊重生态环境的理性原则下,更好地满足个体的生态权益和需求。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意蕴对于新时代我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一,马克思在生态维度上揭示了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全面勾勒了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在马克思看来,美好生活就是人在确证其成为类存在物后所体现出的一种生态化的、彰显人的本质的生存形式,就是人通过人与自然相统一而实现的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这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逻辑,是以人的全新的生存样态作为确证属人的生命形式的必经环节和内在根据,是实现了自然主义面向人的生态复归,是完成了人道主义面向自然的伦理关怀,它使人能够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找回人之为人的自由本性,为人性的丰富完善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增加了生态维度。马克思对美好生活本质的理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学”,它站在人的本质之立场上观察生态与美好生活,为中国人民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生态维度的现实观照。美好生活始终表征着人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重归自然后能够真正按照属人的方式生存,达到对其生命之本真状态的深刻理解,这是一种以社会发展状况和人的生存状态来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标准。美好生活就是人们因其能够自觉自由地劳动而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生

态化生存方式。自觉自由的劳动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尺度,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源泉,它既实现着人自身的自我改造和充实完善,也同时创造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体现人之生命本相的生态化生活方式,完全按照人的本性进行着的自觉自由的劳动,使人在静谧祥和的自然中实现人性的自由,在领悟人生的真谛中重拾本我、升华自我、实现超我;鼓励中国人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心境中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应当自觉追寻的美好生活的价值样态。

其二,马克思揭示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价值指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异化使自然遭受破坏,使生态系统失衡,使人始终处于一种“非人”的状态,人无法依其本性生存,整个社会也陷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敌对状态,这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它所导致的异化劳动是破坏“人与自然同时也是人与其自身相和谐关系”的现实力量。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和人都沦为满足资本增值欲望的物,使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退化为单纯的物与物的关系,这使人们的美好生活在根本上变得不可能。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以浮夸奢靡的“消费主义”文化所驱使的消费异化现身,许多地方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节节攀升,但美好生活指数却并未明显提升。由此,我们需要努力消解经济理性驱使下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张力,进一步清除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不良影响,树立生态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生态生产和生态消费的道德风尚。我们应充分认清我国国情,准确把握当下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各类矛盾,超越资本逻辑、经济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其三,马克思阐明了美好生活的生态逻辑,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价值遵循。马克思指出,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由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历史过程,它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进、人与社会互利共赢、人与自身平衡统一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只有“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自身关系的和解,真正获得美好愉悦的生存体验。新时代美好生活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高度一致的。为此,我们需要坚持如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属性,尤其是土地、矿山等重要资源的公有属性,从根本上保证自然资源与人民大众利益的一致性,坚决反对土地、矿山、重要能源私有化的观点,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思想,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不断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绿色属性。发展高效农业,做强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清洁生产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构建低碳、环保、生态友好产业体系,走生态优势和经济优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绿色发展之路,“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8]。三是引导人们追求人生价值。真正

外,更多层面是通过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与丰盈。随着我国社会资源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必再进行物质财富积累的比拼,各种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人们用于解决基本生产需求的劳动生产时间也在不断缩减,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进生产技术、完善社会治理、提高自身能力、拓展个人兴趣等领域,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2.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 [4]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8.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2.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67.



引用格式:孙守领,陈发俊.论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从工艺学到技术[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23-30.

中图分类号:A81;N0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0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23-08

论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

——从工艺学到技术

On the turn of Marx's technological thoughts

—From technics to technology

孙守领,陈发俊

SUN Shouling, CHEN Fajun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但这并不能作为马克思技术思想存在转向的依据。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存在着转向,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察:一是从技术概念这一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出发,在德语世界中存在从“工艺学”到“技术”的技术概念转向,这是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的哲学基础;二是从马克思著作中技术用词入手,以《资本论》第1卷为界线,在马克思前期和后期著作以及《资本论》各版本中也存在从“工艺学”到“技术”的技术用词变化,这为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提供可能;三是从《资本论》第1卷中技术思想的论述看,在成熟时期马克思技术思想所关注的重心与内容也发生了从工艺学理论到技术实践的明显转变,这是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马克思;
工艺学;
技术;
技术转向

[收稿日期]2021-05-14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9D109)

[作者简介]孙守领(1992—),男,安徽省亳州市人,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陈发俊(1968—),女,安徽省合肥市人,安徽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

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一直备受关注。根据不同时期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所呈现出的不同内容、特点和历史特征,学界把马克思技术思想的演变历史大致分为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从马克思技术思想发展的整体演进来看,马克思对技术的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其技术思想也似乎存在某种转向。但是,这种看似对马克思技术思想整体的关注,却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技术思想转向应该发生在技术思想的成熟期以后,而非在其形成过程中的技术兴趣使然;二是技术转向应当置于技术哲学研究视域下,而非在其他研究视角下的技术思想考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学界很少明确地谈及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问题。那么,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到底存不存在转向?或者说,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何以可能?鉴于此,本文拟从技术概念这一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出发,尤其是从德语世界中的技术概念入手,分析马克思著作中技术用词的变化和《资本论》(第1卷)有关技术的具体论述,明确马克思技术思想在成熟期所关注的重心与内容的转变,以探讨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何以可能。

一、德语世界中技术概念的转向

技术是什么,这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事实上,给技术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现象及其关键术语包含相互抵触的含义和解释,技术既是现实的、人类经验的领域,又是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定义和相关概念还牵涉到其他问题,如技术、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2]⁶⁴。此外,给技术下定义的困难还在于翻译问题,如在英语与德语世界中,有关技术的术语在语言使用上存在差异。

在英语世界中,当我们描述技术的概念时,只有“technology”这一个词。在英语语境中,技

术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技艺(technique),指的往往是具体的属于个人的技能、技巧、技法,即日常技术、身体技术;二是有所特指,往往与科学的应用、大工业体系、机械设备和工具等相联系,更多地指现代技术、科学化的技术、高新技术、系统化技术^[3]。然而,在德语世界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德语世界中,有两个词语——“工艺学”(technologie)与“技术”(technik)——可以用来描述技术的概念。尽管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与工艺生产有关,但它们并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技术和工艺学之间的差异不仅在哲学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技术哲学范围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工艺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既不会消除,也不会变得不重要^[4]。此外,在19世纪中叶后,德语语境中的技术概念还出现了从工艺学到技术的转向。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工艺学”源自拉丁语的“technologia”,是18世纪后期由德国教育学家约翰·贝克曼正式引入德国学术话语中的,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概念,用来表示手工业劳动和经验的知识和总和。贝克曼在其第一部著作《工艺学入门》(1777)中将“工艺学”定义为“手工艺品,工厂和制造的知识”,“传授有关各种加工自然物或手工业的知识的科学”^[5]。约·亨·摩·波佩是贝克曼的学生,他继承并发展了贝克曼的工艺学理论,并使之系统化。在《工艺学史》(1807)一书中,波佩在系统地讲解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厂中的一切操作与这些操作的历史、结果和根据时,把工艺学的历史看作“从最早的时代到我们时代,贸易、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所有发明和发现的历史”^[6]。此外,在《工艺学辞典》(1816)中,波佩把工艺学定义为一种科学体系。在他看来,工艺学包含了所有的艺术、工艺、制造品和织物的

主要作品,所有必要的手段、工具和机器,以及相适应的操作过程与顺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的操作系统,因此也可以把工艺学看作一个操作系统理论^[7]。

“技术”从词源学意义上看则源自拉丁语“technica”,虽然它也是在18世纪后期被翻译过来的一个新的德语技术术语,但它却是有异于“工艺学”的一个概念。如果说“工艺学”是关于技术的科学论述,是技术的科学理论方面,那么“技术”就是用来表示工程工作及其产品的领域,是技术的实践方面^[8]。在德语语境中,“技术”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德国工程师和一些社会学家所使用的,指的是创造和维护物质文化的方法、手段和工具。从19世纪中期开始,讲德语的工程师就将“技术”作为他们职业身份的核心部分,并用这个术语来宣称所有材料生产的技术都属于工程师的范畴。德国地质学家、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在《技术哲学纲要》中将技术发明解释为“设想的物质体现”,把技术活动看作“器官投影”^[9]。他认为,技术工具和人体器官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种人类的刻意建构,不如说是人类无意识摸索的结果,并且人类总是在工具中创造自己。俄罗斯工程师彼得·恩格尔迈耶在《技术的一般问题》长文中通过广泛的文献考察了技术的本质。他认为,技术是广义的艺术,包含了所有物化活动;技术具有创造性,还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各个阶段^{[10]106-108}。其二,在寻求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德国的精英工程师们发展出的一套关于技术的理论论述,其中明显带有文化色彩。他们不再关注“技术”的本质,而是试图把“技术”与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比如,维尔纳·桑巴特在《技术与文化》一文中,分析了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是双向的:技术是塑造文化的因果因素,在每一种文化

背后都有一种必要的物质基础;文化不仅影响技术变革的步伐,而且还将技术推向特定的方向,从而产生不同的技术^{[10]111}。可见,“技术”是作为一种工具内涵出现的,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显然,在德语世界中,“工艺学”拥有了现代技术、科学化技术的意思。虽然其与英语世界的技术意思相近,但它却没能像英语世界中的技术那样涵盖“技术”之意,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与技术的内涵相异。

“工艺学”与“技术”都与工艺生产有关,它们虽都产生于18世纪后期,但是在19世纪以前,“技术”在德国学术界还很少见,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上升至关键词的地位。尤其是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工程师充当先锋,新兴的、科学型的工业快速发展。在关于技术的有分量的哲学论文中也开始较少采用重商主义者的“工艺学”,而是采用了更为普通的“技术”,并且用了新的方式去诠释它。尽管“工艺学”从未完全地消失,却因为如下几个原因被德国的工程师和实业家所拒绝。首先,工程学教师认为,工程教育中以理论为中心的新方法与工艺学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分类学的方法是完全不相容的。其次,工艺学的领域是用来培养管理者的,而不是用来训练工程师的。再次,重商主义本身在整个19世纪后期的自由主义经济中也成为了一个可怀疑的教条,工艺学自然也受到了牵连^{[2]7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德语世界中的技术概念从“工艺学”转向“技术”,技术发展也从科学理论转向社会实践。

简言之,在德语世界中,技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工艺学”与“技术”,其中,工艺学是关于技术的科学理论,技术是关于技术的社会实践。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关技术的学术研究也从工艺学领域转向技术

领域。因此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的哲学基础。

二、马克思著作中技术用词的变化

作为19世纪的德国哲学大家,马克思除关心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问题外,还关注现实社会中的技术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工艺学”与“技术”这两个技术用词虽常常被提及,但它们被提及的次数有所不同。据笔者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50卷本(以下简称“马恩全集”)正文中“工艺学”共出现110次,“技术”共出现530次,其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工艺学”出现91次,“技术”出现384次。值得注意的是,“工艺学”与“技术”在马克思的早期手稿和后期著作中出现的频次有着明显的变化,其中《资本论》第1卷就是一个分界线。为此,笔者梳理了马恩全集中马克思所有手稿和著作中“工艺学”与“技术”出现的次数与占比情况(见表1)。

在马恩全集马克思的所有手稿和著作中,“工艺学”与“技术”的出现主要集中在3卷《资本论》(马恩全集第23—25卷)与5卷“政治经济学手稿”(马恩全集第45—49卷)中。从整体上看,“工艺学”与“技术”各自出现的次数、占比相近,其中,“工艺学”出现的次数是72次,占比为79%;“技术”出现的次数是264次,

占比为69%。但是,以《资本论》第1卷为分界线,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前后“工艺学”与“技术”出现的次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前的马克思的著作中,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工艺学”出现的次数多于“技术”出现的次数,其中“工艺学”共出现55次,占比约60.44%;“技术”共出现92次,占比约23.97%。之后则相反,“技术”出现的次数占比约44.78%,多于“工艺学”出现的次数占比(18.68%)。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工艺学”与“技术”这两个技术术语都很重视,“工艺学”与“技术”在马克思心目中的位置相差不多,只是在《资本论》第1卷以后出现了技术术语使用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印证了德语世界中技术概念的转向^{[10]98}。

除在马克思著作中技术用词整体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外,在《资本论》第1卷的各个版本中也出现了技术用词上的差别(见表2)。

《资本论》第1卷的外文版本共有六个,除1867年的德文第1版外,其他五版分别对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2版的6—10卷。在这六个外文版本中,马克思本人只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1867),并在1872年的德文第2版和1875年的法文版中做了两次修订^[11]。然而,另外三版的出版工作则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手稿

表1 马恩全集中马克思著作中“工艺学”与“技术”出现的次数与占比情况

| 卷数 | “工艺学”统计情况 | | “技术”统计情况 | |
|--------------|-----------|-------|----------|-------|
| | 出现的次数(n) | 占比/% | 出现的次数(n) | 占比/% |
| 23(《资本论》第1卷) | 17 | 18.68 | 84 | 21.86 |
| 24(《资本论》第2卷) | 0 | 0 | 19 | 4.95 |
| 25(《资本论》第3卷) | 0 | 0 | 69 | 17.97 |
| 45 | 0 | 0 | 27 | 7.03 |
| 46 | 11 | 12.09 | 22 | 5.73 |
| 47 | 21 | 23.08 | 14 | 3.65 |
| 48 | 10 | 10.99 | 14 | 3.65 |
| 49 | 13 | 14.28 | 15 | 3.91 |
| 其他 | 19 | 20.88 | 120 | 31.25 |
| 合计 | 91 | 100 | 384 | 100 |

表2 《资本论》第1卷各外文版本中
“工艺学”和“技术”出现的次数

| 出版时间 | 版本 | 主导者 | “工艺学”出现的次数 | “技术”出现的次数 |
|------|-------|-------|------------|-----------|
| 1867 | 德文第1版 | 马克思出版 | 64 | 24 |
| 1872 | 德文第2版 | 马克思修订 | 25 | 58 |
| 1875 | 法文版 | 马克思校订 | 14 | 80 |
| 1883 | 德文第3版 | 恩格斯修订 | 15 | 80 |
| 1887 | 英文版 | 恩格斯主编 | 17 | 67 |
| 1890 | 德文第4版 | 恩格斯修订 | 15 | 75 |

在1883年的德文第3版和1890年的德文第4版做了两次修订,并主导了1887年的英文版的翻译工作。

在《资本论》第1卷的各个版本中,“工艺学”与“技术”在使用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在1867年的德文第1版中,“工艺学”出现了64次,而“技术”只出现24次。在1872年的德文第2版中,情况几乎相反,“工艺学”只出现25次,但“技术”出现了58次。这一趋势在1875年的法文版中继续。在法文版本中,马克思对德文第2版做了更好的校订工作,“工艺学”出现14次,“技术”出现80次。在1883年的德文第3版中,恩格斯是根据马克思德文本手稿的书面指示和曾作过的口头指示修订编辑的,“工艺学”出现15次,“技术”出现80次。在1887年的英文版中,赛米尔·穆尔和爱德华·艾威林根据德文第3版翻译,恩格斯主编校订,“工艺学”出现17次,“技术”出现67次。在1890年的德文第4版中,恩格斯再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书写的笔记进行修订,“工艺学”出现15次,“技术”出现75次。可见,在《资本论》第1卷的这六个外文版本中,“工艺学”与“技术”出现的次数也不尽相同。

考察马克思在使用“工艺学”一词上的变化,可以看到,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当马克思在论述我们今天在德语语境中所说的属于技术方面的内容时,他使用的也是

“工艺学”。而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2版第6卷的编者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经常用“技术”来代替“工艺学”,同样以形容词“技术的”来代替“工艺学的”^[11]。换句话说,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到第2版之间抛弃了“工艺学”而转向“技术”,并在法文版中加以确认,具体表现为:(1)“工艺学”一词只在“作为现代科学的工艺学”的意义上使用;(2)“工艺学的”改为“技术的”,在“劳动资料”或“由劳动资料所规定的”意义上来使用;(3)《资本论》第2卷、第3卷,也许是由恩格斯修改的,就都使用“技术的”了^{[12]378-379}。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对“工艺学”与“技术”这两个术语的使用进行了修改呢?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发现德文原本的某些部分有的地方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13]14-15}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论》第1卷某些部分有的地方用“技术”来替代“工艺学”是“更好地修辞”。根据威·翟比凯的观点,贝克曼是按照“物质加工的科学”这个意义来定义“工艺学”一词的。“工艺学”虽然与“技术”不同,但是它确实塑造了“技术”的含义,鼓励更窄的定义,即将“技术”限定为机械或实用艺术。据他说,在德语世界中“技术”一词本来有两个含义:(1)“实践能力和行为”;(2)“手工业、工厂的生产资料的总称”。产业革命以后,这两个含义进一步分离。19世纪50年代以后,“技术”一词的内容就演变到可以用“技术的”来表达了。也就是说,1850年以后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技术”一词在工厂的生产资料这方面的含义,已经可以用“技术的”一词来表达了。“技术”一词用法的这种变化,可能也就是马克思

修改技术用语的背景^{[12]379}。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或手稿中关于技术的论述,多用“工艺学”“工艺”“工艺上的”等词,而在后期则多用“技术”“技术的”“技术上的”等表达,尤其是在《资本论》第1卷各个版本中出现了明显变化,这为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提供了可能。

三、《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技术思想的转变

虽然在德语世界中技术概念发生了从“工艺学”到“技术”的转向,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技术用语使用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探讨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何以可能的关键还要看在马克思技术思想的成熟期是否发生思想转变,即考察《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技术思想的转变。

《资本论》第1卷既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最成熟和最系统的表达,也常被看作马克思技术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但是,很少有学者认识到《资本论》第1卷标志着马克思技术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既包含了具有科学性的“工艺学”概念拓展,也包含了具有批判性的“技术”实践立场。

1. 转变源于“工艺学”概念的拓展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给出了“工艺学”的概念。他说:“正如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的考察属于商品学一样,对实际的劳动过程的考察属于工艺学。”^{[14]56}在这里,马克思以劳动及其过程为“工艺学”的研究对象,劳动过程又包含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即劳动,劳动的要素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14]70}而在劳动过程结束时,产生一个中性结果——产品。产品是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是

商品学的研究内容。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15]。“工艺学”的研究任务是劳动过程,而经济学的考察对象是劳动产品及其价值,两者显然不同。马克思对“工艺学”与“经济学”的这种比较分析,不仅能对“工艺学”的概念有很好的限制,而且还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工艺学”的内涵。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关注的只是“工艺学”的概念与技术过程的内在特征。

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没有给“工艺学”下定义,而是把“工艺学”概念与从英国经济学家那里继承得来的“机器”概念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工艺学”的最一般的叙述,是在对“机器”概念进行讨论的很长的脚注里^{[13]428-429}。在这个脚注的一开始,马克思就呼吁对“工艺学”进行批判性考察,指出18世纪以来发明的一般基础,很少属于某一个人,更多的是出自社会组织。“工艺学”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正式建立起来。然后,马克思把人类所拥有的“社会工艺史”与达尔文所关注的“自然工艺史”做了一个对比,其中,“自然工艺史”是动植物器官的形成史,是自然进化形成的;而“社会工艺史”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在这里,“社会工艺史”就是机器的发展史,从简单的工具到复杂的机器,从手工业时代的人力操作到大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显然,机器生产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解放人类劳动。这形成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3]429}因此,我们很容易把“工艺学”理解为直接指称生产的物质过程,这是一个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

所给出的“工艺学”概念相符合的用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还“对‘工艺学’概念进行了拓展。马克思写道:“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13]559}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工艺学”进行了新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指导生产过程的科学。这一理解与英语语境中的“现代技术”概念相一致,都是把技术定义为“关于技术的科学论述”。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因为在马克思的其他表述中,“工艺学”更多的是指生产过程在科学上的应用。正如马克思在谈及农业社会变革时所说:“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13]57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它取代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墨守成规的生产经营方式,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形成更多的进步优势,进而推动农业领域的生产变革。他还说:“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3]559}“社会劳动生产力……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13]719-720}因此,我们只能说“工艺学”蕴含着一定的科学性,而非就是指现代科学。此外,马克思在谈及工艺教育时,指出:“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13]561}显然,“工艺学”与实际的生产操作不同,前者是一种理论知识,而后者是一种实践行为。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工艺学”的论述是“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工艺学”概念的延续,并把其当作具有科学性的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科学应用来对待。

2. 转变来自“技术”实践的彰显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并不像“工艺学”那样给“技术”下定义,或者说对“技术”进行概念式的阐释,而是通过蕴含“技术”实践性的表达来彰显他的技术思想。在书中,他多次提及“技术进步”“技术变革”“技术基础”“技术条件”“资本的技术构成”等,而很少论述“技术教育”和“技术与科学”。可见,马克思把“技术”思想的重点放在了产业技术的进步与变革上,以突出“技术”的实践性。

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中,马克思并没有很多使用“技术”一词,而在其德文第2版中做了大量的修订——把文中约50次的“工艺学”都修改成“技术”,所涉及的主要就是技术实践性的描述。马克思在德文第2版的“跋”中指出,“技术”是“更好地修饰”。从修正前后的语义变化看,除技术概念史的原因外,可能还在于,“工艺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底层的工人很难接受正式的工艺教育和有关科学知识的学习,这使工艺理论上的进步与变革变得很困难;相比较而言,“技术”蕴含着社会实践性,这使技术进步、改良与变革成为可能。因此,马克思把文中与“工艺进步”和“工艺变革”有关的论述都改成了“技术进步”或“技术变革”,进而彰显了“技术”的实践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控制下技术使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如卡尔·米切姆所说,在某种程度上,《资本论》第1卷代表着马克思不太关注技术过程或工程科学的内在特征,而是关注它们的过程和作为社会效益的科学,尤其关注这些过程和知识形式是如何来自社会又如何影响社会的^{[2]95}。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与变革是两重性的,既有高效与解放的一面,又有监管与控制的

一面。他提倡“技术”实践的正面效应,指出,大工业时代去技能化的机器技术不仅比手工业时代的人力生产更高效,而且还能有效地把工人从贫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劳动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人逐渐成为生产过程本身的看守者和调整者……(工人)从生产过程的主要行为者变成旁观者^{[16]114}。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技术应用走向了人的对立面,用于私人目的,控制并支配着人类的行为,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出现了道德危机。这也就造成了马克思对“技术”实践负面效应的批判。其一,对技术目的的批判。从经济学上看,技术强调的是其所实现的产品价值,它依赖于效率标准,如果将它仅仅用于私人目的,其生产成本较高,发挥的作用也有限,进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其二,对技术过程的批判。马克思说,“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14]567},工人“只不过是没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14]526}。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技术代表着资本权力,它被资本家所控制,迫使工人为机器服务,通过机器为资本家服务,并持续对工人劳动与剩余价值进行压榨,这对自然环境会造成损害,对人类生存会构成威胁。其三,对技术设计的批判。马克思在分析“鲁德运动”的形成原因时指出,“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3]508}。资本主义的技术不仅是由资本主义的利益控制着技术的设计所产生的,而且也是由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方面(例如管理)的相同偏见所形成的^{[16]52-57}。两者都是技术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指标,技术不能仅仅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应考

虑被统治阶级意见。因此,马克思并非批判技术本身,而是批判技术的不合理应用,尤其是批判作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技术实践。这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的“技术”实践性。

因此可以看出,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发生了转变,不仅拓展了“政治经济学手稿”中的“工艺学”概念,而且还彰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实践,也从内含科学性的“工艺学”转向外显实践性的“技术”,这是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转向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通过对德语世界中技术概念的考察、对马克思著作中技术用词的分析、对《资本论》第1卷中技术思想的论述,我们可以判断马克思的技术思想确实存在着转向,即从“工艺学”转向“技术”、从科学理论转向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 [1] 布瑞. 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J]. 闫秀宏,译.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4):9.
- [2] 米切姆. 工程与哲学:历史的哲学的和批判的视角[M]. 王前,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 吴国盛. 技术释义[J]. 哲学动态,2010(4):86.
- [4] DURBIN P T, RAPP F.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M].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325-326.
- [5] FRISON G. Linnaeus, Beckmann, Marx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echnology betwee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 hypothesis of an ideal type[J]. History and Technology, 1993(10):161.
- [6] 张钟朴.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科学技术机器生产和工艺学的研究[M]//周艳辉. 经济学笔记研究(II).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04-205.

(下转第82页)



引用格式:敖双红,段涵,张德峰.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31-38.

中图分类号:D920.0;D922.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05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31-08

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敖双红¹,段涵¹,张德峰²

AO Shuanghong¹,DUAN Han¹,ZHANG Defeng²

1.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2.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关键词:
公共卫生;
公民健康;
预防为主;
政府主导

摘要:在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颁布与实施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可以预见,我国的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必将会得到更高层次的重视。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应遵循保障公民健康、预防为主和政府主导三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能够为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提供价值引领、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推动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最终提高全民整体健康水平。

[收稿日期]2021-03-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BFX159)

[作者简介]敖双红(1968—),男,湖南省桃源县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段涵(1998—),男,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

2019年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综合性、基础性的法律得以通过。该法颁布和施行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一是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的同时保证了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二是推动了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精简,在节约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明确保护医患各方合法权利和规定其法定义务,有利于医疗卫生领域良好法治氛围的形成。有学者提出,该法结束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长期以来只有子法、没有母法的历史^[1]。多数媒体也将该法视为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基本法,从各类新闻标题即可见一斑^[2]。这样的定位和期望不可谓不高。而2020年初暴发与蔓延至今仍未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为我们敲响了大力加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警钟。自疫情发生以来,有关地方政府是否有义务向公众公布疫情具体防控情况等,以及有关部门采取防控等处置措施适用法律法规问题都引起了学术界与社会大众的广泛争议。

在我国当前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内,有包括《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在内的十余部单行法律,近五十部行政法规,以及大量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体现了我国卫生法调整范围的全面性,其涵盖医事法、公共卫生法、健康产品法等多个领域,横跨包括民法、行政法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部门法。但因为卫生法本身具有难以形成统一法典、作为交叉学科技术性突出且稳定性不足的特点,我国卫生立法的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公共卫生法治的建设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困难。同时,在实践中,诸如《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发生冲突时何者效力更高等问题也没有明确答案。这些都反映出大力推进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现有的对于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基本原则的研究虽很少,但也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研究的共识在于,卫生法是一门新兴的领域法,卫生法学亦是成长之中的法律学科,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方兴未艾。现有相关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一是内容指向基本正确,达成了一定共识。现有研究虽然对“三原则说”“七原则说”莫衷一是,但都将保障公民健康原则或与其含义相近的原则放在卫生法基本原则的首要位置。这是由卫生法的名称和性质决定的,“卫生”本来的含义就是护卫生命,其核心意涵就是保障人的身心健康。二是明确了预防为主的原则,这一原则涉及卫生事务的特性。众所周知,防止疾病发生、流行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做好预防工作,预防工作和诊治与后续康复疗养相比,耗费更低,适合我国人民医疗费用支付能力不强的现实。三是总结了各学科经验,涵盖面较广。卫生法学科毫无疑问是一门交叉学科,其专业性、技术性的特点十分突出。例如,对于卫生法的基本原则,有的学者将公平原则纳入其中,这与民法的精神相符合;有的学者将中西医协调发展原则列为基本原则之一,这体现了医学学科的影响。

然而,现有研究也有许多不足:一是统率力不足。除保障公民健康原则外,其他一些被视作基本原则的原则在涵盖的范围上局限较大。例如,患者自主原则,只适用于医患法律关系和医事法领域,不能涵盖全部卫生法律关系的内容。二是缺乏公共卫生法治的特殊性。如前文提到的公平原则,就有照抄民法基本原则之嫌,且在面对卫生行政关系等属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时,这一表述也不够精确。又如卫生法治原则,其含义虽然是在卫生法律行为中贯彻法治,但法治原则几乎适用于所有法律部

门,不能体现卫生法的特殊性。三是法律属性缺失。法的基本原则规定在法律条文中,本身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诸如患者自主、中西医协调发展等原则,多来源于国家政策或者行政管理方针,忽视了卫生法作为“法”的本质属性。卫生法是规范各种与人体健康相关行为的规则,其主要为相关的行为提供规范。从表现形式来看,卫生法首先表现为其是法律规范,其本质是法而不是政策、习惯或其他东西;其次才是与卫生有关的法律规范,卫生只是它的一个表面特征。把卫生工作的方针作为卫生法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忽视了卫生法作为法的本质属性,把政策和法律等同起来^[3]。

2020年6月1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实施,是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该法仍不能等同于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基本法,其仍是一部促进法。曾有学者提出以“基本医疗卫生法”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4],但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自2014年该法草案列入“十三五”立法规划直至最终颁布,其名称也数次变更,从此也可窥见一斑。所以,在学术研究与探讨时,要注意这一差异,不能过分拔高该法的地位及作用。鉴于此,本文拟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基本原则的内涵与特性,梳理总结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提供参考。

二、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基本原则的内涵及其特性

众所周知,在法学意义上,法律原则可以规定在法律文本之中,对具体法律规范和由此开展的法律活动起统摄作用。法的基本原则可以称为“原则之原则”,体现立法者根本意图,是建构具体法律法规乃至宏观法律体系的最高纲

领。照此理解,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必须是贯穿于卫生法律规范之中的,为卫生法律行为提供指引的原则和准则。就其功能而言,基本原则反映卫生法的指导思想,影响卫生法学的发展方向和卫生法治的建设,在卫生法研究和卫生法实践领域处于重要位置。因此,对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基本原则的研究和探讨理应得到卫生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的关注。

在法的运行层面,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统领和指导公共卫生的立法、执法、司法层面,其具体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为某些未受法律调整的卫生现象、卫生事务提供法律指导;二是体现卫生法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为卫生立法提供科学指引和理论依据;三是引导和规范卫生法律关系主体行为,推动卫生法治发展。但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基本原则的研究着墨不多,该研究尚不深入,始终是卫生法法律体系和学术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缺憾,也是推进公共卫生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跨过的难关^[5]。

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突出体现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价值遵循,是纷繁复杂、门类众多的卫生法律法规的凝练表达。毫无疑问,确立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基本原则有一套独有的标准和评价体系。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法律性。法不同于道德、习惯、政策,其特征在于因国家认可而具有的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以及对象的普遍性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法伴随人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亦随其发展而发展。法的基本原则也当然属于“法”,只不过在成文法律中区别于普通条文,往往起着提纲挈领、统领全篇的作用。从法的定义来看,首先,法的基本原则,必须由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不能是习惯、道德等规范的规定。其次,法的基本原则一定包含着权利义务内容,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反映

的是对被告人权利的维护;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则更多体现为民事活动中民事主体需保持诚实守信的义务。再次,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在法律适用上体现为当适用法律规范明显不合适或者没有具体法律规范可供适用时,法院可以依据法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原则的精神裁判案件。法治背景下的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其基本原则理所应当满足法律性的要求。

其二,概括性。推进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并将其落到实处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以法律规范的方式规范相关主体的行为。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公共卫生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或条例规章会迎来井喷式的增长。此时就需要基本原则来一以贯之指导具体的立法工作。概括性主要体现为抽象性和普适性。所谓抽象性,是指相对于具体法律法规,基本原则适用的情形更多,囊括的范围更广。所谓普适性,是指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作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内最高层次的行为准则,构成其他法律规范、法律行为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依据,能够统领下位原则和具体法律规范,为公共卫生法律行为提供指引。

其三,特殊性。特殊性表现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卫生法律体系中,不体现在其他部门法、领域法体系之中,这是由卫生法独特的价值追求决定的。“卫生”的本来含义是护卫生命,卫生法所要保护的法益亦是生命法益。因此,不排除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有相同、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所依托的卫生法属于领域法,不能不包含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内容。但是在公共卫生法治建设中,更要强调其自身特有的、特殊的基本原则。

三、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

结合现实国情和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参照前文提到的评价基本原则的标准,可将公共

卫生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三点:保障公民健康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和政府主导原则。

1. 保障公民健康原则

保障公民健康原则是公共卫生法治建设首要的、根本性的原则。对“卫生”二字作文义解释即是护卫生命,而护卫生命又引申出对于人的健康权利的保护;从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最终目的来看,其最终都要落到个体的人本身,其追求和目的就是要保障人的身心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的,要坚持依法防控,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1) 保障公民健康原则的法理基础

保障公民健康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为此,需要明晰健康权的意涵。“健康权”一词在《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已有明确规定,其法律意义已经十分清楚。关于健康本身的含义,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身体上、精神上的完美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该定义把健康扩展到了超出疾病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权的适用范围也开始包含了心理健康的内容,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健康权”,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的是实现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权利和自由^[4]。健康之于法律,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法律价值的健康,也就是说人们的健康是法律追求的目标;二是作为法律权利的健康,即人们的健康权如何被承认与得到保障;三是健康权是一种对世权,也是一种积极权利,即个体的身心健康不仅关乎自身,也需要国家和社会关心关注、采取有力措施予以保护。

在传统法律的视角下,健康权属于私权范畴,是自然人人格权的子权利。健康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

规,请求侵害人赔偿相应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例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章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实质上是医疗机构因其过错(医疗侵权)而对患者承担的民事责任。但是随着社会权理念和社会国观念的兴起,健康权渐渐包含了公法的成分。在此意义上,国家、社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促进健康事业建设和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的义务。那么,健康权究竟是一种公权力主导的积极权利还是私权利主导的消极权利呢?两种观点都不乏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一些学者强调健康权的公权力参与特性,指出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权力主体有保障国民健康的义务^[6];或者从政府行政权视角出发,认为保护公民健康近似于政府行政行为,健康权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7]。与积极权利说相对,将健康权视作消极权利的学者认为,健康权与生命权、身体权相似,应当列入人身权的范畴,健康权法律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当然,也有将这两种意见相结合,从整体性的角度把握健康权的规范模式^[8]。

从我国现有政策和法律来看,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开宗明义地指出“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我国《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第四十五条确定了健康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本身特有的抽象性、概括性,在实践中它一般不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宪法关于公民健康权的规定必须由下位法律具体化、明确化,公民的健康权利才能切实得到保护。因此,除《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了侵害健康权的救济方式外,作为比较接近“医疗卫生领域基本法”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更详细地规定了公民健康权,充分显示了公共卫生法治建设保障公民健康的基本原则。例如,该法第三条和第四条分别明确规定了卫生健康事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享有的健康权

不受侵犯等。实际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一章总则部分充分地阐述了公民享有健康权利以及国家、社会有义务保障和通过何种方式方法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因此,公共卫生法治建设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基本原则有着包括《宪法》在内的明确的法理基础。

(2) 保障公民健康原则的实现

健康权或者说生命健康权毫无争议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卫生法注重调整生命法益,规范与人的生命健康有联系的法律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亦是保护人的生命健康权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实现,就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如果采取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二分法的做法,健康权似乎难以被完全划入某一方。这是因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存在复杂的联系,将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截然分开处理的做法不适应现代权利的复合性质。就健康权而言,其无疑包含私权利主体和公权力主体两方的参与,缺一不可,具有复合权利的特点。因此,一方面,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要认真对待自己的健康权利,因为生命权、健康权的主体毕竟是自然人。生命神圣论指出,人的生命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古籍经典《孝经·圣治》写道:“天地之性,人为贵。”西方基督教溯源到摩西十诫也存在“不可杀人”的记载。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保障公民个人健康权不受侵犯以及获得救济首先需要个体权利意识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医疗机构和公益性组织等主体应积极主动作为,着力稳定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高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素质,重点化解医患矛盾突出的严峻问题;主管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则应落实“健康中国”各项规划,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对于人民群众“看病难、买药贵”的呼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回应。从法律运行的角

度看,相关举措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在卫生立法活动中,对公民健康权的规定应当进一步细化,确定侵害公民健康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基础,应确立在健康权利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一般以保卫生命健康权为最高原则。其二,在卫生行政执法活动中,卫生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需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把保护公民健康作为根本目标。这包括:在卫生行政管理活动中,要遵守法定程序,行使法定职权;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能突破损害公民健康权利的底线等。其三,在卫生服务活动中,卫生、医疗服务提供者应遵循公益性原则,充分尊重公民健康权利。对提供的服务、产品有缺陷、不合格甚至严重危害公民健康的,应依法从严惩处。

2. 预防为主原则

我国在2003年的“非典”防治以及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了提前预防在应对传染病暴发等公共卫生事件上的必要性与高效性,而预防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1) 以预防为主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在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曾总结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9]。我国现有的《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也把预防为主原则放到重要位置,其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其一,预防的便利性。例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提倡勤洗手、常通风、一米线、分餐制、公筷制等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个人来说既容易做到,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素养,也是对“健康中国”行动相关要求的最好践行。其二,预防的高效性。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防控部门和社会大众最关心的一项工作就是溯源工作。这是因为,只有查清病毒源头,

把病毒消灭在源头,才能彻底终结疫情的流行与传播。换言之,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遵守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防控要求时,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就会被阻断,病毒也就自然无处藏身。其三,预防的经济性。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对于国家和个人两类主体而言,都具有成本低、耗费少的特点。在国家层面,以宣传、督导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开展的预防工作不会消耗过多的人力物力,且医院、卫生站等公共卫生设施一旦建成,其使用寿命也较长,综合成本低廉的同时也保证了良好的效益。在个人层面,平时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有利于规避感染风险,避免因大病、重病产生的高昂支出而“因病返贫”,获得潜在的经济收益。

(2) 预防为主保障

要保障预防为主原则的实施,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健全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一方面,应完善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预警机制。我国各级疾控中心成立后,其职能更多是为各级政府的有关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缺乏对流行病的监控机制。结合国内外经验,可以由专门部门负责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预警,同时运用大数据等前沿科技,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强化相应的疾控职能部门,出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发传染病的具体办法与应急预案。另一方面,应建立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披露和公开制度。公开是最好的防疫措施,政府部门不应遮遮掩掩,担心信息公开损害政府威信、使自己承担行政责任。《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已经规定,报告和处置传染病信息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一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十五条也写明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有及时、准确发布传染病疫情信息的义务和职责。不足的是,相关信息公布的程序、公布信息不及时不准确的后果尚待进

一步明确化。可见,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更能真正地回应群众关切,疏导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3. 政府主导原则

(1) 政府主导原则的理论基础

医疗在一开始是作为医生对患者的诊治行为,往往被视作私人事务。近代以来,得益于两大因素的影响,医疗行为渐渐具有公法性质。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在工厂、作坊等地工作的工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其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必须得到政府的回应;其二,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人们已经无法仅通过私法规范主张自己的权利,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19世纪,社会权思想滥觞,社会保障立法开始盛行。共产主义的先导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提出无产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是社会权的权利主体,必须通过国家的积极作为去促成其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既关注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又加强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以英国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为转折点,国家开始为公民提供全面福利,其中医疗保障成为基本保障的重要部分,秩序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10]。之后,以福利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直至今日已成为各国通行的政策方针;医疗保障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政府主导这一基本原则,是《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一大特征。该法所包括的有关政府在建设医疗卫生和健康事业中占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的规定,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投资兴办各级公立医院、开展医学教育、建立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免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对困难人群提供医疗救助这五个方面^[11]。在此基础上,政府还要保证财政投入、推动医学科学研究和鼓励医学技术创新、合理

规划和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综合监督管理体系等。总之,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在多领域全方面地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人民健康。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办一切。实际上,政府包办一切的方式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九条也体现了该立场,其核心在于,国家、政府主办的公益性医疗机构在保障公民能够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前提下,应允许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参与。这样的立法安排既能保证每一个人平等享有获得必要服务与救助的权利,又顺应了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照顾到了不同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总之,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原则必须坚守,但是其他非政府主体参与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也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2) 政府主导原则的具体内容

政府主导原则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免费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本质要求是全体社会成员可公平获得,而不是需要付出不合理的代价才能获得。在公平性的基础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还应具备有效性特征,其所提供的诊疗、药品和服务等能够切实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治疗和恢复。一个个体人的生命,在唯物主义视角下必然经历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因而也就有了对于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卫生产品的需求。具体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分则”部分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规定,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妇幼保健、老年人保健、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事业等长期被有意无意忽视的领域,也被纳入了立法者考虑的范围之内。

其二,建立健全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从地方到中央,从农村到城市,各类侧重不同的医疗卫生机构共同组成了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立卫生医疗机构由各级人民政府举办,政府不得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卫生医疗机构必须坚守公益性。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之所以能将损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坚守公益性原则和医疗服务体系“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导向;也得益于许多民办和其他主体运营的医疗机构也团结在抗疫的大旗下,尽己所能地收容病人、开展诊治。因此,这一次的伟大抗疫斗争,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让我们更加明白,建立健全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必须立足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与现实国情。

其三,重视医学教育,培养医疗人才。当前,我国还存在着医学人才数量不足,而患者需求日益增长、供求矛盾突出的问题,许多基层卫生院和医院无法招到足够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同时,医疗人才流失问题也十分严重。针对这一严峻现状,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医学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力发展医学教育。而医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担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医务人才的使命,同其他高等教育相比,其具有学制长、实践能力要求高、带教老师多等特点,这些特殊之处必然增加了医学教育的成本^[12]。因此,政府应加大医学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严格落实《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提出的“建立规模适宜、结构合理、分布均衡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总体要求,健全奖惩制度。所谓“奖”,是指要给医学生等从业、培训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助和生活保障,免除其后顾之忧;针对我国当前医院分级不均衡的现状,

对于自愿前往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应进一步提高其待遇和福利保障。所谓“惩”,即对于管培生等医学教育主体而言,应明确其从业义务和最低年限,杜绝骗取国家补贴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 [1] 胡志. 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坚强后盾:写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颁布之际[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20(1):2.
- [2] 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有了“基本法”[EB/OL]. (2019-12-28)[2021-03-12].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12-28/9045890.shtml>.
- [3] 尹口. 论卫生法的基本原则[J]. 中国卫生法制,2008(4):12.
- [4] 毛俊响. 试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健康权[J]. 西部法学评论,2008(2):118.
- [5] 解志勇. 卫生法基本原则论要[J]. 比较法研究,2019(3):1.
- [6] 岳远雷. 论公民健康权的国家基本责任[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3):99.
- [7] 胡晓翔. 医改指归:医患关系之痛的原因与解决之道的思考[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6.
- [8] 陈云良. 健康权的规范构造[J]. 中国法学,2019(5):64.
- [9] 习近平.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 求是,2020(5):4.
- [10] 江必新. 行政法学研究应如何回应服务型政府的实践[J]. 现代法学,2009(1):24.
- [11] 陈云良. 基本医疗卫生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兼评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J]. 政治与法律,2018(5):102.
- [12] 陈云良. 卫生法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8.



引用格式:吴永辉. 营商法治化背景下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39-46.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06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39-08

营商法治化背景下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研究

Study on the clarity of illegal operation crime clau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siness legalization

吴永辉

WU Yonghui

郑州轻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需要刑法守好法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其符合“良法善治”的基本要求。作为企业家犯罪中的典型罪名,非法经营罪被滥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兜底条款有悖于刑法明确性原则。透过各种争议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兜底条款与刑法明确性的价值追求是否契合,同类规则能否以及如何保障刑法的明确性。基于刑法明确性单一的保障人权功能和综合解读同类规则的判断,要确保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首先,应从宏观上坚守人权保障这一兜底条款发挥社会保护功能不可逾越的红线;其次,应从微观上基于综合解读同类规则对非法经营罪进行立法调整,即将第二项单独设罪,在第四项中明示其规范保护目的,进而按照从形式到实质的顺序合理解释和限定兜底条款的涵摄范围。

关键词:

营商法治化;
非法经营罪;
兜底条款;
明确性

[收稿日期]2021-06-24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20CFX028);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2021-ZZJH-443)

[作者简介]吴永辉(1991—),男,河南省漯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主体蓬勃发展、迅速壮大。截至2019年底,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已达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这些市场主体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产业升级均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受早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影响,我国企业先天被打上了运营发展不规范的“原罪”烙印,游走在法律边缘,加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不断深化,导致企业家犯罪现象日益严峻,俨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14—2018)》显示,我国企业家犯罪案件从2014年的902件增至2018年的2222件,涉案企业家人数由1099人增至2773人,涉案罪名分布广泛,整体呈现递增态势^[1]。在2020年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刑法作为法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能否良好运行直接关系到企业家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能否得到切实维护,因此,必须保障刑法符合“良法善治”的要求。

然而,在企业家犯罪的众多涉案罪名中,有不少与“良法善治”的要求相悖,其中,非法经营罪最为典型。该罪既包括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又包括空白罪状(违反国家规定),还包括定量因素(情节严重),几乎汇集了所有与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刑法明确性原则相悖的立法方式^[2],尤其是兜底条款的设置,为司法者留下了过多的解释空间,增加了司法滥权的风险。正是由于该兜底条款在明确性方面存在先天缺陷,才导致司法解释的不断越权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进而使非法经营罪从扩张走向变异,逐步沦为经济社会方面的“口袋罪”^[3]。因此,要想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现提供切实的刑法保

障,努力维护好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就必须牢牢扎紧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口袋”,确保其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

一、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述评

目前,围绕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争议,学界和实务界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分,与之相对,有“解释论”和“废除论”两种看法。

“肯定说”认为,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理由在于: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下的明确性只是相对明确,而非绝对明确。具体而言,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立法者不可能将所有相关的社会越轨行为都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做到事无巨细,而且立法语言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决定了立法者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概括性表述,以弥合刑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罅隙,所以刑法规范只能达到相对明确的程度,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符合刑法的相对明确性要求。例如,有学者指出,刑法的明确性是相对的,兜底条款是在刑法相对安定性与社会生活复杂多变性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刑法的两大机能(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能为相对明确所包容^[4]。还有学者指出,从表面上看,兜底条款内涵不清、外延不明,似乎缺乏明确性,但其存在具有必然性和优越性。例如,严密刑事法网、增强刑法的适应性、实现个别公正等,内容和适用范围也并非漫无边际,根据同类规则可以加以明确^[5]。与之相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虽然在司法适用中存有被异化现象,但这主要不是因为立法的高度抽象、概括,而是因为司法人员的曲解。基于此,应当按照同类规则对兜底条款进行限缩解释,以合理划定其适用范围^[6]。

“否定说”认为,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不

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理由在于:它是一种内涵和外延均不清楚的高度概括性规定,既难以作为普通国民所理解,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又无法为司法机关提供明确的裁判依据,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例如,有学者认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自身的模糊性和高度概括性使其与刑法明确性原则相冲突,并在实践中导致司法解释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7]。还有学者认为,在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时,需要参照列举事项明确其内涵和外延,但在此之前,国民根本无法通过阅读刑法条文了解其内容,这损害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限制了其行动自由,不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8]。因此,应当在立法上取消非法经营罪^[9]。

我们认为,“肯定说”有两点值得质疑:其一,论证逻辑存在疑问。该说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生成机理和刑法明确性的相对化出发,认为立法者不可能将所有的非法经营行为都在刑法中详细列明,通过设置兜底条款可以弥补列举式规定的不足,增强刑法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而刑法的明确性是相对的,兜底条款正是这种相对明确的体现。显然,该说的论证逻辑是,完全列举式规定体现了绝对明确的要求,但在立法技术上难以实现,且存在处罚漏洞,而兜底条款正是立法者为弥补完全列举式规定的不足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所以,与绝对明确的完全列举式规定相对,兜底条款自然属于相对明确的范畴。但是,兜底条款的必要性或优越性并不能成为其符合相对明确性的理由,二者没有必然关联,换言之,从兜底条款的不可避免性并不能必然地推出其符合刑法明确性的结论。其二,该说一方面认为,兜底条款能为刑法的相对明确性所包容,另一方面又认为,设置兜底条款是为了充分发挥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这就意味着,刑法的明确性通过相对化在人权保障功能之外又

增添了社会保护功能,但这显然与刑法明确性单一的人权保障追求不符。

我们赞同“否定说”的结论,主张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不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但对其所述理由难以认同。“否定说”立足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本身,认为其高度抽象概括,内涵模糊不清,外延指向不明,普通国民据此很难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无法得到保障,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同时,司法人员可以随意对兜底条款进行解释,任意出入人罪。诚然,如果单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自身来看,其确实不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但是,刑法的明确性并不是孤立的,它并不要求构成刑法规范的每个词语的含义都是明确的,只要求刑法规范在整体上具有可理解性和可预测性。虽然兜底条款自身可能缺乏具体内容,但并非法无明文规定,而只是以所属法条列举的事项为前提,从中抽象出该罪的基本特征,以最大限度地涵盖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当性的行为,对其只需遵循同类(质)解释规则即可^[10]。换言之,兜底条款的内容可以通过同类解释规则加以明确。这也是“肯定说”主张解释论的重要理由之一,但是“否定说”并未对此做出有力回应,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具体阐述非法经营罪无法通过同类解释规则加以明确的理由。

二、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透视

综上可知,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争议背后,潜藏的问题症结实际上有两点:一是从价值追求上看,该兜底条款与刑法明确性原则的价值追求是否相契合,换言之,该兜底条款的设置能否为刑法的相对明确所涵摄;二是从技术规则上看,同类规则能否以及如何保证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如果对上述两点持肯定回答,则必然采用“肯定说”并主张运

用解释论明晰该兜底条款的内容,反之,则采用“否定说”并主张在立法上废除该兜底条款。

1. 该兜底条款与明确性原则的价值追求是否相契合

通常认为,兜底条款是为了拾遗补缺、弥补立法漏洞而设,其价值追求是保护社会,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设定同样如此,即为了弥合法律的滞后性,防止处罚遗漏^[11]。而明确性属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追求是保障人权,这样看来,二者似乎相互冲突、难以契合。但是,“肯定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绝对的罪刑法定,而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其价值追求也从单一的保障人权发展为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并重。可以说,刑法中设置大量的兜底条款(当然也包括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既是罪刑法定追求社会保护功能的结果,也是对绝对罪刑法定矫枉过正的适度纠偏^[12]。相应地,作为罪刑法定核心内容的明确性也从绝对发展到相对,它除了具备人权保障功能之外,还具备社会保护功能。这样一来,以保护社会为价值追求的兜底条款自然就可以纳入相对明确的范畴,而无违反刑法明确性原则之义。

但问题在于,罪刑法定原则从绝对发展到相对是否意味着其价值追求也随之从单一的保障人权转化为兼具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保护社会是刑法“天生”就具备的功能,罪刑法定原则的相对化只是在客观上促进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不断健全自身所具备的人权保障功能,即更注重从实质而非形式意义上保障个人权利,这也是为何罪刑法定原则在传统的形式侧面之外又发展出实质侧面的原因所在^[13]。

同样,虽然刑法明确性原则也从绝对发展到了相对,但这并不代表其同时具备了人权保障功能和社会保护功能。因为相对明确是为了

弥补绝对明确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而产生的,其仍属于明确性的范畴,仍要求刑法规范要能为人们所理解和预见,其目的仍是为了给国民提供行为指引,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同时防止法官随意解释,滥用自由裁量权。而且从逻辑上讲,罪刑法定原则经历了从绝对到相对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早期绝对的罪刑法定还是现代相对的罪刑法定,都是为了保障人权,这在刑法理论上基本没有争议。而作为罪刑法定核心内容的明确性原则,同样也从绝对发展到相对,既然罪刑法定始终以保障人权为单一的价值追求,作为其子原则的明确性也应如此。因此,判断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不能通过泛化刑法相对明确的功能将其纳入其中,而应当具体判断该兜底条款对社会保护功能的追求是否突破了刑法明确性原则所设定的人权保障界限,这需要借助同类解释规则加以判断。

2. 同类规则能否以及如何保证该兜底条款的明确性

由前文可知,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和刑法明确性原则在价值追求上并不一致,但是,只要前者对社会保护功能的追求没有突破后者为保障人权所设定的界限,即可认为其符合明确性原则。这正如刑法虽然同时具备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机能一样,但无论二者如何冲突、碰撞,前者都不应损害后者。问题是,如何从技术层面确保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学界的普遍看法是采用同类解释规则。通常认为,同类解释规则是指,如果某一刑法规定在明确列举了几种情形之后,紧跟着如“以及诸如此类”的概括性用语,则此概括性规定只限于未列举的同类情形,而不包括不同类情形^[14]。然而,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同类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极大争议,大体而言,主要有“形式相当说”和“实质相当说”两种观点。

“形式相当说”是指兜底条款的内容要与刑法所列明的事项在行为性质或行为类型上具有相当性。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同质性,是指兜底条款所包含的行为必须与同一法条明确规定的行为在法律性质方面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价值^[15]。“实质相当说”是指兜底条款的内容要与刑法所列明的事项在规范保护目的或危害后果方面具有相当性。例如,有学者认为,兜底条款的同质性判断要从行为实质内涵和规范保护目的两个方面展开,即不仅需要合类型“同”的对比,还需要行为属性“质”的发现^[16]。

不同的判断标准会引起司法适用上的争议。例如,针对放高利贷的行为,主张“形式相当说”的学者认为,该行为属于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所禁止的在非法经营金融业务活动中非法发放贷款的行为,侵犯了银行正常、合法的贷款秩序,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不存在合法性障碍^[17]。2019年“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采用了此种看法。而主张“实质相当说”的学者则认为,虽然放高利贷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其难以纳入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调控范围,因为从实质相当性的角度看,该行为虽然表面上属于“非法经营”,但实质上并未侵犯非法经营罪的法益——特殊行业的准入秩序^[18]。

总之,关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明确性的各种争议,最终都将落脚于对刑法理念的不同侧重和对同类规则的不同解读。我们的基本看法是,现代刑法具有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双重功能,但二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是后者不可逾越之藩篱,因此,对以保护社会为价值追求的兜底条款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其借助刑法明确性的相对化恣意扩张。同时,在适用同类规则判断兜底条款是否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时,不能只注重形式上的相当性或实质上的相

当性,而要综合考虑形式要素和实质要素,这为后文解决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问题奠定了基础。

三、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实现

基于以上分析,要确保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明确性的实现,需要做到两点:一是从宏观上坚守人权保障这一兜底条款发挥社会保护功能不可逾越的红线;二是从微观上准确提取所列举事项的同类项进而进行立法层面上的调整。

1. 坚守人权保障这一兜底条款发挥社会保护功能不可逾越的红线

如前文所述,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是立法者为了严密刑事法网、避免处罚漏洞而有意设定的,其通过抽象、概括的语言表达试图将所有的非法经营行为都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其价值取向是保护社会。而刑法明确性属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其强调立法者制定的刑法规范要清晰、明确、无歧义,能为普通国民所理解和预测,防止司法机关任意解释、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价值取向是保障人权。所以,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明确性背后实质上是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此,有学者从刑法的特性、社会的现实需求、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出发,主张刑法是实行专政的工具,保护社会是其首要功能,具有优先性;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公民的个人权利受到尊重,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受到限制,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具有优先性;还有学者认为,法益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之间的平衡才是最佳状态;另有学者认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刑法对社会的保护通过立法者设定刑法规范加以确立,而从防卫社

会的角度看,罪刑法定的要求已包含在刑法的保护功能之中^[19]。

诚然,保持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之间的平衡固然是最佳状态,但一旦二者发生冲突就必须做出选择,所谓的平衡论最终仍是择一论,最后一种观点语焉不详,并未阐明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直面的问题仍然是,在这两种功能发生冲突、碰撞时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刑法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调控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社会保护功能的发挥是有限度的,不能以损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代价,这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应有之义。因为社会保护功能是所有刑法都具备的,而人权保障功能是法治社会刑法才具备的^[20]。刑法固有的社会保护功能使其天生就具有扩张的冲动和危险,而为了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必须对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加以制约,这样,以限制权力、保障人权为宗旨的罪刑法定原则便应运而生,所以说,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人类社会从人治刑法向法治刑法转变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并不否认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但应对其过度扩张的危险保持警惕,并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其不可逾越之藩篱,这也是我们在设定和适用兜底条款时确保其符合明确性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之所以被滥用,原因之一便是没有切实坚守人权保障是刑法兜底条款发挥社会保护功能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一基本立场。例如,相关司法解释将经营非法出版物、以营利为目的提供网络有偿删帖服务或明知是虚假信息而通过网络提供

有偿发布服务,在疫情灾害期间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等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其背后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此类行为没有其他罪名可以规制,为防止处罚遗漏,将其纳入到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涵摄范围之内。但非法经营罪侵犯的是国家针对特殊商品或经营领域设定的市场准入制度,即经营主体(资格)违法,而上述行为是经营内容违法,根本不存在市场准入的问题^[21]。再如,有些法院将买卖人体器官、倒卖奥运门票、制售网络游戏外挂等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同样也是过度发挥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社会保护功能,逾越了人权保障的红线,忽视了该罪的本质特征(特殊商品或经营领域的市场准入制度),简单地将非法经营理解为违法经营,从而导致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势头。

2. 准确提取所列举事项的同类项进而进行立法上的调整

除在宏观理念上坚守人权保障这一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发挥社会保障功能不可逾越的红线外,还需要在微观技术层面采用同类规则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进行立法层面上的调整。

目前,大多数学者出于维护刑法安定性和增强刑法适应性的考虑,主张通过运用同类规则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进行解释以弥补其在立法层面上不够明确的不足。但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内容难以通过适用同类规则加以明确,原因在于,从同类规则的适用过程来看,首先是明确判断基准,其次是分析系争案型,再次是对比两个案型^[22]。不难看出,明确判断基准是适用同类规则的首要前提,而判断基准是从立法明确列举的事项中概括、提炼出来的,是列

* 参见1998年12月17日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2013年9月6日“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以及2003年5月14日“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

举事项共同特征的集中体现。

就非法经营罪来说,第一项是未经许可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限制买卖物品,第二项是买卖进出口许可证、原产地证明及其他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第三项是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不难看出,第一项和第三项具有共同之处,即二者均直接侵犯了国家针对特殊商品或经营领域所设定的市场准入制度。但是第二项并不能被纳入其中,因为虽然进出口许可证、原产地证明及其他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也涉及经营资格问题,但这些证件本身既不是特殊商品,也不涉及特定的经营领域,其对国家所设定的市场准入制度的侵犯最多是间接性的,因此,应将第二项单独设罪。

正是由于难以从非法经营罪所明确列举的前三项规定中提炼出共同特征作为同类规则的判断标准,所以才无法通过适用该规则合理限定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上文提及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对非法经营罪的不断扩张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当然,如果抛开第二项的规定或直接将这里的证件视为特殊物品,则列举事项的共同之处就是侵犯了国家对特殊商品或经营领域所设定的市场准入制度,以此作为同类规则的判断基准来审视上文中的司法解释或判例,则不难发现,许多行为都很难纳入兜底条款的规制范围。

基于同类规则既要具有形式上的相当性(性质),还要具有实质上的相当性(结果),构成非法经营罪除在形式上缺乏相应的经营许可外,还必须在实质上达到“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程度。以“内蒙古王力军案”为例,从形式上看,王力军确实没有取得粮食收购资格,违反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规定,但从实质

上看,国家之所以要对粮食收购实行市场准入,是为了防止收购者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价格,阻碍粮食流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王力军在农忙时节从附近农户手中收购玉米,经简单加工后运到粮库销售,既没有大量囤积和扰乱市场价格,也没有损害农户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且还解决了农户卖粮难的问题,促进了粮食流通。因此,其行为不具有实质的法益侵害性,不能将其认定为非法经营罪^[23]。

综上分析,从解释论的视角明确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内涵并不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该罪的肆意扩张,因此必须从立法层面上进行调整。首先,应将第二项“买卖进出口许可证、原产地证明及其他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单独设罪;其次,应在第四项兜底条款中直接明示该罪的法益,即将该项修改为“严重扰乱国家针对特殊商品或者领域设定的市场秩序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再次,在此基础上,在适用同类规则解释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时,应先从行为属性切入,判断该行为是否侵犯了国家针对特殊商品或经营领域所设定的市场准入制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应直接将其排除在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应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是否达到了“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程度,唯有二者同时具备方可将其纳入兜底条款的规制范围。

四、结语

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需要各个部门法衔接协调、相互配合,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更应确保自身符合“良法善治”的基本要求。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因与刑法明确性原则相悖而备受诟病,并在司法实践中异化为“口袋罪”,成为悬在企业家头顶的一把“达摩

* 参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

克利斯剑”。透过各种争议,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潜藏的问题症结在于:兜底条款与明确性的价值追求是否契合、同类规则能否以及如何确保兜底条款的明确性。经分析,在宏观上,应当坚守人权保障这一兜底条款发挥社会保护功能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微观上,应当从形式和实质两个角度解读同类规则并据此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进行立法调整,以将其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 [1]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 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14—2018[J].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4):25.
- [2] 陈兴良. 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J]. 中国法学,2011(4):120.
- [3] 高翼飞. 从扩张走向变异:非法经营罪如何摆脱“口袋罪”的宿命[J]. 政治与法律,2012(3):37.
- [4] 王崇青. “抢帽子”交易的刑法性质探析:以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为视角[J]. 政治与法律,2011(1):44.
- [5] 张建军. 论刑法中兜底条款的明确性[J]. 法律科学,2014(2):88.
- [6] 武良军. 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之研究[J]. 环球法律评论,2014(5):33.
- [7] 刘沐阳. 兜底条款的局限性及其实践运用[J]. 人民检察,2014(8):58.
- [8] 张永江,秦星. 我国刑法兜底条款司法适用的完善[J]. 江西社会科学,2015(9):161.
- [9] 徐松林. 我国刑法应取消“非法经营罪”[J]. 法学家,2003(6):111.
- [10] 刘宪权.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抢帽子交易刑法属性辨正[J]. 中外法学,2013(6):1178.
- [11] 滕嘉远. “互联网+”背景下保留“兜底条款”的必须要性分析:以非法经营罪为视角[J]. 学术交流,2020(6):89.
- [12] 丁华宇. 刑法中的堵截性条款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143.
- [13] 周少华. 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J]. 法学研究,2005(3):50.
- [14] 储槐植,江溯. 美国刑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5.
- [15] 何荣功. 刑法“兜底条款”的适用与“抢帽子交易”的定性[J]. 法学,2011(6):154.
- [16] 李谦. 刑法规范中兜底条款的同质性判断标准:以全国首例“恶意刷单”案为切入点[J]. 法律适用,2017(18):39.
- [17] 胡启忠,秦正发. 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法性论辩与司法边界厘定[J]. 社会科学研究,2014(1):79.
- [18] 赵秉志,李昊翰. 民间放高利贷行为入罪问题探讨[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2.
- [19] 马聪. 刑法机能模式及当代中国之选择[J]. 刑法论丛,2009(2):91.
- [20] 陈兴良. 刑法机能的话语转换:刑法目的论的一种探讨路径[J]. 环球法律评论,2008(1):18.
- [21] 郑勇. 非法经营罪的扩张:原因及其对策[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1):100.
- [22] 余文堂. 法律文本:标点、但书及同类规则[J]. 法律适用,2017(17):56.
- [23] 阮齐林. 刑事司法应坚持罪责实质评价[J]. 中国法学,2017(4):57.



引用格式:刘凤伟,刘贺凯.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对策:基于河南省地级市的比较研究[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47-55.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07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47-09

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对策

——基于河南省地级市的比较研究

Measurement and promotion countermeasures on the level of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刘凤伟,刘贺凯

LIU Fengwei, LIU Hekai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产城融合在我国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面临不同的挑战和发展路径。从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两个维度选择27个指标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对河南省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河南省产城融合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郑州、洛阳属于高度融合型城市,焦作属于中度融合型城市,新乡、南阳、许昌、安阳属于低度融合型城市,平顶山、开封、三门峡、漯河、驻马店、鹤壁、商丘属于基本分离型城市,周口、濮阳、信阳属于严重分离型城市。提升河南省产城融合度,应推进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培育主导产业与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关键词:

产城融合;
城镇承载功能;
主成分分析

[收稿日期]2021-06-12

[基金项目]开封市政府决策研究课题(KFKTB2020-17);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计划资助项目(2021-CXTD-12)

[作者简介]刘凤伟(1968—),男,河南省西平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刘贺凯(1997—),男,河南省上蔡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即“产城分离”。推进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有学者就我国产城融合发展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关于产城融合水平测度方面,周作江等^[1-2]运用熵值法和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了珠海市、长株潭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发展程度,得出了产城融合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建设有待加强、产业结构有待提升、公共服务因子和居民收入对产城融合作用突出的结论;汪洋等^[3]测算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产城融合度,并提出了该区域协同发展的策略;唐世芳^[4]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广西的产城融合发展情况,并基于广西各区域的特点提出了产业、城市和人口高效协调发展的对策;马德彬等^[5]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对徐州市铜山区产城融合水平进行了评价。关于产城融合的实现路径方面,张道刚^[6]提出,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产城融合的关键是使产业园区和城镇社区在互促发展中达到空间整合、功能融合;颜丙峰^[7]研究了山东省产城融合发展状况后提出,产城融合应当从功能融合的视角出发,探究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城融合的动力机制和有效实施路径;刘珂等^[8-9]通过对产业新城的研究,提出了通过产业新城建设推进产城融合发展的策略。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大部分研究针对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或城市,以及部分城市群、城市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相对落后的我国中西部地区开展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缺乏对不同城市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产城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实现路径也存在差异,因此,应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产城融合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鉴于此,

本文拟聚焦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河南省,在构建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相结合对河南省17个地级市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河南省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从实现产、城、人融合发展的角度提出促进河南省产城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 产城融合的概念解析

产城融合是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理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产城融合进行理解。

其一,人本导向。产业、城市、人口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产城融合的出发点,人是产城融合发展的核心因素。产城融合应以人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前提下,重点关注产业发展、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就医条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问题。

其二,空间整合。在城镇化进程中,应结合各产业的特点和城市各功能区的特有功能,促进产业与城市功能区的转型与升级,同时精确规划包括产业集聚区、生活居住区、商业服务区、生态保护区等在内的多组团功能分区,实现产业与人口在城市各功能区的合理布局。同时应注重资源环境的良性开发与利用,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景下将绿色发展模式作为新常态,使居民生产与生活融入新空间。

其三,功能融合。在产业集聚方面,应逐步形成以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综合试验区等一大批产业集聚区为依托的经济增长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发挥集聚优势,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在城市功能方面,应完善产业集聚区内外水、电、路、气等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完善重点企业、邻里中心和城市中心区的公共交通体系,提升产业集聚区及其周边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功能,并逐渐完善住房、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服务,以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来带动人口集聚,整体推动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发展。

其四,结构匹配。应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关系的前提下,做到产业发展与资源优势相适应、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匹配、城镇承载功能与人口规模相协调,以产业集聚吸引人才集聚,人才集聚又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形成产业发展—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城镇化发展—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以“产业聚人、城市留人”来达到“产、城、人”互相依托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2. 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比较高,产城融合的重点在于如何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以支撑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而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水平都比较低,因此相对落后地区产城融合既要考虑如何推进产业发展以带动城市发展,又要考虑如何推进城市发展以支撑产业发展。鉴于此,有必要从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两个方面来综合评价产城融合发展水平。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地方GDP,其是衡量一个地区总体经济规模的主要指标。(2)产业结构,其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也可广泛地认为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关系。(3)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衡量一个企业科学技术开发能力的重要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前景的一个直接体现。(4)产业发展绿色成本,其体现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资源二次利用所付出的成本。

(5)工业企业发展指标,其体现了工业企业在面对未来未知环境时所具有的快速适应能力,进而使企业得以进一步运营,实现企业产业发展和目标价值。

城镇承载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镇包容能力,其主要体现在居民多层次的就业与收支水平,造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异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居民生产、生活、就业空间的优化。(2)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其主要通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交通运输能力等城市基础设施得以体现,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加速经济社会活动、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3)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其主要通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予以体现,是指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在确保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资源和环境能够承载的所有单位和人口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活动的总容量。

借鉴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并基于数据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可获得性,从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两个方面构建涵盖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和因子层4个层次共27个指标的产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二、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1. 测度思路

产城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众多影响因素,为减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干扰,使测度结果更加科学合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两个产城融合子系统得分,再利用熵值法计算各子系统权重,最后根据两个子系统的得分与相应权重,通过加权求和计算出各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

表1 产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

| 目标层 | 准则层 | 要素层 | 因子层 | 单位 | 指标属性 |
|----------------|----------------|----------------|---------------|------|------|
| 产城融合度 F |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F_1 | GDP 指标 | GDP | 亿元 | 正向 |
| | | | 人均 GDP | 元 | 正向 |
| | | 产业结构 |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 | 正向 |
| | | |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 | 正向 |
| | | 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 科学技术支出 | 万元 | 正向 |
| | | | R&D 活动人员数 | 人 | 正向 |
| | | | 专利授权数 | 件 | 正向 |
| | | 产业发展绿色成本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 正向 |
| | | | 污水处理率 | % | 正向 |
| | | 工业企业发展 | 工业用电量 | 万千瓦时 | 正向 |
|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 | 个 | 正向 | |
| | 城镇承载功能 F_2 | 城镇包容能力 | 城镇化率 | % | 正向 |
| | | |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 % | 正向 |
| | | |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 % | 正向 |
| | |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 负向 |
| | |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正向 |
| | |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 元 | 正向 |
|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 | | 册/万人 | 正向 | |
| 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 | 每百万人拥有体育馆数 | 个/百万人 | 正向 | |
| | |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 张/万人 | 正向 | |
| |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 平方米 | 正向 | |
| 城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 排水管道长度 | 公里 | 正向 | | |
| |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平方公里 | 正向 | | |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 正向 | | |
| | 公路客运量 | 万人次 | 正向 | |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 正向 | | |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平方米 | 正向 | | | |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资料整理得到,下同

2. 测度方法

(1)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采用降维的思想,将研究对象的多个相关变量(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变量,用来反映原变量提供的主要信息的多元统计方法。这种用较少的因素来代替较多的综合因素进行计算的方法,既能使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又能提高计算的效率和准确性。

(2)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离散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确定指标权重。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其所

占权重就越大,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也就越大。熵值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为主观的不全面性,其计算精准度高,能够更好地解释所需要的研究结果。

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2个子系统在产城融合中的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 数据标准化

正向指标:

$$Y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负向指标:

$$Y_{ij}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其中, Y_{ij} 为标准化矩阵, X_{ij} 为原始数据矩阵。

(2) 计算指标的熵值

$$e_j = -k \sum_{i=1}^n P_{ij} \ln(P_{ij})$$

其中, $k = \frac{1}{\ln(n)}$, $P_{ij} = Y_{ij} / \sum_{i=1}^n Y_{ij}$, $n = 17$ 。

(3) 计算指标权重

$$W_{ij} = (1 - e_{ij}) / \sum_{i=1}^m (1 - e_{ij})$$

其中, $m = 27$ 。

(4) 计算综合权重

$$K_{ij} = \sum_{i=1}^m W_{ij}$$

其中, K_{ij} 为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权重时, $i = 1, m = 11$; K_{ij} 为城镇承载功能权重时, $i = 12, m = 27$ 。

(5) 百分制换算

$$G = \frac{F_j}{F_{\max} - F_{\min}} \times 40 + 60$$

其中, G 为百分制换算后的产城融合度综合得分, F_j 为百分制换算前的综合得分, F_{\max} 为百分制换算前的最大综合得分, F_{\min} 为百分制换算前的最小综合得分。

三、河南省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河南省共有 18 个地级市, 由于济源市的数据缺失较多, 研究中剔除了济源市, 用其余 17 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详细的测算。数据为 2019 年各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 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20》、《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9》、《河南统计年鉴 2020》、2020 年河南省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 2020 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河南省统计局网站等。

1. 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运用 SPSS 26.0 对标准化后的 27 个数据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 2 个子系统的 KMO 度量值均大于 0.5, 显著性水平 Sig 均小于 0.05。这说明所选样本数量充足, 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

SPSS 26.0 软件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自动提取主成分, 得到主成分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具体见表 3。由表 3 可知,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城镇承载功能 2 个子系统的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均大于 85%, 这说明所提取的主成分包含了原始指标的绝大多数信息,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利用熵值法求取 2 个子系统的权重(见表 4)。由表 4 可知, 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系数较大, 相对应的权重也较大, 说明相比城镇承载功能来说,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对于产城融合更为重要。

表 2 主成分分析的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结果

| 子系统 | 取样足够度的 KMO 度量 |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 df | 显著性水平 Sig |
|----------|-----------------|---------------------|------|-------------|
|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 0.639 | 230.864 | 55 | 0.000 |
| 城镇承载功能 | 0.599 | 253.188 | 120 | 0.000 |

表 3 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 主成分 |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 | | 城镇承载功能 | | |
|-----|----------|---------|-----------|--------|---------|-----------|
| | 特征值 | 方差贡献率/% | 累积方差贡献率/% | 特征值 | 方差贡献率/% | 累积方差贡献率/% |
| 1 | 6.156 | 56.962 | 56.962 | 6.854 | 44.840 | 44.840 |
| 2 | 1.704 | 16.488 | 73.449 | 2.170 | 16.561 | 61.402 |
| 3 | 1.372 | 13.470 | 86.920 | 1.939 | 15.119 | 76.520 |
| 4 | — | — | — | 1.581 | 11.883 | 88.403 |

表 4 产城融合各子系统的熵值与权重

| 子系统 | 熵值 e_j | 差异性系数 d_j | 权重 K_j |
|----------|----------|-------------|----------|
|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 0.837 | 0.163 | 0.519 |
| 城镇承载功能 | 0.896 | 0.104 | 0.481 |

根据各城市产业综合发展水平(F_1)、城镇承载功能(F_2)的综合得分与上述利用熵值法确定的各自权重,通过下面计算公式得到各城市的产城融合度 F (见表5):

$$F = 0.519 \times F_1 + 0.481 \times F_2$$

表5 各城市产城融合测度结果与排序

| 排名 | 城市 |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 城镇承载功能 | 产城融合度 | 百分制得分 |
|----|------|----------|--------|--------|-------|
| 1 | 郑州市 | 4.68 | 3.75 | 4.233 | 92.34 |
| 2 | 洛阳市 | 2.05 | 1.96 | 2.007 | 75.33 |
| 3 | 焦作市 | 0.57 | 0.52 | 0.546 | 64.17 |
| 4 | 新乡市 | 0.14 | 0.35 | 0.241 | 61.84 |
| 5 | 南阳市 | 0.28 | -0.25 | 0.025 | 60.19 |
| 6 | 许昌市 | 0.12 | -0.27 | -0.068 | 59.48 |
| 7 | 安阳市 | -0.43 | 0.19 | -0.132 | 58.99 |
| 8 | 平顶山市 | -0.25 | -0.47 | -0.356 | 57.28 |
| 9 | 开封市 | -0.76 | -0.04 | -0.414 | 56.84 |
| 10 | 三门峡市 | -0.62 | -0.2 | -0.418 | 56.81 |
| 11 | 漯河市 | -0.78 | -0.48 | -0.636 | 55.14 |
| 12 | 驻马店市 | -0.6 | -0.8 | -0.696 | 54.68 |
| 13 | 鹤壁市 | -1.24 | -0.19 | -0.735 | 54.38 |
| 14 | 商丘市 | -0.33 | -1.37 | -0.830 | 53.66 |
| 15 | 周口市 | -0.89 | -0.81 | -0.852 | 53.49 |
| 16 | 濮阳市 | -1.13 | -0.66 | -0.904 | 53.09 |
| 17 | 信阳市 | -0.8 | -1.22 | -1.002 | 52.34 |

2. 产城融合度综合评价

测算结果表明,河南省各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度综合得分较低,多数城市处于低水平融合状态,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首先,在17个地级市中,郑州市的产城融合度为4.233,得分最高;信阳市为-1.002,得分最低,在百分制评分中仅为郑州市的57%左右。其中,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和城镇承载功能得分最高的均为郑州市(分别为4.68、3.75),最低的分别为鹤壁市(-1.24)、商丘市(-1.37)。其次,产城融合度综合得分位于前列的是郑州、洛阳、焦作等市,这几个城市的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与城镇承载能力也较高;周口、濮阳、信阳的产城融合度较低,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与城镇承载

能力也处于较低位次。再次,从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得分可以看出:南阳、商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产业发展,城镇发展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支撑产业发展的作用;开封、鹤壁的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并没有在良好的城镇载体上得以有效提升,造成一定程度的“有城无产”。

根据已有产城融合测度和等级划分标准^[3-5],将产城融合综合水平按其分值大小划分为5个等级,按照等级标准把17个地级市分类如表6所示。

表6 产城融合等级划分标准

| 等级类型 | 取值范围 | 城市 |
|-------|--------------------|-------------------------|
| 高度融合型 | $[0.85, +\infty)$ | 郑州、洛阳 |
| 中度融合型 | $[0.45, 0.85)$ | 焦作 |
| 低度融合型 | $[-0.25, 0.45)$ | 新乡、南阳、许昌、安阳 |
| 基本分离型 | $[-0.85, -0.25)$ | 平顶山、开封、三门峡、漯河、驻马店、鹤壁、商丘 |
| 严重分离型 | $(-\infty, -0.85]$ | 周口、濮阳、信阳 |

郑州、洛阳、焦作三市的产城融合度较高,为高度、中度融合型城市,原因主要是上述三市在地理位置上是各类国家发展战略和省内发展战略规划与建设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又得益于郑州大都市区的建设与带动,是全省产业分布最密集、产业结构最为合理、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在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强大的政策支持、优越的地理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人口规模效应,是这三个城市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周口、濮阳、信阳三市的产城融合度最低,原因主要是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弱(根据熵值法计算各地级市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得分,三市分别位于第14、17、11名),产业结构不合理(得分分别位于第11、13、17名),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偏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造成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得分分别位于第 15、16、14 名)。又加之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和商业、休闲娱乐等设施配套不足,难以满足居民基本需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又亟待完善,造成城镇承载功能水平较低(得分分别位于第 15、16、13 名),“产城分离”现象较为突出。

3. 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评价,我们把影响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产业集聚水平、科技创新能力、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均产出水平、城市支撑能力等几个方面。

其一,产业集聚水平。从河南省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来看,排名较高的郑州和洛阳在产业综合发展上均具有较高水平,产业集聚水平也较高。例如,郑州市已形成新材料产业、现代食品制造业、铝和铝精深加工业等七大主导产业和电子信息、汽车与装备制造两个 5000 亿级产业集群;洛阳市近年来也在努力打造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高端石油化工加工和生物制药等重点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集聚发展新态势,不断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其二,科技创新能力。根据熵值法的计算结果发现,17 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得分与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得分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0.91。就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郑州、洛阳两市而言,目前郑州市拥有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中国船舶第七一三研究所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强,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发展深度融合。洛阳市在原有的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等高校和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洛阳国际科技创新产业园等众多科技创新力量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河南省塑料模具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河南省齿轮制造与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两家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了洛阳市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

其三,服务业发展水平。郑州市在坚持产业立城和推动优势产业集聚发展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等产业发展,服务业规模和发展水平持续提升。2019 年,郑州市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 58.95%,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较为发达的服务业使其产城融合优势较为突出。而驻马店、周口、鹤壁等地的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第二产业占比过高,第三产业占比过低,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导致产城融合度较低。

其四,人均产出水平。人均 GDP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较大。人均 GDP 水平越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能够把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将资源投入到产业发展上,难以协调好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将 17 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度得分与 2019 年人均 GDP 进行比较,计算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7,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

其五,城市支撑能力。从河南省产城融合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商丘市城市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产业发展,其产城融合处于低水平状态。目前商丘市共规划建设有 11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形成了以先进装备制造、煤化工、铝精深加工、制冷装备、医药健康、纺织服装等为主导的众多特色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市的产业发展。但由于城镇承载功能较弱(城镇承载功能得分全省最低),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不协调,城镇包容力低,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明显,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影响了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对比来看,鹤壁市的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虽然排名最低(位于全省最后一位),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能力较差,但其城镇承载功能得分位于全省第7名,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休闲娱乐设施等较为完善,城市资源环境与绿化水平较为先进,使其产城融合度在全省排第13名。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 结论

从整体上看,河南省产城融合整体水平不高,且各地级市存在明显差异,郑州、洛阳属于高度融合型城市,焦作属于中度融合型城市,新乡、南阳、许昌、安阳属于低度融合型城市,平顶山、开封、三门峡、漯河、驻马店、鹤壁、商丘属于基本分离型城市,周口、濮阳、信阳属于严重分离型城市。在推动产城融合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中,产业集群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异常突出,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大,创新资源日益集中,显著地提升了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并伴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镇承载能力的提升,引起人口集聚,提升了城市的产业与城镇功能,促进了产城融合发展。

2. 对策建议

其一,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为产城融合提供人力支持。河南省各地级市应进一步加强产业规划,结合各地的优势产业基础,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现代食品制造、新能源制造、生物制药等新兴领域,立足于产业升级和集群式发展,加快形成产业链要素资源集聚、产业特色明显、综合配套能力完备的集聚发展态势,以此带动人口集聚,拉动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提升,实现产业发

展集群化、高端化与人口活力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其二,坚持改革创新,为产业发展与产城融合提供持续动力。应重视创新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型企业等创新主体的产业功能创新作用,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对于科技创新能力最低的三门峡、濮阳、鹤壁等市来说,由于缺乏有实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充分利用其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创新资源,不断完善创新机制,并及时有效地予以资金支持,促进产业发展,同时推进无线城市、智慧城市等现代化建设,打破传统发展体系,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其三,培育主导产业,拓展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各市在确定主导产业时,应结合当地产业基础推进地方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同时还应树立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理念,把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全力打造现代服务业的新优势与新动能,进而促进产城融合。例如,开封市在对原有老城区进行城市功能升级与旧城改造的同时,应基于自身文化旅游城市的特殊定位,逐步将现代服务业确立为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休闲娱乐业和大型商贸业,以现代服务业带动产业发展。

其四,统筹完善城市功能配套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保障。对于平顶山、漯河、濮阳、驻马店、周口、信阳、商丘等城镇承载功能较弱的城市,首先应在完善城市中心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商业服务设施的同时,加快完善产业园区、邻里中心和城市中心区的公共交通体系,以加强新城区、产业园区及其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功能建设,促进城镇功能配套设施完善;其次应推进户籍、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实现更加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将城市打造成现代化的宜业宜居地,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 [1] 周作江,张栋梁,王英行,等. 珠海市产城融合测度研究[M]//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规划60年:成就与挑战——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3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309.
- [2] 周作江,周国华,王一波,等. 环长株潭城市群产城融合测度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8.
- [3] 汪洋,景亚萱.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城融合测度及其协同策略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2019(3):47.
- [4] 唐世芳. 产城融合发展的测度及路径优化:以广西为例[J]. 商业经济研究,2020(8):158.
- [5] 马德彬,简晓彬,沈正平,等. 徐州市铜山区产城融合发展的测度与比较[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1):14.
- [6] 张道刚.“产城融合”的新理念[J]. 决策,2011(1):1.
- [7] 颜丙峰. 产城融合发展的现实考量与路径提升:以山东省产城融合发展为例[J]. 山东社会科学,2017(5):184.
- [8] 刘珂,乔钰容. 产业新城对我国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与路径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90.
- [9] 陈昱,朱梦珂,苏旭阳.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产业新城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97.



引用格式:焦晓钰. 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影响与对策[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4): 56 - 64.

中图分类号: C97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2186/2021. 04. 008

文章编号: 2096 - 9864(2021)04 - 0056 - 09

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影响与对策

Change, influ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abor cost in Henan province

焦晓钰

JIAO Xiaoyu

郑州轻工业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基于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河南相关宏观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河南省城镇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呈现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劳动力成本总体上上升并不明显,但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产业的城镇单位工资变化有显著差异;二是职工工资提高导致社保缴费基数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但社保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效应有所显现;三是生产率维度下的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较小。由于劳动力成本变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劳资要素匹配作用于企业和地区发展,故在延续部分领域廉价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同时,应推动有条件企业将竞争优势转移到依赖技术和知识创新驱动生产效率提升,进而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来。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市场;
工资水平

[收稿日期] 2021 - 03 - 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CJY017);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6 - QN - 194); 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014BSJJ095)

[作者简介] 焦晓钰(1983—), 女, 河南省郑州市人, 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劳动关系、劳动经济。

劳动力成本变化不仅直接关乎企业和劳动者的自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社会民生的发展。充足的人力资源长久以来为人口大省河南弥补发展短板、获取竞争优势、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种劳动力资源优势可否持续与劳动力成本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如何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变化,协调好其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河南“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亟待解决的问题。

学界对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关注自进入新世纪后日益增多。早期研究集中于对我国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的预测,形成了两个主要分支:一是从宏观层面考察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检验我国是否已进入“工资侵蚀利润”发展阶段^[1-3],指出企业生产成本中工资支出不断增加,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亦随经济发展呈现由下降到上升的U型变化,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利润占GDP的比重始终过高^[4];二是从企业层面剖析以工资水平与社会保险福利为主要构成的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即将或已经处于上升态势^[5-7]。2010年后学界研究开始转向地区性劳动力成本变化。李文溥等^[8]的研究显示,当地劳动者工资水平相对于经济增速提升较慢;而对四川、安徽、江西的研究表明,当地劳动力成本总体增长较快,但单位劳动力成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9-11]。

劳动力成本变化除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有关外,还可归因于人口与教育^[12]、劳动立法等制度^[13]、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7,11]等因素。劳动力成本增长,宏观层面上有助于加快第二、三产业升级^[14],拉动居民消费^[15],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16],优化地区就业结构^[10],但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17];微观层面上

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18],但这一激励作用有限^[19],企业可能因此压缩在职培训时长^[20]。

综上,既有研究大多使用2008年之前的数据,有关金融危机冲击下地区经济与企业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后的劳动力成本变化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而诸多仅以职工工资指代劳动力成本的实证研究可能存在低估问题。鉴于此,本文拟选取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劳动力资源大省——河南为研究对象,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对该省城镇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状况、影响和应对策略展开本土化研究,以期把握劳动力成本变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为推动当地企业创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城镇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

劳动力成本泛指用人单位因雇佣社会劳动力而发生的一切费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劳动力成本除包含工资、薪酬、劳动所得外,还涵盖因雇佣员工所发生的由雇主承担的员工培训费用、住房费用、招聘费用和相关的税收成本等^[21]。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通常随经济社会发展呈逐步上升趋势。就河南整体劳动力成本而言,伴随经济增速,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进入新常态呈现起伏放缓、稳中向好的态势,各细分领域的变化也并非呈现简单的递增趋势。

1. 工资维度的劳动力成本变化

(1) 总体工资变化情况

作为构成劳动力成本最主要的来源,职工工资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走向。从绝对数来看(见图1),河南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18年首次突破6万元,达63174元,是1978年590元的107倍,有了大幅度提升。分阶段比较增幅可知,在

1978—2008年的30年里,平均工资增幅每10年上一个台阶,即(第一、第二、第三个10年)分别增长了149.15%、283.74%和333.22%,但在2008—2018年的最近10年内,平均工资增幅却大幅缩小,仅为158.51%*。从平均工资年增长率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仅为9.15%,在1994年达到33.98%的峰值后,又震荡式回落至2018年的13.84%。

结合经济发展情况看(见图2),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2014年之前,河南省年度城镇职工工资增长率大都低于同期GDP增长率,并未实现同步增长;但在之后的五年里,城镇职工工资的增长一直领先经济的增长,2018年前者增长率达12.10%,高出后者4.65个百分点。

(2) 各行业工资变化情况

2013—2018年河南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排名、增长率见表1。由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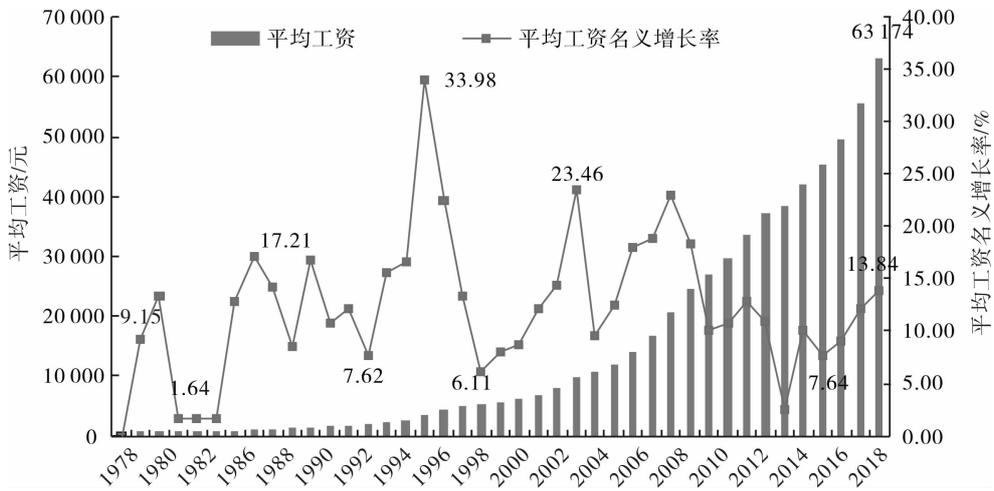


图1 1978—2018年河南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2017年及其之前年度数据来自《2018年河南统计年鉴》;2018年度数据来自河南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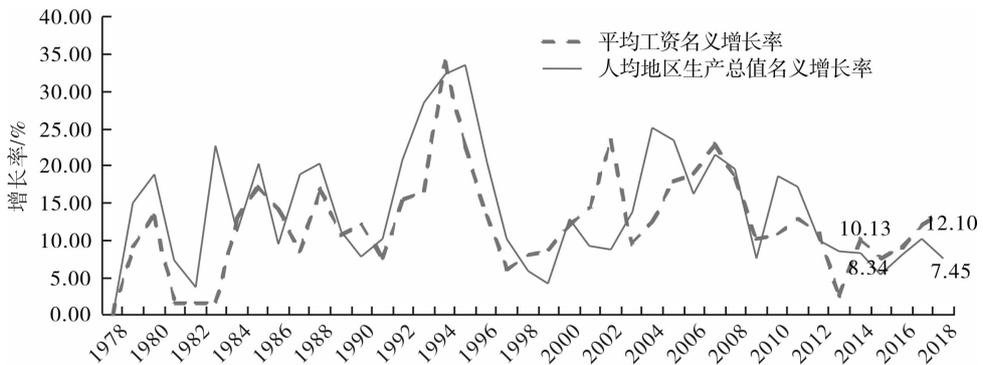


图2 1978—2018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 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和2018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590元、1470元、5641元、24438元和63174元。

表1 2013—2018年河南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排名、增长率

| 行业 | 2013 | | 2014 | | 2015 | | 2016 | | 2017 | | 2018 | | 2013—2018 增幅/% |
|----|--------|----|--------|----|--------|----|--------|----|---------|----|---------|----|-------------------|
| | 绝对数/元 | 排名 | 绝对数/元 | 排名 | 绝对数/元 | 排名 | 绝对数/元 | 排名 | 绝对数/元 | 排名 | 绝对数/元 | 排名 | |
| 全体 | 38 301 | - | 42 179 | - | 45 403 | - | 49 505 | - | 55 495 | - | 63 174 | - | 64.94 |
| A | 62 835 | 1 | 69 223 | 1 | 74 441 | 1 | 91 212 | 1 | 103 314 | 1 | 116 047 | 1 | 84.69 |
| B | 47 717 | 4 | 53 509 | 3 | 56 866 | 4 | 59 171 | 5 | 68 353 | 5 | 83 301 | 2 | 74.57 |
| C | 47 671 | 5 | 52 779 | 4 | 60 671 | 3 | 62 467 | 3 | 72 373 | 3 | 79 543 | 3 | 66.86 |
| D | 53 634 | 2 | 61 076 | 2 | 65 713 | 2 | 66 658 | 2 | 69 799 | 4 | 79 134 | 4 | 47.54 |
| E | 43 526 | 7 | 49 301 | 7 | 53 308 | 5 | 61 045 | 4 | 74 914 | 2 | 77 481 | 5 | 78.01 |
| F | 44 633 | 6 | 49 426 | 6 | 52 099 | 6 | 55 485 | 6 | 61 455 | 7 | 71 392 | 6 | 59.95 |
| G | 42 099 | 8 | 46 419 | 8 | 50 152 | 7 | 55 087 | 7 | 62 807 | 6 | 71 053 | 7 | 68.78 |
| H | 36 348 | 11 | 38 824 | 11 | 42 587 | 11 | 50 552 | 9 | 59 783 | 8 | 68 197 | 8 | 87.62 |
| I | 36 555 | 10 | 42 426 | 9 | 47 591 | 9 | 51 908 | 8 | 58 161 | 9 | 67 815 | 9 | 85.51 |
| J | 51 158 | 3 | 51 239 | 5 | 48 777 | 8 | 46 833 | 11 | 56 661 | 10 | 66 394 | 10 | 29.78 |
| K | 37 594 | 9 | 41 847 | 10 | 45 429 | 10 | 48 503 | 10 | 53 501 | 11 | 58 396 | 11 | 55.33 |
| L | 33 759 | 15 | 36 690 | 15 | 39 990 | 15 | 43 592 | 14 | 46 683 | 16 | 53 682 | 12 | 59.02 |
| M | 33 856 | 14 | 38 425 | 13 | 41 283 | 13 | 44 753 | 12 | 48 836 | 12 | 53 163 | 13 | 57.03 |
| N | 33 951 | 13 | 37 944 | 14 | 41 338 | 12 | 43 783 | 13 | 46 854 | 14 | 52 474 | 14 | 54.56 |
| O | 34 965 | 12 | 38 679 | 12 | 41 060 | 14 | 40 417 | 16 | 46 979 | 13 | 51 501 | 15 | 47.29 |
| P | 31 679 | 16 | 35 771 | 16 | 37 552 | 16 | 41 903 | 15 | 46 699 | 15 | 47 609 | 16 | 50.29 |
| Q | 27 878 | 18 | 30 482 | 18 | 33 857 | 18 | 36 848 | 17 | 39 522 | 18 | 45 677 | 17 | 63.85 |
| R | 25 268 | 19 | 28 849 | 19 | 34 941 | 17 | 36 785 | 18 | 40 990 | 17 | 44 314 | 18 | 75.38 |
| S | 27 895 | 17 | 31 010 | 17 | 33 854 | 19 | 36 591 | 19 | 38 932 | 19 | 41 804 | 19 | 49.86 |

注:A代表金融业;B代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C代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D代表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E代表卫生和社会工作;F代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代表教育;H代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I代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J代表采矿业;K代表房地产业;L代表批发和零售业;M代表建筑业;N代表制造业;O代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P代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Q代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R代表农、林、牧、渔业;S代表住宿和餐饮业

数据来源: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和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

可知,过去五年里几乎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其中,金融业一直稳居最高,2018年更高达116 047元,是所有行业平均工资数的1.84倍;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3 301元)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79 543元),且前者2018年增长率达21.87%,居行业之首。值得注意的是,五年来河南省行业工资排名垫底的始终是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其2018年工资水平依次为41 804元、44 314元和45 677元,分别仅为同期所有行业年均工资63 174元的66.2%、70.2%和72.3%。从工资增幅看,五年间全省行业年均工资总体增长64.94%,其中,增幅最大的分别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业(87.6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85.51%)和金融业(84.69%),而增幅最小的为采矿业(29.78%),且受2013年国家资源开采政策收紧影响,该行业工资水平从先前排行第三一路下滑至2018年的第十。

(3)各单位工资变化情况

2011—2017年河南城镇各类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见表2。由表2可知,自“十二五”开局以来,除其他单位外的各类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呈持续平稳增长态势,但增幅明显有别。尽管七年间,集体单位和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分别达116.37%和95.90%,均高于国有单位,但国有单位平均工资水平始终位列第一,且增长数额最大,七年上涨了30 791元,进而导致其与其

他单位平均工资差额从 17 145 元扩大到 29 955 元。此外,一个重要信号是,进入“十三五”以来,国有单位工资年增速开始反超其他单位。

(4)各产业工资变化情况

2010—2017 年河南城镇单位各产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变化见图 3。由图 3 可知,2010—2017 年第一、二、三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显著提升,分别增长了 135.13%、66.54% 和 106.09%,但产业之间尤其是第二与第三产业间的工资差距却在拉大。2010 年第三产业平均工资为 30 256 元,仅比第

二产业高 729 元,但 2017 年第三产业平均工资已达 62 353 元,较第二产业的工资差额扩大到 13 180 元,且前者是后者的 1.27 倍。

2. 社会保险维度的劳动力成本变化

我国社会保险是以国家为主体、由法律强制实施、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缴费的社会保障制度。因各地市社保缴费基数、比例不尽相同,本文以经济实力最强、企业最多、社保缴费基数最高的省会城市——郑州市为例,来揭示以社会保险费用衡量的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化。

依据我国社保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

表 2 2011—2017 年河南城镇各类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

| 年份 | 国有单位 | | 集体单位 | | 其他单位 | | 私营单位 | |
|------|--------|-------|--------|--------|--------|-------|--------|-------|
| | 绝对数/元 | 增长率/% | 绝对数/元 | 增长率/% | 绝对数/元 | 增长率/% | 绝对数/元 | 增长率/% |
| 2011 | 35 894 | 12.44 | 24 397 | 17.47 | 18 749 | - | 33 719 | 13.27 |
| 2012 | 39 948 | 11.29 | 28 103 | 15.19 | 21 255 | 13.36 | 37 145 | 10.16 |
| 2013 | 42 831 | 7.22 | 33 954 | 20.82 | 23 936 | 12.62 | 36 765 | -1.02 |
| 2014 | 47 258 | 10.34 | 38 288 | 12.76 | 27 414 | 14.53 | 40 435 | 9.98 |
| 2015 | 50 662 | 7.2 | 42 058 | 9.85 | 30 546 | 11.43 | 43 633 | 7.91 |
| 2016 | 57 333 | 13.17 | 46 168 | 9.77 | 33 312 | 9.06 | 46 451 | 6.46 |
| 2017 | 66 685 | 16.31 | 52 788 | 14.34 | 36 730 | 10.26 | 50 676 | 9.10 |
| 变化幅度 | 30 791 | 85.78 | 28 391 | 116.37 | 17 981 | 95.90 | 16 957 | 50.29 |

注:变化幅度指各类单位 2017 年职工平均工资较 2011 年的变化额和变化率;数据来源于《2018 年河南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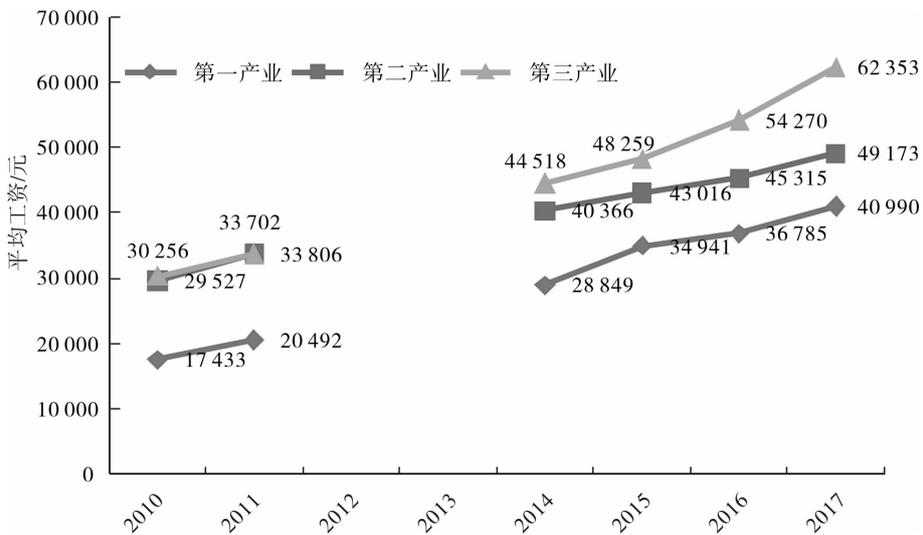


图 3 2010—2017 年河南城镇单位各产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变化

注:由于 2012、2013 两个年度相关数据缺失,故图中出现间隔;数据来源于历年《河南统计年鉴》

60%~300%的规定,以及2018年《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报告的56%以上的企业都在以最低标准为员工缴纳社保的现状,本文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来核算企业所承担的最低社保费用。

2011—2019年郑州市企业社会保险“五险”缴费比例和应缴数额见表3。由表3可知,2011年以来,郑州市企业“五险”应缴比例总和不断下降,2019年降至26.2%。但与此同时,社保缴费基数因全市工资水平连年上涨而不断提高,导致企业每月应缴社保费用不降反增。直到2019年企业社保缴费基数由“郑州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调整为“上年度河南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加之缴费比例下降,最终使企业社保应缴数额减少为719.19元,较上年度下降30.11%。可见,调整缴费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继而降低其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但调整空间有限,是否可持续亦有待检验。

表3 2011—2019年郑州市企业社会保险“五险”缴费比例和应缴数额

| 年份 | 上年度 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 /元 | “五险”缴费 基数下限 ^② /元 | 月应缴 “五险” 总比例 ^③ /% | 企业月 应缴额 /(元/人) | 增长率 /% |
|------|----------------------------|-----------------------------------|---------------------------------------|----------------------|-----------|
| 2011 | 32 779 | 1638.95 | 31.5 | 516.27 | - |
| 2012 | 35 541 | 1777.05 | 31.5 | 559.77 | 8.43 |
| 2013 | 41 480 | 2074.00 | 31.5 | 653.31 | 16.71 |
| 2014 | 44 622 | 2231.10 | 31.5 | 702.80 | 7.57 |
| 2015 | 49 279 | 2463.95 | 31.0 | 763.82 | 8.68 |
| 2016 | 52 987 | 2649.35 | 29.7 | 786.86 | 3.02 |
| 2017 | 61 149 | 3057.45 | 29.7 | 908.06 | 15.40 |
| 2018 | 70 486 | 3524.30 | 29.2 | 1029.10 | 13.33 |
| 2019 | 54 900 ^① | 2745.00 | 26.2 | 719.19 | -30.11 |

注:①2019年郑州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上年度河南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之前年度均为“郑州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②企业“五险”缴费基数下限是按相关规定由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计算得出。③月应缴“五险”总比例是根据每年市社保局公布的本年度企业各险种应缴比例加总求得

数据来源:根据郑州市社会保障局每年发布的社保缴费通知中的相关信息整理而成

3. 生产率维度下的劳动力成本变化

判断以工资为主体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否应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基础之上^[22],只有劳动力成本及其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才可能削弱企业的比较优势或竞争力。借鉴既有研究,本文通过计算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除以其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即单位劳动成本(ULC),来进一步揭示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因缺少包含农村就业人员在内的平均工资数据,本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占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重来计算城镇单位的ULC。

2010—2017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占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重变化见表4。由表4可知,2010年以来,河南省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逐年递增,从而使全省劳动生产率总体提高71%。这主要得益于信息、科研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的带动。2017年河南第三产业全员生产率达90 741元/(人·年),较2010年提高了111%,而同期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增幅均相对较小,尤其是第二产业仅提高了30%。与此同时,第一、二、三产业的城镇单位职工工资均持续增长且增幅较大,从而导致除第三产业略有下降外,第一、第二产业的ULC都明显上升,即分别从1.50和0.38增长到2.51和0.48,增幅分别为68%和28%,全省总体的ULC也随之增长了9%。

二、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分析

1. 影响机理分析

以工资为核心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在一定因素制约下会影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效率工资理论,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可以带来员工高效率、高忠诚和企业的高绩效。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直接增加其即期生产费用和成本,削弱产品价格优势。但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可提

表4 2010—2017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占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重变化

| 年份 | 总体 | | | 第一产业 | | | 第二产业 | | | 第三产业 | | |
|------|--------|--------|------|--------|--------|------|--------|---------|------|--------|--------|------|
| | 年均工资 | 全员生产率 | 比重 | 年均工资 | 全员生产率 | 比重 | 年均工资 | 全员生产率 | 比重 | 年均工资 | 全员生产率 | 比重 |
| 2010 | 29 819 | 38 625 | 0.77 | 17 433 | 11 659 | 1.50 | 29 527 | 77 797 | 0.38 | 30 256 | 42 971 | 0.70 |
| 2011 | 33 634 | 44 130 | 0.76 | 20 492 | 12 713 | 1.61 | 33 806 | 86 350 | 0.39 | 33 702 | 49 308 | 0.68 |
| 2012 | 37 338 | 47 544 | 0.79 | - | 13 795 | - | - | 89 274 | - | - | 53 824 | - |
| 2013 | 38 301 | 50 932 | 0.75 | - | 14 746 | - | - | 85 696 | - | - | 65 224 | - |
| 2014 | 42 179 | 54 276 | 0.78 | 28 849 | 15 296 | 1.89 | 40 366 | 89 525 | 0.45 | 44 518 | 70 988 | 0.63 |
| 2015 | 45 403 | 56 376 | 0.81 | 34 941 | 15 330 | 2.28 | 43 016 | 89 926 | 0.48 | 48 259 | 76 880 | 0.63 |
| 2016 | 49 505 | 60 242 | 0.82 | 36 785 | 15 721 | 2.34 | 45 315 | 94 066 | 0.48 | 54 270 | 82 602 | 0.66 |
| 2017 | 55 495 | 66 037 | 0.84 | 40 990 | 16 305 | 2.51 | 49 173 | 101 458 | 0.48 | 62 353 | 90 741 | 0.69 |
| 增幅 | 86% | 71% | 9% | 135% | 40% | 68% | 67% | 30% | 28% | 106% | 111% | -2% |

注:①年均工资单位为元;全员生产率单位为元/人·年。②比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全员生产率,即城镇单位的ULC。③因缺少2012、2013两年的分产业工资数据,故无法计算相应的比重。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2018》

升工人偷懒、怠工、离职的机会成本,激励在岗工人更加努力工作,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对企业的忠诚度,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工资水平可以为企业筛选出高素质的员工,吸引到更高技能、更高素质的新员工,或通过购买先进设备,完成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和技术工人对非技术工人的替代,进而倒逼企业加快创新,获取新的增长点。对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高工资是一种有力的市场信号,可帮助企业搜寻匹配到更具生产效率的技术人才,或激励技术员工不断加强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在提升效率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培训、监督等管理费用。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理论上可通过多种路径转化为加快企业效率提升、技术创新的诱因。

对于一个地区而言,由于理性经济人具有趋利性,所以工资作为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甄别出生产技术、劳动能力不同的劳动者,从而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的行业、产业内部实现劳动力资源与其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合理匹配。因此,工资较高的领域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力的进入和集聚,加速原有低技术劳动力的替代或流出,从而推动该地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2. 影响效应分析

1979—2017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产值变化和相关性见表5。由表5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在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不断上涨的同时,全员劳动生产率、地区GDP和人均GDP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且年均工资与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985、0.9988和0.9987,并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此外,结合河南分产业的就业数据可知,第一、二、三产业的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近30年均明显增长,但第二产业凭借其在全省经济中的主导地位(2018年占地区GDP的47.4%),其平均工资水平一直领先于其他两个产业。与此同时,除第一产业外,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份额亦均持续上升。但随着近年来第三产业工资增速提高,其与第二产业工资差距大幅缩小,使得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在2016年首超第二产业,成为河南省吸纳劳动力数量最多的产业。由此推断,工资水平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扩大就业。

三、积极应对河南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劳动力成本总体上攀

表5 1979—2017年河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产值变化和相关性

| 年份 | 平均工资 /元 | 全员劳动 生产率 /(元/(人·年)) | 地区 GDP /亿元 | 人均 GDP /元 |
|------|------------|---------------------------|---------------|--------------|
| 1979 | 644 | 669 | 190.09 | 266.7 |
| 1980 | 730 | 790 | 229.16 | 316.7 |
| 1981 | 742 | 837 | 249.69 | 340.1 |
| 1982 | 754 | 851 | 263.30 | 353.0 |
| 1983 | 767 | 1019 | 327.95 | 432.9 |
| 1984 | 866 | 1115 | 370.04 | 481.6 |
| 1985 | 1015 | 1316 | 451.74 | 579.7 |
| 1986 | 1159 | 1413 | 502.91 | 635.3 |
| 1987 | 1258 | 1652 | 609.60 | 755.8 |
| 1988 | 1470 | 1946 | 749.09 | 909.9 |
| 1989 | 1628 | 2165 | 850.71 | 1 012.3 |
| 1990 | 1825 | 2328 | 934.65 | 1 090.6 |
| 1991 | 1964 | 2519 | 1 045.73 | 1 201.2 |
| 1992 | 2269 | 2994 | 1 279.75 | 1 452.3 |
| 1993 | 2646 | 3803 | 1 660.18 | 1 864.6 |
| 1994 | 3545 | 5011 | 2 216.83 | 2 466.8 |
| 1995 | 4344 | 6673 | 2 988.37 | 3 297.1 |
| 1996 | 4924 | 7947 | 3 634.69 | 3 978.4 |
| 1997 | 5225 | 8545 | 4 041.09 | 4 388.9 |
| 1998 | 5641 | 8774 | 4 308.24 | 4 643.0 |
| 1999 | 6136 | 8854 | 4 517.94 | 4 831.5 |
| 2000 | 6877 | 9377 | 5 052.99 | 5 449.7 |
| 2001 | 7868 | 9980 | 5 533.01 | 5 959.1 |
| 2002 | 9714 | 10 935 | 6 035.48 | 6 487.0 |
| 2003 | 10 639 | 12 422 | 6 867.70 | 7 375.9 |
| 2004 | 11 970 | 15 427 | 8 579.42 | 9 228.0 |
| 2005 | 14 119 | 18 884 | 10 621.56 | 11 383.0 |
| 2006 | 16 791 | 21 813 | 12 412.86 | 13 225.0 |
| 2007 | 20 639 | 26 218 | 15 064.73 | 16 067.0 |
| 2008 | 24 438 | 31 131 | 18 068.47 | 19 233.0 |
| 2009 | 26 906 | 33 177 | 19 547.6 | 20 668.0 |
| 2010 | 29 819 | 38 625 | 23 157.64 | 24 516.0 |
| 2011 | 33 634 | 44 130 | 27 007.46 | 28 742.0 |
| 2012 | 37 338 | 47 544 | 29 681.79 | 31 586.0 |
| 2013 | 38 301 | 50 932 | 32 278.04 | 34 304.0 |
| 2014 | 42 179 | 54 276 | 35 026.99 | 37 166.0 |
| 2015 | 45 403 | 56 376 | 37 084.20 | 39 209.0 |
| 2016 | 49 505 | 60 242 | 40 249.23 | 42 341.0 |
| 2017 | 55 495 | 66 037 | 44 552.83 | 46 674.0 |

| | | | |
|---------------------------|------------|------------|------------|
| 工资与各 变量之间 的相关 系数 | 0.998 5*** | 0.998 8*** | 0.998 7*** |
| P 值 | 0.0000 | 0.0000 | 0.0000 |

注:***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

升,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领域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不尽相同。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进程中,除延续部分产业、行业、企业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外,应积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将竞争优势转移到依赖技术和知识创新驱动生产效率提升,进而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来。

其一,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产业布局和要素投入结构,形成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与利润、工资同步增长的协同效应。应依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本地交通、物流、人力资源等优势,承接沿海地区先进产业与技术转移;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采掘、建筑等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升级;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通过差异化扶持政策,培育以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通过产业布局的优化推动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吸引高质量人才,进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劳动者工资水平。

其二,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公有制经济的调节作用,平衡上下游产业链中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利润水平,缩小不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所有制经济的调节作用,控制上游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过度压榨下游私营企业的成本空间;另一方面,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防止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的利润进一步拉大,从而为缩小企业间不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创造条件。

其三,优化人才政策,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和人才服务平台,形成基于人力资本优势而非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新模式。知识经济时代不仅要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更应深度挖掘本土人力资源潜力。应通过健全职业教育和在职

培训体系,创新企业人才评价机制,建立以实现自我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等举措,促进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结构优化与人力资本集聚,以增强企业人才创新力和竞争力。

其四,鼓励企业开展实质性工资集体协商,使劳动者共享企业发展红利,激发其创造活力,以增强企业相对劳动力成本优势。应通过加强政府指导与监督,促进企业层级工资集体协商提质增效,实现劳动者收入与企业盈利增速同步,以高工资激励劳动者加强经验、技术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强化企业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优势,实现劳资共赢。

参考文献:

- [1] 李实,岳希明.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J]. 理论参考,2005(4):50.
- [2] 徐现祥,王海港.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及成因[J]. 经济研究,2008(2):106.
- [3]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 经济研究,2009(1):70.
- [4] KUIJS L.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5.
- [5] 姚先国. 民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J]. 浙江社会科学,2005(2):78.
- [6] 蔡昉. 劳动力成本提高条件下如何保持竞争力[J]. 开放导报,2007(2):26.
- [7] 张本波.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和影响[J]. 宏观经济管理,2008(8):40.
- [8] 李文溥,陈贵富. 工资水平、劳动力供求结构与产业发展型式:以福建省为例[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5.
- [9] 潘明霞,张春清. 工业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四川省250户企业1996—2011年劳动力成本变化分析[J]. 金融发展评论,2012(7):53.
- [10] 陈秀娟. 安徽省劳动力成本变动及其影响研究[D]. 合肥:安徽财经大学,2013.
- [11] 冷晴,龚丹,韩梅. 江西省劳动力成本变动因素及影响分析[J]. 中国统计,2014(2):56.
- [12] 金三林. 我国农民工工资仍将保持较快上涨[N]. 中国税务报,2013-02-27(008).
- [13] 都阳,屈小博. 劳动合同法与企业劳动力成本:基于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企业的调查与分析[J]. 山东经济,2010(3):46.
- [14] 刘丽,任保平. 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工资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J]. 经济经纬,2012(2):56.
- [15] 郑延智,黄顺春. 劳动力成本、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J]. 经济经纬,2013(2):18.
- [16] 程承坪,张旭,程莉. 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80—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2(4):60.
- [17] 卓俭华,朱训伟. 当前中国用工成本上升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 经济与管理,2011(7):88.
- [18] 林炜. 企业创新激励:来自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解释[J]. 管理世界,2013(10):95.
- [19] 张庆昌,李平. 生产率与创新工资门槛假说:基于中国经验数据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11):3.
- [20] 刘佳纯,王子成,明娟. 产业升级驱动下技术工人获得了更多的在职培训吗?来自珠三角地区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10):52.
- [21] 贺聪,尤瑞章,莫万贵. 我国劳动力成本核算体系及其缺陷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2008(4):58.
- [22] 蔡昉,都阳. 积极应对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过快上升问题[J]. 前线,2016(5):24.



引用格式:高继海.论 BBC 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改编[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65-74.

中图分类号:I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09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65-10

论 BBC 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改编

On BBC's film adaptation of Shakespeare's English history plays

高继海

GAO Jihai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英国广播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2012年和2016年先后拍摄过两个系列版本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这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虽然差异较大,但是各有所长。莎士比亚戏剧系列电影侧重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完整再现,《空王冠》系列电影则是基于戏剧情节的再演绎。《空王冠》整个系列的诞生是假借时代的东风,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60周年、伦敦奥运会,再到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影片将英伦文化之风从本土吹向了世界。此外,沈博绝丽的剧本、适当的布景、技艺出神入化的演员、细致的拍摄过程、精益求精的后期制作等都是影片改编成功的重要因素。《空王冠》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完美演绎为其他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范式,更对重新唤醒经典作品的活力、引发大众的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莎士比亚;
英国历史剧;
影视化改编;
《空王冠》

[收稿日期]2021-0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WW006)

[作者简介]高继海(1959—),男,河南省开封市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西方文论。

英国广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以下缩写为BBC)于20世纪80年代、2012年和2016年先后拍摄过两个全系列版本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虽然差异较大,但各有所长。莎士比亚戏剧系列电影侧重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剧本的完整再现,《空王冠》系列电影则是基于戏剧情节的再演绎。本文拟分析上述两种改编的特征、不同侧重,着重对比BBC所拍摄的《空王冠》系列电影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和相关历史事件的不同之处,并且探讨其所要说明的问题。

一、莎士比亚戏剧影视化改编概况

19世纪末,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系列中的《约翰王》在女王陛下剧院上映前夕,英国缪托斯柯普传记公司特地为剧组录制了一部由四个短片组成、时长仅90余秒的无声电影。该影片被引入剧院后,拉开了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改编的帷幕。总览莎剧改编数十载,虽然各个剧目、形形色色的改编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所改编作品均不呈系列出现,影响力十分有限。

20世纪80年代,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改编迎来了第一个高峰。BBC邀请大卫·贾尔斯导演执导,德里克·雅各比、约翰·吉尔古德、乔·芬奇等多位顶级演员出演,重磅推出莎剧系列电影。该系列电影以忠实剧本为主要创作理念,共翻拍包括10部英国历史剧在内的37部莎剧。莎剧系列电影的诞生,不仅被视作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大创举,更是经典作品影视化领域的一座里程碑。苏珊·威利斯^[1]曾指出,该系列中的影片《亨利八世》,其所还原的都铎王朝的建筑与服饰,看上去像是典型的英国民族的肖像馆,甚至还是一种英国皇室生活

的写照。国内学者李艳梅^[2]也曾指出,BBC的莎剧电影虽然不是部部精品,但是从情节发展到人物台词,从背景布置到人物衣着,处处体现出推崇原作、忠实原著的拍摄主旨。诚然,虽然这些改编影片的审美性和观赏性参差不齐,但丝毫不影响整个系列影片为观众所欣赏、所称赞。影片上映以来,无论是国内外莎剧迷还是普通观众均予以关注,之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改编更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85年,年仅25岁的英国演员肯尼思·布拉纳,因同时导演兼主演莎剧《亨利五世》而名声大噪,一跃成为英国影坛的宠儿。1990年,随着布拉纳导演的《亨利五世》获得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提名,以《亨利五世》为代表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又一次吸引了国内外学者、读者和观众的眼球。之后不久,戏剧《理查三世》的改编也多有问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著名导演阿尔·帕西诺执导的《寻找理查》(又名《寻找理查三世》),该剧运用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手法,以半戏剧半纪录的方式,通过碎片化的戏剧情节,向观众展示了美国年轻一代心目中的莎士比亚形象。虽然观众对该部影片看法不一、褒贬各异,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剧的改编手法为后来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系列的改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启发。国内学者张冲等^[3]曾评论道,帕西诺在纪录片模式与故事片模式之间的切变相当频繁而且突然,使故事情节就发生在生活-舞台-银幕之间,即在现实-虚构的高速蒙太奇中发展,故有人称此片为“意识流纪录片”的杰作。

进入21世纪,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改编再次迎来高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从过去的大荧幕、电视机等传统的固有成像,到现今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愈发便捷的灵活成像,视觉成像也逐渐跳脱出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限制。顺应时代潮流,承借互联网发展

的红利, BBC 又一次推出了系列剧——《空王冠》,借莎士比亚宣传英伦文化。《空王冠》第一季、第二季共有七集,几乎囊括了从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二世,到约克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共六位国王在位期间的所有大事记。国王与国王、国王与贵族、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纷争无疑是英国历史上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空王冠》系列剧的推出,再度引发全世界莎剧爱好者与观众的热烈讨论。该剧组邀请了备受观众关注的英国演员锦上添花,如饰演理查二世的本·卫肖、饰演亨利五世的汤姆·希德勒斯顿、饰演理查三世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等,他们以其富有贵族气质的外形、精湛的演技、细腻的人物塑造为影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收视率与关注度。尽管该系列剧获得了不俗成绩与连连赞誉,但仍有一些学者或观众提出质疑,如国内学者严宇桥^[4]就曾指出,《空王冠》中有两处硬伤,一是台词冗长,二是影片篇幅过长。

二、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影视化改编

长期以来,莎士比亚因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已然被视作一种“文学符号”,其代表作如《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等不胜枚举,享誉世界。然而,同样具有较高文学造诣,甚至富含深厚历史底蕴的莎士比亚历史剧系列却未能获得足够关注。基于此种现象, BBC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拍摄了 10 部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按照年代顺序依次是《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上、中、下)、《理查三世》和《亨利八世》。尚有戏剧《爱德华三世》 BBC 未能拍摄,是因为该剧目直至 20 世纪末才被莎

剧研究界纳入莎士比亚正典。自 19 世纪初,德国学者提出《爱德华三世》系莎士比亚所作的论断,在经历了将近二百年的争论与考证之后,这部剧作终于在 1998 年被列入莎士比亚的作品之中。当然,时至今日,也不乏莎剧研究者否认该剧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如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国内,诗人绿原(出版译作《爱德华三世两位贵亲戚:新被裁定的两部莎士比亚戏剧》)、学者张冲等人也已将《爱德华三世》译成中文。

为迎接伦敦奥运会,同时也为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 60 周年, BBC 在 2012 年以《空王冠》作为剧集总题目,先后上映了莎士比亚的第二个四部曲,即《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2016 年,恰逢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文学巨匠, BBC 仍以《空王冠》为剧集总题目,先后上映了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四部曲,即《亨利六世》(上、中、下)和《理查三世》*。

谈及 BBC 这两次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影视化改编,读者和观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所拍摄的历史剧与 2012 年、2016 年的两个版本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严格按照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进行拍摄的,属于戏剧的再现;而后二者则对莎剧原文的台词和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和重组,是电影化的改编,这种改编会使得文学写作的语言在热烈的文本交互场域中转变为视觉、听觉、运动媒介的表演^[5]。但是,假若改编手法不够妥善,那么改编之后的作品必定会有损于戏剧效果和当代观众的审美情趣^[6]。因此有必要把 BBC 对莎剧的改编与删减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梳理之前,读者首先需要了解剧本所涉及的基本历史

* BBC 拍摄于 2012 年的四部历史剧为第一季,共四集;拍摄于 2016 年的四部历史剧为第二季,但是最终被压缩为三集,基本上是把莎士比亚所著的《亨利六世》(上、中)压缩成第一集,《亨利六世》(下)为第二集,《理查三世》为第三集。

事实,然后才能够分析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与历史事实有哪些出入,以及这些出入产生的影响,最后找出新近 BBC 根据莎士比亚剧本所拍摄的《空王冠》系列与莎士比亚原剧有哪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要说明的问题。

三、《空王冠》系列对莎士比亚原剧的影视化改编

海涅曾评论道,莎士比亚的使命是不仅写诗,也兼写历史^[7]。童庆炳先生曾将历史划分为三类:“历史1”“历史2”“历史3”。“历史1”,即历史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历史2”,即历史典籍,是创作的基本资料;“历史3”,即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文学中的历史是“历史3”,它是源于“历史1”的活水源头和对“历史2”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8]。依照此论断,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中的历史当属“历史3”,那么,基于“历史3”而进行二次改编的电影无疑距离“历史1”更远了一些。

1. 以《理查二世》为例

以 BBC 于 2012 年上映的电影系列为例,《空王冠》这一总题目出自剧本《理查二世》中理查的如下一段独白,电影同样也是以这段独白开始的。

谁也不准讲那些安慰的话儿,让我们谈谈坟墓、蛆虫和墓碑吧;让我们以泥土为纸,用我们淋雨的眼睛在大地的胸膛上写下我们的悲哀;让我们找几个遗产管理人,商议我们的遗嘱——可是这也不必,因为我们除了把一具尸骸还给大地以外,还有什么可以遗留给后人的?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命,一切都是波林勃洛克的,只有死亡和掩埋我们骨骼的一抔黄土,才可以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戴上你们的帽子;不要把严肃的敬礼施在一个凡人的身上;丢开传统的礼貌,仪式的虚文,因为你们一向都把我

认错了;像你们一样,我也靠着面包生活,我也有欲望,我也懂得悲哀,我也需要朋友;既然如此,你们怎么能对我说我是一个国王呢?^{[9]53}

此时的理查显然是看到大势已去、得知自己即将被废黜才发出了弥留之音。在莎剧中,亨利·波林勃洛克戏剧性地跪在理查面前,要求理查归还他理应得到的继承权。波林勃洛克最初从流放地刚刚踏上英格兰故土的时候,他的期望只能如此。但形势急转直下,无人能够料想到,昔日不可一世的理查二世今朝已经沦落到这般田地。与之对比,波林勃洛克将手握更大的权力,胜券在握,他同样也意识到,至此绝不能让理查有再续国王之运的可能。若是允许理查恢复国王权威,那么就波林勃洛克自身而言,此后他将绝无葬身之地。并且,作为国王,理查在过去几年中所表现出来的残酷和独断也已经使他的民心尽数失去。此时,满目疮痍的英国无疑更需要一位开明睿智的国王,能够在贵族的辅佐下有效地治理国家、受民拥护,而非只听信鼠雀之辈阿谀奉承,以致祸国殃民。剧本中的理查被带到伦敦,并且被囚禁在伦敦塔狱里。更甚,为使亨利四世的即位更显名正言顺,国会给理查列举了 33 条罪状,迫使他逊位于亨利·波林勃洛克,这一结局令人唏嘘。

莎士比亚为彰显戏剧效果,打破几个历史事件的时空限制,将其进行重组和串连。例如,莎翁将理查的逊位与波林勃洛克的加冕同时放在剧中的第四幕第一场,这两件事均是发生在西敏寺西厅。巴各特受波林勃洛克之命,指控理查的亲信奥莫尔杀害格罗斯特公爵,这一情节实际上发生在两周后,即议会举行期间。

同样,为了使戏剧效果更加强烈、冲突的焦点更加集中,省略和删减也常常在戏剧或是影片中相伴出现。戏剧伊始,亨利·波林勃洛克和托马斯·毛勃雷就相互控告对方对国王不

敬、有叛逆念头。

莎剧原作之中,二人唇枪舌剑、势均力敌、相互中伤,你来我往的是非争辩稍显冗长,但是从改编之后的影片中所呈现的台词来看,争辩的情节则被大幅压缩,几句台词之间,二人的野心以及对彼此的敌对态度便可见一斑。不难看出,这样的改编是依照典型的“减法”原则,用极其有限的篇幅去尽可能阐释更多的内容。尤其是这一场景又出现在电影的开端,整部作品能否吸引到观众,并让其保持强烈的观影欲望继续观看,开头尤为重要。因为,对于电视、电影行业来说,收视率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曾有人将当代的电视产业称为“拇指经济”,其成败取决于观众拇指按下的频道号码,但从根本上说,“视觉经济”或“眼球经济”才是对这一现象最贴切的表述:拇指听命于眼球^[10]。因此,电影一开始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演绎,除会给观影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视觉冲击外,还会决定其对作品是否拥有继续观看的念想。观众通过眼球接收信号,从而产生自己对影片的大致判断,最后通过“拇指”来决定是否继续观看。如此看来,若是以收视率为出发点,上述的改编与重释有其合理性。

但是在《理查二世》中,下述情节的改编却仍待商榷。电影里最荒诞的一幕,便是曾斥责波林勃洛克行谋逆篡权不齿之事的卡莱尔主教由一位黑人演员扮演。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影片中,本是理查二世亲信的奥莫尔,为了在波林勃洛克(即后来的亨利四世)面前赎罪,自觉前往关押理查二世的牢狱,并亲手了断了其性命,然后拉着理查二世的尸体来到亨利四世面前邀功以表忠心。这些内容与莎士比亚原作的意图相去甚远,如此改编,实属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颠覆传统观念、戏弄历史的做法。虽说这种改编无理更无据,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涵盖的娱乐性要远远高于其真实性。

实际上,国王理查二世代表了中世纪封建秩序瓦解时那些因循守旧的顽固势力^[11],从头至尾,对“君权神授”深信不疑的他,因为同时忽视了内部背叛和外部强敌而穷途末路。《理查二世》之所以广受追捧,是因为莎翁考虑到历史剧的特点,没有将历史置之不顾^[12]。莎剧中的理查二世,其性格特征、行为方式等极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中的国王形象,符合历史剧塑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规律^[13]。并且,剧本中有一段他对自我的分析,细细琢磨,远比他周遭的任何一个人所给予他的评价都更加中肯,“要是我把我的眼睛转向着自己,我会发现自己也是叛徒的同党”^{[9]74}。那么,历史上的理查二世究竟是何形象呢?

理查系黑太子爱德华之子、“一代天骄”爱德华三世之孙,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企图实行独裁统治的英国国王。由于其父、其兄均早于祖父爱德华三世逝世,在理查十岁那年,祖父去世后,他便继承了英格兰国王的王位。彼时的理查年纪尚小,涉世未深,突如其来的权力之冠虽落在了这个懵懂少年的头上,但是真正大权在握又左右朝政的则是理查的叔父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无形之中,理查二世就变成了一位有名无实的国王。成年之后的理查反复无常、专横跋扈,其统治和作为国王的威严也是建立在恐惧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自然而然,最终贵族的支持、民众的拥护双双离他而去。但是,历史上的理查究竟因何而死,一种猜想是因饥饿致死,一种猜想是他被暴徒用凶器恶意砍死,至于事实真相,我们永远不得而知。那么理查死于何时,作为读者,我们仅能知道,1400年1月29日,法国国王和议会在提及他时,他已经离世。几天之后,为了消除他仍然存活于世的谣言,他的尸体在伦敦展出,随后被放置在圣保罗大教堂里,亨利四世出席了他的葬礼^[14]。终其一生,可以说,理查二世是一位华

丽开场、凄惨落幕的国王。

此外,影片中还有一些细节是远离历史真实、被刻意加工的。例如,理查的王后是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子。但寻根溯源,真实的历史与之相差甚远,理查二世在第一任妻子死后迎娶了年仅7岁的法国公主伊莎贝拉。即使是在他被废黜之时,其第二任妻子也仅仅9岁,但是影片中的王后形象俨然是一位妙龄女子。同样,为了迎合剧情的安排与发展,被篡改年龄的还有《亨利四世》中的霍茨波。

2. 以《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为例

骁勇善战的霍茨波原名亨利·潘西,系威斯摩兰伯爵之子,父子二人是波林勃洛克掠夺王权的左膀右臂。历史上,霍茨波比亨利四世还要年长一岁,但是这一细节在剧中却进行了改动,霍茨波变成了亨利四世的儿子——哈尔王子的同龄人。剧中亨利四世感叹道:“啊!要是可以证明哪一个夜游的神仙在襁褓之中交换了我们的婴孩,使我的儿子称为潘西,他的儿子称为普兰塔琪纳特,那么我就可以得到他的哈利。”^{[15]104}后来两个亨利对峙于沙场,哈尔王子公然宣称:“潘西,你不要再想平分我的光荣了吧:一个轨道上不能有两颗星球同时行动;一个英格兰也不能容纳哈利·潘西和威尔士亲王并峙称雄。”^{[15]199}而在影片《亨利四世》(上、下)中也可以看到,亨利四世每每谈到威尔士亲王时便作愁容满面状,直到哈尔王子在战役中冲锋陷阵,亲手了结了潘西的性命,亨利四世才接纳他。综上所述,《空王冠》系列中的《亨利四世》(上、下)基本上做到了忠实于莎士比亚的原剧,但是相较于历史,仍有出入。

此外,《亨利五世》中的一些次要情节也被导演做了适量调整。恰逢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刚刚结束、全球瞩目的奥运赛事即将开始,BBC精心制作了这部新电影作为对奥运会

的献礼之作。亨利五世这位昔日大众心目中的“完美国王”,成为了当时荧幕上的宠儿。但是电影《亨利五世》中有一个最重要、最醒目的删节——“南安普顿阴谋”,即影片删除了剑桥伯爵、斯克鲁普和格雷等人相互勾结,欲谋害国王,最终因被马奇伯爵告发而被处死的情节。关于这次阴谋的策划,近代有学者认为可能纯属子虚乌有,所谓谋害国王的“阴谋”,极有可能是亨利五世为了铲除异己、免除后患,以便自己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对法战争而采取的极端措施。由此看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完美国王”也是比较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

同样地,为了在有限的画面和篇幅中使观众更容易理解人物关系和剧情的发展走向,改编之后的电影往往也会选择删去一些次要人物,如法国王后伊莎贝拉。在莎剧原作中,伊莎贝拉有不少出现的场景和台词,但是在电影里,这个角色不复存在。此外,亨利五世亲切地称呼法国国王为王兄,王后为王嫂,与此同时,却称呼他们的女儿凯瑟琳(自己未来的妻子)为妹妹,放置在中国的伦理背景下,观众看了必定多感滑稽、忍俊不禁。但作为文学巨匠的莎士比亚妙笔生花,亨利五世对凯瑟琳求婚的誓言虽充满狡辩但不乏柔情,故读者对二人的称呼作何也就不以为意了。

亲爱的凯蒂,就在你的生命里收容一个心直口拙、不会把“永不变心”背得滚瓜烂熟的人吧;他怎么也委屈不了你,因为他没有再到别人跟前去求爱献媚的本领。那些舌尖上用功夫的家伙,凭着花言巧语,博得了女人的欢心;可是他们也会推三托四,把自己的无情撇得一干二净。什么!一个会说话的人,他无非是个会瞎扯的人;一套娓娓动听的话只是一首山歌。一条好腿会倒下去;一个挺直的背会弯下去;一丛黑胡子会变白;满头鬃发会变秃;一张漂亮的脸

蛋会干瘪;一对圆圆的眼睛会陷落下去——可是一颗真诚的心哪,凯蒂,是太阳,是月亮——或者还不如说,是太阳,不是那月亮;因为太阳光明灿烂,从没有盈亏圆缺的变化,而是始终如一,守住它的黄道。要是你欢喜这样的人,那就答应我吧;答应了我,那就是答应了一个当兵的;答应了一个当兵的,那就是答应了一个做国王的。^[16]

剧本中被亨利五世唤作凯蒂的正是其后来的王后——瓦卢瓦的凯瑟琳,她与理查二世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贝拉是来自法国王室的亲姐妹。但是人各有命,姐姐伊莎贝拉在理查死后改嫁奥尔良公爵查理,19岁便不幸死于难产。而妹妹凯瑟琳在亨利五世去世之后改嫁给威尔士贵族欧文·都铎,生下两个儿子埃德蒙·都铎和贾斯珀·都铎,兄弟二人被亨利六世分别册封为里士满伯爵和彭布鲁克伯爵,在玫瑰战争中皆为兰开斯特家族而战。后来埃德蒙的儿子亨利·都铎在叔父贾斯珀的支持与帮助下,成为了都铎王朝的建立者,史称亨利七世。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亨利五世》中一个重要的细节有待斟酌。战场上壮烈牺牲的约克公爵由一位黑人演员扮演,导演这样的安排虽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何种目的,但是从逻辑上看,实在是言说不通。众所周知,英国王室中的第一代约克公爵死于1401年,系爱德华三世长大成人的五个儿子中的第四子,也是其最后一个离世的儿子。约克公爵死后,由其长子,即《理查二世》中的奥莫尔继承其父爵位。父母皆是血统纯正的白人,生出黑皮肤的儿子实属荒谬。再者,曾因策划“南安普顿阴谋”而被亨利五世处死的剑桥伯爵是奥莫尔的胞弟,也是十分纯正的白人。综上所述,父母、兄弟皆是白皮肤,独独奥莫尔是黑皮肤,这一细节滑稽可笑。历史上,奥莫尔的原型是第二代约克公爵

爱德华,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丧生,且无继承人。按照继承顺序,其弟剑桥伯爵的儿子理查便承袭了约克公爵的爵位,因此也成为了玫瑰战争中挑战亨利六世王权的代表人物。理查死后,其长子爱德华为了约克家族的荣誉继续浴血奋战,最终取代亨利六世登上王位,即爱德华四世,从此英国历史正式步入约克王朝时期。

就人物与情节的连贯性而言,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亨利四世》(上、下)均命名为《亨利五世》。虽然戏剧是以“亨利四世”来命名,但实际上亨利四世的戏份有限,相反,哈尔王子,即后来的亨利五世,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如此一来,第一个四部剧与第二个四部剧在命名上也别无二致了。众所周知,从英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八部戏剧中的前四部为一个系列,时间上发生在前;后四部则为另外一个系列,发生在后。但实际上,莎士比亚先行创作出了后四部戏剧,随后完成了前四部戏剧的编写。

3. 以《亨利六世》(上、中、下)为例

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四部曲包括《亨利六世》(上、中、下)和《理查三世》。该四部曲中的前三部戏剧,尤其是前两部,在经过电影改编之后被压缩成一集,因此与原剧相比,电影会出现大量删减的情况。这些删减使剧情发展更加紧凑、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也使矛盾冲突更加明显。例如,剧本中的培福公爵本是亨利五世的弟弟,骁勇善战,并且其作为总理法国事务的大臣,无疑是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在电影里却无迹可寻。还有,剧本中出现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被英军俘获之后,受审于约克公爵,在莎剧中其为了保住性命而谎称自己怀有身孕,却道不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一细节在电影中也了无踪影。笔者推测,大抵是改编者认为,像贞德这样能够拯救法国于水火的女英雄,应该直面死亡而不是惧怕死亡。莎士比亚在创作的过程中,极大程度展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精神,

进而有意对贞德的形象进行丑化。贞德本应该以其神圣性和民族性而被赞扬,但是因其带领的是法国人民来反抗英国统治,其神圣性被大幅弱化,继而其民族性也有意被忽视。透过莎士比亚的笔触,与其说贞德是一位圣女,倒不如说其更像是女巫。另外,亨利六世的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在剧本中的形象与其在电影中的形象也相差甚远。在莎剧中,萨福克将玛格丽特从法国迎回,送给国王亨利六世,因而博得君王欢心,从此平步青云。而在电影里,萨福克这个角色无处可寻,其行为由萨穆塞特实施。并且萨穆塞特是在混乱的搏斗中俘获了玛格丽特,把她作为一枚胜利的果实进献给亨利六世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莎剧中的萨穆塞特是个中性人物;而在电影里,他被刻画成一个身披邪恶外衣的不忠之臣。此外,莎剧中仅仅是暗示萨福克与玛格丽特有几分暧昧关系,但在电影里则多次出现萨穆塞特与玛格丽特明目张胆快活风流的场景。数个细节的改编与调整,使得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从中性人物的设定到反面人物的转变,角色在出场伊始,观众就基本能够把握其特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带入剧情。

莎剧《亨利六世》(上)是以亨利六世迎娶玛格丽特作为结尾的,《亨利六世》(中)则以约克公爵公开挑战亨利王权作为结束。反观电影,《空王冠》系列第二季的第一集便以约克公爵坐在亨利六世的宝座上,与亨利争论谁更具有头戴王冠、手持权杖的资格而结束。试想,电影编导对情节作如此处理,可能是为了留出更多的篇幅讲述后续的玫瑰战争,同样也为战争中高潮迭起的部分埋下伏笔,故把战争爆发之前的两部戏压缩成为一部电影。

4. 以《理查三世》为例

总览《空王冠》系列的八部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笔者认为《理查三世》兼具艺术性和审美性的同时,也最耐人寻味。在影片《理查三

世》中,扮演理查的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为了高度还原角色,装扮成身体有残疾的模样,表演实属惟妙惟肖。相较于其他剧本,《理查三世》是经电影改编之后改动最少的一部莎剧,除删除部分过于冗长的对话外,情节和人物方面几乎与原作保持一致。

理查三世的真实形象究竟如何?真如戏剧所言、电影所演那样天生一副“畸形陋相”^[17]吗?实际上,理查三世是自诺曼征服以来第一位战死沙场的英国国王,其作为一位传奇人物自不必多言。自从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战役中一举击败理查三世、建立都铎王朝之后,对于理查三世的“污名化”记录和描写便不在少数,对于亨利·都铎来说,大有“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之意。

首先是托马斯·莫尔在《国王理查三世史》中曾描写过爱德华四世(理查三世的兄长)的情妇琪恩·肖厄长相标致、温情脉脉、聪明好学、幽默风趣、心地善良,虽善于利用其特殊身份却从未为自己谋过私利,反而是庇护他人,有求必应,深得民众喜爱。但是理查却坚持要求这位“荡妇”在伦敦大庭广众下忏悔,“结果她走在队里,面容娴静,步伐规矩,虽然身上只穿一件宽大的袍子,可是显得十分秀美,连她那原本苍白的双颊也在众人好奇的注视下出现了可爱的赭红,于是她那可耻的罪名反而赢得群众中那些看上了她的身体远于她的灵魂的人的纷纷赞美”^[18]。理查公然惩处这样一位年轻女子,不免使其尽失人心。

其次是莎士比亚所描绘的理查三世俨然一个存在先天性身体缺陷、野心勃勃的“怪物”。理查在杀死亨利六世及其子爱德华亲王之后,凭借花言巧语,说服并迎娶爱德华的妻子安妮,然后设计陷害自己的兄长克拉伦斯公爵并致其死亡,最后为实现其野心,不惜杀害自己的两个亲侄子,其中包括爱德华四世的王位继承人。

并且,极有可能,他为了自己顺利登上王位,肃清障碍,毒害了自己的妻子。更甚者,如果不是其幕僚极力劝阻,理查势必会迎娶自己的亲侄女伊丽莎白为妻。显而易见,在莎士比亚的笔下,理查是一个人性泯灭、为达目的无恶不作的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理查是典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分离的人物^[19]。理查的价值理性体现得并不明朗,但是其工具理性的确令读者无法忽视。理查以获取王位为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所不用其极,从草菅人命到罔顾伦理,从设计陷害其兄长到试图迎娶其侄女,凡是有助于登上王位的事,理查都真切地做到了置一切于不顾,一心谋取王权。简言之,理查三世若称王,必然是“万恶之王”。

此外,莎学专家阿尼克斯特曾给予理查较为中肯的评价,他说理查三世身上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精神,他不满足于平平淡淡混日子,想尽情发挥自己的毁灭力量,为了获得权力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既然他注定非毁灭不可,便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满怀不顾一切的绝望情绪去迎接死亡^[20]。剧中的理查三世,无疑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形象。但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他,他不因身体先天缺陷而自怨自艾,反而通过后天的自我谋划试图爬上权力的天梯。可以说,他的冒险精神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国王,他不屑于通过直白的身体条件来显现,其力量藏匿在内心中的某一个黑暗角落,虽不起眼,但一定高于读者的预期。

近年来,关于理查三世的形象存在另外一种与上述评价有天壤之别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一位伟大而善良的国王、一位德才兼备的治国之材,可惜时运不佳,又遭受“莫须有”的诬陷,因此背上千古骂名,而那些指控他的罪行没有一件是他所犯下的。英国现有专门研究理查三世的社团,致力于为蒙受冤屈的理查三世平反昭雪。在根据英国小说家菲利普·格里高利的

小说所改编的十集电视连续剧《白王后》中,理查三世身材魁梧、一表人才,无任何身体缺陷,而且他温文尔雅、雄才大略、公正无私,这样的形象与“怪物”“魔鬼”等评价差之千里。众所周知,关于理查三世的身形问题多年来争议不断。直到2012年9月4日,英国莱斯特市的格雷弗利尔斯教堂旧址出土了理查三世的遗骸,根据遗骸,理查的骨架确实是有严重的“脊柱侧弯”的情况^[21]。这种侧弯是指脊柱的走向发生偏移,从中间弯曲至一侧,有可能导致人的一边肩膀略高于另一边肩膀^[22]。与此同时,理查的脊柱并没有出现后凸现象,也就是说,其脊柱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并未像影片中所演那样驼背跛蹠、畸形无力。并且,证据也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临终之时,理查也并没有因为所谓的“背部疼痛”使自己的行为活动受限。可以说,理查三世的身体的确存在变形的状况,但是丝毫不影响其披甲戴盔、浴血沙场,且远远未达到畸形甚至影响其生活的程度。

据笔者探究,历史中真实的理查三世更有可能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即理查三世既非那般十恶不赦,也不是如此高大完美。试想,假若不是他关押两个小王子在先,又怎会有后来王子遇害的噩耗?虽然史学界更倾向于王子遇害的真相是亨利七世的生母玛格丽特·波福联手白金汉公爵行凶,而有意嫁祸于理查三世;但是,深谙其兄嫂伊丽莎白王后性格的理查,关押其子,这的确是一种先下手为强的自保行为。至此,两个小王子的死因,就像历史上其他未解之谜一样,永远被封存在了历史长河中,给人以无限猜疑与遐想。

四、结语

莎士比亚的戏剧虽经由岁月雕琢,但仍历久弥新。无论在哪个时代,影视从业者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演绎,除有其特定目的外更

不乏时代特色。而《空王冠》整个系列的诞生更是假借时代的东风,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60周年、伦敦奥运会,再到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影片将英伦文化之风从本土吹向了世界。此外,除特定的时代背景外,沈博绝丽的剧本、适当的布景、技艺出神入化的演员、细致的拍摄过程、精益求精的后期制作等都是影片改编成功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空王冠》的完美演绎,不仅仅是这一个系列单方面的成功,同时也为其他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范式,更对重新唤醒经典作品的活力、引发大众的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WILLIS S. The BBC Shakespeare Plays: Making the televised canon[M].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81.
- [2] 李艳梅. 20世纪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演出与改编研究[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41.
- [3] 张冲, 张琼. 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电影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8.
- [4] 严宇桥. 从英剧《空王冠》看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当代改编[J]. 视听, 2016(10): 90.
- [5] 章颜. 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2.
- [6] 任明耀. 《亨利八世》漫评[M] // 聂珍钊, 杜娟. 莎士比亚与外国文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302-310.
- [7] 海涅.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M]. 温健,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6.
- [8] 童庆炳. “历史3”: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J]. 人文杂志, 2005(5): 74.
- [9] 莎士比亚. 理查二世[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0] 张冲. 改编学与改编研究: 语境·理论·应用[J]. 外国文学评论, 2009(3): 207.
- [11] 李正栓, 马洋洋.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国王形象[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5): 49.
- [12] 桂扬清. 莫把历史剧当历史: 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看历史剧与历史[J]. 外语研究, 2008(2): 93.
- [13] 李艳梅. 莎士比亚历史剧人物塑造方法探析[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4): 38.
- [14] NORWICH J J. Shakespeare's kings [M]. New York: Scribner, 1999: 127.
- [15] 莎士比亚. 亨利四世(上)[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6] 莎士比亚. 亨利五世[M]. 方平,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32-433.
- [17] 莎士比亚. 理查三世[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6.
- [18] 王佐良, 何其莘.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30.
- [19] 齐宏伟. 《理查三世》的艺术世界新探[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3(2): 96.
- [20] 阿尼克斯特. 莎士比亚的创作[M]. 徐克勤, 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144.
- [21] APPLEBY J, RUTTY G N, HAINSWORTH SARAH V, et al. Perimortem trauma in King Richard III: A skeletal analysis[J]. The Lancet, 2015(9964): 253.
- [22] STRIDE P, QURESHI H, MASOUMIGANJGAH A, et al. The scoliosis of King Richard III[J]. Ricardian Bulletin, 2014(3): 38.



引用格式:李静. 话剧民族化视角下的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表演[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4): 75-82.

中图分类号:J805;I0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10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75-08

话剧民族化视角下的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表演

The performance of Shakespearean pl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aju sinicization

李静^{1,2}

LI Jing^{1,2}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2.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表演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随着话剧民族化进程的逐渐推进,中国的莎士比亚戏剧表演也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莎士比亚戏剧表演被看作西方话剧表演的典范,承担着社会宣传和启蒙民众的民族化使命;20世纪80年代,中国话剧表演借鉴戏曲元素的民族化倾向也体现在莎士比亚话剧表演中,与此同时,中国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推动了同时期的莎士比亚戏曲表演;20世纪90年代,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成果体现在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中;21世纪以来,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民族化特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无法调和与先锋性之间看似对立的关系。因此,只有理顺中国先锋话剧民族化和先锋性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民族化特征。

关键词:
话剧民族化;
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表演;
戏曲化;
实验话剧;
先锋莎士比亚话剧

[收稿日期] 2021-05-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ZDA294)

[作者简介] 李静(1983—),女,河南省林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莎士比亚戏剧、英美文学。

话剧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内涵不断演变。中国莎士比亚戏剧(下文简称“莎剧”)表演与话剧民族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是解读前者的一个重要视角。根据胡星亮的说法,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正式提出是在“五四”前后^{[1]267-287}。20世纪30—40年代的话剧民族化指的是话剧的大众化,是应社会宣传和启蒙民众的急需而进行的民族形式探索。20世纪50—60年代的话剧民族化指的是现实主义话剧对中国戏曲元素的利用,这时期产生了《虎符》《蔡文姬》等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的话剧民族化指的是实验话剧对中国传统戏曲中叙述感、假定性等艺术手法的借鉴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比中国实验话剧更加偏离现实主义轨道的中国先锋话剧快速发展,然而话剧民族化的理论探索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没有把先锋话剧纳入到其研究视野中,因此先锋性被看作民族化的对立面。21世纪以来,中国先锋话剧的民族化特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话剧民族化的理论建设继续推进。以话剧民族化及其概念演进为维度考察中国莎剧表演,可以更清晰地勾勒中国莎剧表演的民族化轨迹,更好地分析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等新产生的中国莎剧表演形式。

对于1949年前的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批评界多注重其与中国救亡图存之间的关系;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批评界重视其斯坦尼现实主义体系的表演形式;20世纪80年代的莎剧表演民族化表现为现实主义莎士比亚话剧表演和莎士比亚戏曲表演。对于现实主义莎士比亚话剧表演,李伟民^[2]发现张奇虹导演的话剧《威尼斯商人》(1980)有对中国传统戏曲写意性的借鉴;对于20世纪80年代大量涌现的戏曲形式的莎剧表

演,M. Tian^[3]认为,这是由实验话剧对中国传统戏曲表演手法的推崇所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直到21世纪才引起注意。21世纪以来,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成为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的主要研究对象,穆海亮等^[4-5]从具体表演策略入手分析了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民族化的一面。上述莎剧表演民族化的研究多聚焦于某一部莎剧或某一类型的莎剧,缺乏宏观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中国莎剧表演与话剧民族化之间的关系。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莎剧表演形式的反民族化

1949年前,中国话剧经过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20世纪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与实践^{[1]282},越来越被中国普通大众所接受,成为社会宣传和启蒙民众^{[1]27}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莎剧表演也试图承担救亡图存的任务。焦菊隐^[6]认为,我们从哈姆雷特的悲剧中得到一个结论,即抗战的胜利,系于全国人民的和谐行动,更系于毫不犹豫地马上去行动,所以他于1942年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的《哈姆雷特》力图宣传抗战的必要性。但是,《哈姆雷特》(1942)的表演形式却是西方化的。据黄诗芸所述,1942年《纽约时报》评论焦菊隐的《哈姆雷特》(1942)时,注意到的是演员的西式化装和假鼻子,大鼻子惨不忍睹^[7]。可见,当时莎剧的表演形式并没有开始民族化探索。1949年后,莎剧表演被看作斯坦尼现实主义体系的范本。1949—1966年,共有三部莎剧在中国上演,即《罗密欧与朱丽叶》(1956)、《无事生非》(1957)、《第十二夜》(1957),多由苏联戏剧专家导演^[8],这几部莎剧让中国演员更了解斯坦尼现实主义表演体系。总之,在改革

开放之前,莎剧的表演形式通常带有西方化(反民族化)的倾向。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莎剧表演形式的这种反民族化倾向与中国话剧莎士比亚化的趋势相关。方平^[9]认为,莎士比亚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让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获得自己的生命;其二,让他笔下的众多的人分享他(诗人)的才华;其三,在富于激情的时刻,把自己人格的光辉投射在剧中人物身上。这些特点影响到了中国话剧的创作。例如,莎剧对曹禺、田汉、郭沫若话剧创作都产生了影响。同时,莎剧作为西方戏剧的代表,其剧本和表演都对中国传统戏曲产生了影响。正如 X. Y. Zhang 的总结^[10]:其一,莎剧已经取代传统戏曲,成为中国文化圈中最重要的戏剧形式;其二,莎剧不仅主导着中国的戏剧圈,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剧场活动;其三,莎士比亚已经把过时的中国传统戏曲逼到了灭绝的边缘,中国传统戏曲只有在革新中丧失自己的特性才能生存下去。这一结论引起不少争议,R. R. Li^[11]认为,X. Y. Zhang 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戏剧已经取代传统戏曲成为中国文化圈中最重要的戏剧形式”的论断太夸张、太主观。事实上,莎剧并没有直接挤压中国传统戏曲,而是莎士比亚化促使话剧发展壮大,间接导致中国传统戏曲边缘化。总之,这一阶段的莎剧还是作为一种外来的表演方式展现在话剧舞台上,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民族化倾向。

二、20世纪80年代:话剧民族化与中国莎剧表演形式的戏曲化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莎剧表演并未表现出戏曲化倾向,但是话剧表演已经展现出戏曲化倾向。1949年初期,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在国家行政力量推动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大

规模传播^[12],全国大大小小的剧团都在学习这种体系,包括戏曲剧团。在此期间,焦菊隐导演了《龙须沟》(1951)、《茶馆》(1958)、《蔡文姬》(1959)等现实主义作品。《龙须沟》(1951)基本按照斯坦尼现实主义体系排练;在《茶馆》(1958)中,焦菊隐开始利用中国戏曲中的“亮相”等技巧;而在《蔡文姬》(1959)中,焦菊隐结合了现实主义和中国戏曲的某些程式,试图制造一种写意的效果。在焦菊隐的散乱笔记中发现的大约写于1963年的《论民族化(提纲)》中这样写道,“不直、不露、留有观众想象、创造的余地……这正是中国戏曲传统的特点”^[13]。焦菊隐试图在现实主义话剧中创造出一种来自中国戏曲的诗意,但是“焦先生的试验尚未摆脱戏曲的程式,因此仍不免流露出戏曲表演的痕迹”^[14]。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话剧民族化的戏曲化倾向才在莎剧表演中得到体现。例如,张奇虹导演的《威尼斯商人》(1980)继承发展了中国话剧改编莎剧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美学表现手法^[15],产生了一种诗情画意的演出效果。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反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实验话剧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戏曲形式的莎剧表演。20世纪80年代,戏剧界开始了一场强烈的反现实主义运动。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作家高行健和导演林兆华为代表的话剧工作者借鉴布莱希特、阿尔托、梅耶荷德、格洛托夫斯基等人的戏剧理论,并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找到对等物,一场以回归中国戏曲传统为名的实验戏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场运动的主战场在话剧界,但是高行健认为,如今我们称之为话剧的戏剧不必把自己仅仅限死为说话的艺术^[16]⁴⁴,他将实验话剧称作“现代戏剧”,现代戏剧重新捡回面具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将

歌舞、哑剧、木偶乃至武术和魔术这些戏剧的传统手段统统捡回来了^{[16]66}。因此,话剧界以回归中国戏曲传统为名的反现实主义运动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视,这种运动体现在莎剧表演中,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形式莎剧表演的集中出现。M. Tian 曾评价说:即使中国戏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之间存在某些表面的相似,两者根本上还是不同的,用中国戏曲形式演出莎士比亚的意义在于,反现实主义话剧运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想象得以注入传统戏曲中^[3]。

在1986年第一届中国莎剧节上,以中国戏曲形式表演的莎剧有五部,此后还有多部戏曲形式的莎剧出现,这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对于用戏曲形式演绎莎剧,历来褒贬不一。黄佐临^[17]从舞台、布景、服饰等方面比较了莎剧和中国传统戏曲,认为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演出莎剧,将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不管表现什么,无论是鬼怪还是神仙,也无论是火或雷、格斗或求爱,在中国戏曲的舞台技术中总能找到体现的方法。陆谷孙表达了他对莎剧戏曲化的担忧,认为两者的重合或相通多数发生在舞台空间的范畴,很难通过引申来证明两者在思维空间上也一定那么相似^{[18]36},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两种个性都比较强的文化形态,在融合两者的时候就尤其需要审慎^{[18]37}。与这两种批评立场相对应,戏曲形式的莎剧主要有以下两类。

一类是把莎剧的人物、情节、背景置换成中国的,并用中国戏曲形式来演出,如改编自《麦克白》的昆曲《血手记》(1986)和改编自《哈姆雷特》的越剧《王子复仇记》(1994)。《血手记》的情节、人名、背景、服装、唱词、分幕都中国化了。对此,黄佐临认为,中国戏曲可以保留莎士比亚诗剧的特性。但M. Tian 认为,当莎士比亚的诗被翻译成汉语,按照昆曲固定的格律

节奏重新整合之后,莎士比亚的诗歌韵味就很难保留了^{[3]205}。在谈到越剧《王子复仇记》(1994)时,M. Tian 认为使观众着迷的并不是所谓的丰富了中国戏曲的莎士比亚诗行、心理或哲学,而仅仅是演员程式化的动作^{[3]206}。可见,中国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在一定程度上置换掉了莎剧丰富的内涵。所以,即使中国戏曲和莎剧之间存在某些表面的相似性,两者从根本上还是不同的。

另一类是中西结合的风格,故事情节、背景保持原貌,用中国戏曲的形式演出。在1986年第一届莎剧节上,胡伟民导演的越剧《第十二夜》是最忠实于原著的,其台词、情节、人名、背景、服装都与莎士比亚原作一致,但是对中国戏曲原有的生旦净丑角色划分、身段、动作都作出了修改^{[3]208},也就是说破坏了中国戏曲的程式。作为一位话剧导演,胡伟民凭借话剧《母亲的歌》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验话剧的领军人物。由胡伟民来导演戏曲形式的莎剧,说明了中国莎士比亚戏曲表演的兴盛与实验话剧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这两类戏曲形式的莎剧虽各有偏颇,但一直有人在尝试。前者如中国台湾的吴兴国,致力于用京剧演绎莎剧,其导演和表演了《李尔在此》(1998)等莎士比亚戏曲;后者如王晓鹰,其《理查三世》(2012)用京剧的程式、身段、神态、服装演绎莎剧,保留了莎剧台词,没有唱腔。

三、1990年以后:实验话剧和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的民族化

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体现在中国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中。推进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的代表人物是林兆华,其导演的先锋莎士比亚话剧是20世纪80年代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的

延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实验话剧的民族化,是M. Tian所说的中西戏剧跨文化“替换性置换”的产物,这一置换的历史还要追溯到梅兰芳20世纪30年代赴苏联演出。梅兰芳的演出启发了不少西方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了“陌生化效果”的概念,梅耶荷德提出了“假定性”的概念。M. Tian认为,梅兰芳和中国戏曲的精髓已经被20世纪西方先锋戏剧的特点所置换^{[3]33}。西方这些戏剧家对中国戏曲并非真的很了解,他们对中国戏曲的理解是基于自身文化的一种想象。当梅兰芳的戏曲演出在西方先锋戏剧中产生影响的时候,斯坦尼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却逐渐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直至20世纪80年代推倒斯坦尼“第四堵墙”的呼声越来越高。以高行健和林兆华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家一方面借鉴西方先锋戏剧反现实的理念和手法,包括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和“叙事剧”、梅耶荷德的“假定性”、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等;另一方面在中国戏曲中寻找灵感,提出自己的概念,如“演员的中性状态”“全能戏剧”“复调的戏剧”等,试图推进中国实验话剧的民族化进程。具体说来,“演员的中性状态”借用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演员自由跳进跳出角色的表演状态;“全能戏剧”借用了中国传统戏曲将歌舞、傀儡、杂技等融入戏曲表演的策略;“复调的戏剧”则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多重情节和主题并行的特点。这三个戏剧表演概念都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叙述化表演的倾向。

然而戏剧研究者更关注中国实验话剧借鉴西方先锋戏剧的那一面。对于高行健的“全能戏剧”概念,M. Tian认为,受到阿尔托、梅耶荷德、布莱希特、格洛托夫斯基的影响,高行健提出了“全能戏剧”的概念,强调剧场性、叙述方法、演员表演的中心地位、演员和观众的直接交

流^{[3]180};X. M. Chen认为,“全能戏剧”和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有很深的联系^[19]。而高行健之所以强调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借鉴,是因为中国的实验话剧家更希望为他们借鉴来的话剧观念和方法找到一种归属感,所以他们就回到中国戏曲的传统……这时他们所谓的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先锋戏剧概念替换了^{[3]184}。因此,中国的实验话剧有西方先锋戏剧和中国传统戏曲“两副面孔”。

在中国实验话剧中西“两副面孔”的影响之下,林兆华的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也表现出了中西“两副面孔”,但是他是民族化表演为创作动机的。莎剧剧本虽说不乏独白、旁白等叙述性成分,但是本质上还是对话体戏剧。林兆华保留了莎剧剧情,他试图利用中国戏曲中特有的叙述化表演去演绎莎剧,从而实现莎剧表演的民族化。然而,这种尝试打乱了传统意义上台词和动作的对应关系,必然会引起不少矛盾。所以,林兆华的叙述化表演探索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失败、不断调适的过程,用周宁的话语交流理论来看,就是一个由内交流系统向外交流系统逐渐推进的过程。周宁将戏剧的话语交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剧中人物之间的内交流系统;二是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外交流系统。内交流系统中的话语称为“戏剧性对话”,外交流系统中的话语称为“代言性的叙述”^[20]。林兆华对先锋话剧的民族化探索就是由内交流系统一步步向外交流系统逐渐推进的过程。

具体到林兆华导演的四部莎剧,演员的台词和形体动作由《哈姆雷特》(1990)中的一致关系演变为《理查三世》(2001)中的差异关系,再演变为《大将军寇流兰》(2007)和《仲夏夜之梦》(2017)中补偿与分立的关系;主人公由角色演变为叙述者,再演变为演员。在《哈姆雷特》(1990)中,林兆华首次松动了演员和角色

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理查三世》(2001)中,林兆华增加了代言性叙述者。在《大将军寇流兰》(2007)中,林兆华让演员以自己的身份充当叙述者。在《仲夏夜之梦》(2017)中,林兆华让演员以莎剧情节为蓝本即兴表演。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林兆华逐渐摆脱了斯坦尼现实主义演剧体系对演员“我就是”^[21]式的束缚,使演员从角色背后慢慢显现出来,达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演员自由跳进跳出角色的状态,实现了叙述感。

四、21世纪: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民族化的理论阐发

中国实验话剧的民族化探索在中国先锋莎剧中的表现长期被忽略。直至21世纪,中国先锋莎剧的民族化倾向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例如,穆海亮^[4]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演员跳进跳出角色在《哈姆雷特》(1990)和《理查三世》(2001)中的体现。他发现,排演《哈姆雷特》,角色换位不时出现,演员必须能够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感受,同时又不能完全与之融合,要能够及时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角色转变为另一个角色;理查三世的扮演者就不停地对其扮演人物的所作所为进行直接的评述,将扮演者和扮演对象相剥离。因此,林兆华让演员“跳进跳出”的策略印证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方式的虚拟性、综合性和间离性^[4];徐晓钟等^[22]注意到了林兆华对中国传统戏曲手法的利用:他(林兆华)往往用中国戏曲假定性手法或从民间艺术中寻找形式来构建自己的舞台语汇,把木偶戏、皮影戏、二人转等融入其中,构成象征或意象,如《理查三世》中的“老鹰捉小鸡”。总之,研究者们发现了林兆华莎剧的表演形式和中国戏曲之间的某种联系。

然而,这些零散的分析并不能很有说服力地证明林兆华先锋莎士比亚话剧是话剧民族化

的产物。林兆华在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话剧作品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接纳。于是之^[23]指出,林兆华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认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狗儿爷涅槃》都是在北京人艺传统的基础上走向多元化发展新阶段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后,林兆华导演的现实主义话剧被接纳,如《万家灯火》《风月无边》《窝头会馆》等。可是,一旦提到林兆华1990年后的先锋话剧作品(包括他导演的莎士比亚话剧)，“北京人艺逆子”^[24]^[25]这个名号马上就冒出来了。刘平比较了200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的《蔡文姬》和林兆华的《理查三世》，认为前者可以看到焦菊隐先生的创新精神，即他为实现话剧民族化而吸收传统戏曲的艺术手法，恰到好处地融入到话剧创作中去的艺术美学追求^[25]^[4]；而后者观众恐怕连剧情都看不大懂^[24]^[4]。如果持这种看法的研究者听到《理查三世》是话剧民族化的新作品，他们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难道是中华戏曲界列祖列宗之英魂成功搜寻转世灵童的结果^[26]？

由此可见,对先锋莎剧表演的研究走向了民族化和先锋性针锋相对的局面。这是因为,研究者在研究先锋莎士比亚话剧时,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莎剧表演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之间的关系。如果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验话剧民族化探索,就会注意中国实验话剧和先锋莎士比亚话剧产生民族化和先锋性双重特征的历史条件,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切入点而已。

已经有少数研究者从叙述化表演的角度来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验话剧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话剧的民族化进程。W. Y. Lin认为,林兆华利用了中国戏曲中的叙述化表演让先锋话剧演员也达到了跳进跳出角色的自由状态^[27]。正是通过演员的叙述化表演,

林兆华包括莎剧在内的先锋话剧才塑造了有别于剧本原有主题的第二主题。在叙述化表演探索的过程中,林兆华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先锋性会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但是叙述化表演探索的最终目标是话剧民族化。只有在话剧民族化层面理清民族化与先锋性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先锋莎士比亚话剧表演的民族化倾向,这也是当代中国莎剧表演民族化研究的新方向。

五、结语

总之,莎剧在中国的表演与话剧的民族化经历了相似的轨迹,由改革开放之前作为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对立面转变为戏曲化的表演,再随着先锋话剧一起成为中西戏剧表演艺术融合的实验场。对中国莎剧表演在话剧民族化影响之下的发展过程进行客观还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诠释中国的莎剧表演。在话剧传入中国这100多年,“话剧民族化”这个概念在1949年前、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并不一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话剧、戏曲化的话剧和先锋话剧等话剧形式同时并存。到21世纪,话剧民族化呈现出杂语共生的局面,因此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民族化难以把握。只有推进当代话剧民族化的理论建设,才能更有深度地研究当代中国先锋莎士比亚话剧的民族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 胡星亮. 中国现代戏剧论集[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
- [2] 李伟民. 青春、浪漫与诗意美学风格的呈现:张奇虹对莎士比亚经典《威尼斯商人》的舞台叙事[J]. 四川戏剧, 2014(6):101.
- [3] TIAN M. Poetics of displacement: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western intercultural theatre [D].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01.
- [4] 穆海亮. 先锋戏剧与传统资源[D]. 开封:河南大学, 2006.
- [5] 张贇. 林兆华导表演艺术与话剧“中国学派”的探索发展[J]. 四川戏剧, 2018(4):73.
- [6] 焦菊隐. 关于哈姆雷特[M]//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 焦菊隐全集:第1卷.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448.
- [7] 黄诗芸. 莎士比亚的中国旅行 从晚清到21世纪[M]. 孙艳娜, 张晔, 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09.
- [8] 孙艳娜. 莎士比亚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接受与流变[J]. 国外文学, 2014(4):34.
- [9] 方平. 什么叫“莎士比亚化”? ——谈剧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关系[J]. 外国文学研究, 1982(3):3.
- [10] ZHANG X Y. Shakespeare in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M].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6:129.
- [11] LI R R. Shashibiya: Staging Shakespeare in China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228.
- [12] 陈世雄. 三角对话:斯坦尼、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6.
- [13] 苏民. 论焦菊隐导演学派[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172.
- [14] 高行健. 戏剧革新家林兆华[M]//林克欢. 林兆华导演艺术.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4.
- [15] 李伟民. 追求真善美之永恒:曹禺对中国莎学的卓越贡献兼及中国莎剧演出[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0(3):79.
- [16] 高行健. 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 [17] 黄佐临. 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舞台演出的展望[M]//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 莎士比亚在中国.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13.
- [18] 陆谷孙. 帷幕落下以后的思考[M]//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 莎士比亚在中国.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 [19] CHEN X M. A “Wildman” between two cultures: Some paradigmatic remarks on “influence studies” [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1992 (4):397.
- [20] 周宁. 比较戏剧学: 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25.
- [21] 童道明. 于是之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J]. 新世纪剧坛, 2013(3):42.
- [22] 徐晓钟, 谭霈生. 新时期戏剧艺术研究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219.
- [23] 于是之. 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5:11.
- [24] 林兆华. 导演小人书: 做戏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 [25] 刘平. 传统的不“旧”新潮的不“新”: 二〇〇一年北京话剧舞台演出感言 [J]. 戏剧之家, 2001(3):4.
- [26] 孙辉. 迷失的宿将 [J]. 艺术评论, 2005(7):62.
- [27] LIN W Y. Lin Zhaohua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Huaju [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2006.

(上接第30页)

- [7] SEBESTIK J. The rise of the technological science [J]. *History and Techn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83(1):25.
- [8] ROPOHL G. Knowledge types in techn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 1997(7):65.
- [9] 拉普. 技术哲学导论 [M]. 刘武, 等译.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4.
- [10] SCHATZBERG E. Technology: Critical history of a concept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 [11] 罗特. 马克思论技术变革: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考察 [J]. 张福公, 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38.
- [12] 吉田文和. 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和马克思 [M] // 苑洁. 《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9.
- [16] 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 [M]. 韩连庆, 曹观法,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引用格式: 濑户宏. 蜷川幸雄的戏剧导演艺术: 基于其莎士比亚作品[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4): 83-89.

中图分类号: J805; I05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1.04.011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1)04-0083-07

蜷川幸雄的戏剧导演艺术

——基于其莎士比亚作品

Ninagawa Yukio's theater directing art

——Based on his Shakespeare works

濑户宏

SETO Hiroshi

摄南大学, 大阪 寝屋川

摘要: 蜷川幸雄是日本著名戏剧导演, 当代戏剧的代表人物之一, 莎士比亚戏剧是他导演作品的最重要内容, 占到了20%左右。蜷川幸雄打破了之前日本新剧(话剧)以英国舞台演出为正统的莎剧演出的做法, 创造性地实现了更接近日本观众的演出形式。蜷川幸雄导演莎剧时所持的核心观点是莎士比亚作品内容不是外国的故事, 而是日本人自己的故事。蜷川幸雄的莎剧作品在日本获得了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 对在日本普及莎士比亚作品作出了很大贡献, 也在以欧美为主的外国得到了高度评价, 告知欧美戏剧界莎剧还有另类的演绎形式, 丰富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舞台演出形式, 促进了日本与欧美国家的文化交流。蜷川幸雄所导演的莎士比亚作品是日本人探索怎样演出莎剧的成功典范, 笔者相信这对中国戏剧界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蜷川幸雄;

莎士比亚戏剧;

日本新剧

蜷川幸雄(Ninagawa Yukio, 1935—2016年)是日本著名的戏剧导演,当代日本戏剧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在中国很少演出过,但在中国也慢慢受到了关注,已经出现了几篇研究他的中文学术论文^[1-4],蜷川幸雄的自传性散文集《千刃千眼》^[5]也已在日本公开出版。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很多,有近一百部,其作品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从古希腊悲剧到当代欧美戏剧,从日本传统戏剧到当代日本戏剧,其中莎士比亚作品是蜷川幸雄导演作品的最重要内容,占到了20%左右。本文拟主要研究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概要和导演特色,探讨其执导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特征以及在日本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下文简称“莎剧”)的意义。

一、蜷川幸雄的戏剧生涯

蜷川幸雄1935年10月15日生于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川口市是靠近东京的一座小工业城市。蜷川幸雄的家庭是经营服装店的,他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是末子,家庭虽不富裕,但也不算贫穷。蜷川幸雄的母亲喜欢看戏,经常带着幼小的蜷川幸雄去东京中心的剧场看戏。

1955年,蜷川幸雄高中毕业后想要成为画家,便报考了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系,但没有考上。一个偶然机会,蜷川幸雄看到了剧团青俳演出的《制服》(安部公房的处女作剧本),受此影响,他开始向往戏剧,成了剧团青俳的研究生(养成班学生),从此系统地学习了新剧(话剧)的表演。当时俳优座、文学座和剧团民艺被称为日本三大新剧团,青俳剧团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剧团,地位居三大新剧团之下。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新剧主要是指所谓的现实主义戏剧,尤其是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很深,表演方式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当

时在包括新剧团成员的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左翼思想很流行,蜷川幸雄也受此影响,参加了这方面的运动。

那时对新剧主流不满意的年轻戏剧人慢慢多了起来,有的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演戏的做法不满,有的是对新剧团的不民主作风不满,他们之中有些人组建了自己的小剧团,但由于经济实力不够,无法租用正规剧场,只能租赁地下室等小空间,所以他们的演出被人说成是“小剧场戏剧”或“地下戏剧”。蜷川幸雄也慢慢地对剧团青俳感到不满意,于是,在1968年他退出了剧团青俳,创立了现代人剧场,退团的直接原因是他希望自己当导演。他的朋友清水邦夫为他写了剧本,但剧团某些领导不允许他当导演,他们认为,能当导演的人都是表演能力非常出色的人,要不然演员会不听你的话,而蜷川幸雄的表演能力“很差”。创立现代人剧场后,蜷川幸雄导演了清水邦夫的作品《真情洋溢的轻薄》,这是蜷川幸雄真正第一次导演的作品。《真情洋溢的轻薄》的演出一炮走红,蜷川幸雄也一跃成了“地下戏剧”的旗手。现代人剧场继续演出清水邦夫创作、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后来蜷川幸雄在回忆现代人剧场时说:“在剧场外面,新左翼的示威队经常跟警察机动队冲突。我们也参加示威,同时做舞台演出。排练场经常放着头盔。《真情洋溢的轻薄》的导演助理有四个,他们大部分是极左派学生……斗争一直都是失败的,但当时还可以维持。不久我们就陷入了僵局。”^[6]现代人剧场后来慢慢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1971年解散了。1972年蜷川幸雄和伙伴们创立樱社。樱社继续演出清水邦夫创作、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但蜷川幸雄他们很快发现观众变了,这表明日本“政治的季节”已经过去。

1974年春天,东宝公司邀请蜷川幸雄导演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一次偶然的邀请,选择《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莎剧的是东宝公司的制作人,而不是蜷川幸雄本人。因东宝公司邀请的外国导演有事不能来日本,但剧目和演员已经定了,所以东宝公司要找别的导演,便跟蜷川幸雄联系了。蜷川幸雄认为换一下环境也很好,《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工作结束就回樱社,所以接受了邀请。但是蜷川幸雄导演商业戏剧引起了樱社成员的尖锐批评,因为樱社演出的作品内容都是反映参加左派斗争青年的苦闷的,从樱社成员的眼光来看,蜷川幸雄参与商业戏剧是向资本主义演出公司投降的不可容忍的行为。那年夏天的一天,樱社成员彻夜开会讨论蜷川幸雄参加商业戏剧的是非。而蜷川幸雄坚持接受商业戏剧的导演邀请,其他成员都予以反对,结果樱社解散了。

幸好《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蜷川幸雄的第一部商业戏剧演出作品比较成功。此后,蜷川幸雄基本上在商业戏剧演出中担当导演。但樱社解散事件给蜷川幸雄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创伤,此后在好几次谈及此事时,他都表示再也不谈政治问题了。

此后,蜷川幸雄的事业发展得很顺利,很快成为商业戏剧领域的明星导演,到了1970年代末,蜷川幸雄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一些著名演员,还闻名海外。1983年,由蜷川幸雄导演的古希腊悲剧《美狄亚》在雅典和罗马演出。这是蜷川导演的作品首次在海外演出,演出很成功。1983年,蜷川幸雄的名气在希腊还很小,所以演出场所是雅典郊区的剧场。第二年蜷川幸雄又受到邀请,这次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剧场演出。以后几乎每年他都做海外演出,且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85年《NINAGAWA 麦克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爱丁堡戏剧节演出,蜷川幸雄赢得了很高的评价,1987年该剧在伦敦演

出。蜷川幸雄获得世界性的高度评价就是从《NINAGAWA 麦克白》的成功演出开始的。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1983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在海外演出,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在中国内地演出(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演出过)。2018年MUSASHI《武藏》在上海演出,这是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内地演出。1993年,蜷川幸雄当上了桐朋学园大学短期大学部(现在的桐朋学园艺术短期大学)戏剧专业教授,在2003—2009年任该校校长。

1998年,蜷川幸雄受邀任彩国埼玉艺术剧场的莎剧演出的艺术总监。这对蜷川幸雄导演莎剧来说十分重要。彩国埼玉艺术剧场是埼玉县设立的剧场。以前商业戏剧中演出莎剧时不得不考虑票房收益,所以不敢演出历史剧等日本人比较陌生的剧目,但彩国埼玉艺术剧团不需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可以演出所有莎士比亚作品。彩国埼玉艺术剧场首次上映的莎士比亚作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1999年蜷川幸雄担任东京涩谷文化村剧场的艺术总监,这是个商业性大剧场。2006年蜷川幸雄升任彩国埼玉艺术剧场的最高艺术总监,趁这个机会他创立了埼玉金色剧场,这是一个由55岁以上的演员组成的剧场。2009年他还创立了埼玉下一代剧团,这是一个由20多岁的年轻演员组成的剧团。埼玉金色剧团、埼玉下一代剧团都演出了蜷川幸雄导演的莎剧,而且都获得了高度评价。

2010年日本政府颁授给蜷川幸雄文化勋章,这是日本文化界最高的荣誉。2016年5月12日蜷川幸雄因病去世。据说在他去世的病房中,放着三本要演出的剧本,其中一本是《哈姆雷特》。2016年5月16日,日本为蜷川幸雄召开了追悼会,戏剧界有关人士、戏剧爱好者等1344人参加,很多电视节目也做了专题报道。

对于一个戏剧导演的离世,日本社会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

二、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之概况和特色

上文已说过蜷川幸雄导演的作品有近100部。根据日本著名戏剧评论家扇田昭彦的统计,其中,莎士比亚作品18部*,清水邦夫作品14部,井上厦作品5部,唐十郎、秋元松代和古希腊悲剧作品各4部,以及契诃夫作品3部等^{[7]13-16}。

由此可知,蜷川幸雄导演的最多的剧作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其次是清水邦夫的,对其他剧作家的作品显然导演的数量不多。从蜷川幸雄选择导演作品的倾向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一,他导演的作品主要是欧美的经典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其二,他主要导演同时代的日本剧作家作品,这些剧作家大多是新剧、非主流剧作家和地下戏剧的剧作家。也有蜷川幸雄几乎不导演的作品群,主要有易卜生等作家的自然主义作品、木下顺二等日本新剧、主流剧作家的作品(所谓现实主义作品)、音乐剧和情节剧等纯娱乐性作品、布莱希特的作品、日本以外亚洲国家的作品(2008年导演了《霸王别姬》,这是根据李碧华的小说改编的,不是纯粹的亚洲国家戏剧作品)。

蜷川幸雄不喜欢所谓现实主义作品,这与他所走的戏剧道路有关,因为他是从反对日本新剧主流即所谓现实主义戏剧起家的。蜷川幸雄不喜欢布莱希特的说教作风。他不导演音乐剧和情节剧,这有点意外,因为商业戏剧很大部分是娱乐性很强的音乐剧和情节剧。蜷川幸雄虽然是商业戏剧的重要导演,但他不喜欢纯娱乐性作品或讨好观众的作品,他更重视作品的

艺术性,强调要把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自如地运用华丽的灯光、音响效果和奇观场面吸引观众。他的一些成功作品实现了票房收益和作品艺术性极高这两种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戏剧价值的完美结合。蜷川幸雄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尊敬,其原因就在这里。蜷川幸雄多次谈到讨厌僵化的写实表演,重视表演的真实性,强调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蜷川幸雄说他并不否认真实的写实表演,而是讨厌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新剧的表演,如日本新剧的启蒙性的、居高临下的说教。他尤其讨厌当时日本演员表演欧美戏剧、模仿欧美人的表演。他认为这是假表演。从这一点看,蜷川幸雄还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为了激发演员的内在情感,蜷川幸雄经常在排练厅辱骂演员,有时还向演员扔烟灰缸。

三、日本接受莎士比亚作品的历史概要

在讨论蜷川幸雄导演的莎剧以前,我们先要了解莎剧在日本演出的历史。莎剧在日本演出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户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到1911年前后,第二个阶段是1911年(文艺协会《哈姆雷特》演出)到1975年前后,第三个阶段是1975年(莎士比亚剧场)到现在^[8]。

第一个阶段是在日本缺乏西方文化熏陶的环境下根据自己的理解接受莎士比亚的阶段。这个时候日本新剧尚未出现,演出莎士比亚作品的戏剧形态是歌舞伎和新派剧。

第二个阶段是以新剧(话剧)演绎莎士比亚作品的时代,以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莎剧演出、解释为正统,认真严肃地模仿、移入莎剧。通过

* 这是截至2010年的数据,截至蜷川幸雄逝世时,他一共导演了32部莎剧。

这些活动,日本人已经能够从本质上理解莎士比亚作品。模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在舞台上用本国语言表现作为异域文化的西方剧本,毕竟需要相当多的知识储备并付出巨大心血。

第三个阶段是脱离以西方为正统的束缚,根据日本人自己的理解演出莎剧的阶段。这一阶段,莎士比亚从“神仙”变成了“邻居”,其作品也从“西餐”变成了“日餐”。1973年彼得·布鲁克导演的《仲夏夜之梦》在日本演出,这次演出多用空中秋千、转飞盘等民间曲艺的手法,打破了以前正规的莎剧演出方式,给日本戏剧界带来很大冲击,日本戏剧界认识到了莎士比亚作品可以自由地演出。蜷川幸雄在谈及1973年彼得·布鲁克的《仲夏夜之梦》演出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时说:“布鲁克的舞台给了我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这样自由地以现代戏剧的方式演出莎士比亚作品,我很吃惊。知道在演出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要演什么就可以演什么,我感到了一种大解放的气氛,但也觉得布鲁克的导演过分简练。”^{[7]95}

1975年出口典雄主管的莎士比亚剧场开始演出莎剧,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到来。在莎士比亚剧场里,一些年轻的无名演员穿着牛仔裤、T恤衫等便服演出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在东京涩谷的咖啡店里每个月连续五天左右演出了莎士比亚作品。出口典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导演莎士比亚所有剧本的导演。蜷川幸雄也是代表这一阶段的导演。目前,莎剧及其相关作品可以说基本上每天都会在日本的某个剧场演出。

四、蜷川幸雄导演的莎士比亚作品之特色

上面我们谈到蜷川幸雄导演莎剧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1974年导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以前,蜷川幸雄没有导演过莎士比亚作品。那么,为什么莎士比亚作品成为蜷川幸雄的重要导演对象呢?蜷川幸雄在现代人剧场、樱社时代已经很喜欢舞台上要出现群众的做法,这种群众不是理想化的纯洁的人民群众,而是包含着下层的、杂乱的、几乎被近现代社会所遗忘的群众。在1974年《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蜷川幸雄也突显出群众剧导演的魅力。他通过导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能发现了莎士比亚作品是可以发挥自己才华的作品,有其自由发挥想象的余地。这是后来莎剧成为他的重要导演对象的理由。这里也有受1973年彼得·布鲁克导演的《仲夏夜之梦》影响的成分。一次偶然的成功决定了蜷川幸雄以后的戏剧道路。

蜷川幸雄说他不喜欢像现实主义戏剧那样把现实如实地演绎的戏剧,所以他很喜欢莎士比亚的包含着很多现实主义戏剧丢失、抛弃、抹杀某些东西的作品。他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日本人(非西方人)怎样演出莎士比亚作品。他还说:“原来莎剧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是在日本本来没有的戏剧,还有(因为主要是新剧初期人士的爱好)这种演出成了日本戏剧的一种规范。因此在日本演出莎剧时不得不需要两种拆毁,除了拆毁移植的原型之外,还要打破没意思的规范。”^{[9]36}蜷川幸雄所说的“日本戏剧的一种规范”就是笔者所说的日本接受莎剧的第二个阶段的演出形态,即以西方的莎剧演出和解释为正统的莎剧演出。蜷川幸雄认为这是“贫血”的莎士比亚作品。

蜷川幸雄认为莎士比亚作品内容不是外国人的故事,应该是日本人自己的故事。基于这种看法,尤其是在他当商业戏剧导演的前期,他用日本风格的东西把舞台道具、时代背景都换成了日本的,但台词一句也没变。蜷川幸雄导演的莎剧可以说是日本化(本土化)和国际化、全

全球化的结合。他执导的舞台不是讨好欧美人的日本趣味,而是日本化的舞台和莎士比亚作品本质紧密结合的产物,所以很受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观众的欢迎。不过笔者认为,虽然蜷川幸雄讨厌和批判第二个阶段的莎剧演出,即新剧的莎剧演出,但是有了第二个阶段的基础之后,蜷川幸雄才能导演好自己的莎剧作品。

上面已经谈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蜷川幸雄第一次导演的莎士比亚作品。蜷川幸雄认为过去的导演只注意优雅感,而他注意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写的是十几岁少男少女的青春冲动和狂奔,是燃烧的身体和灵魂的故事,其要表现青春的疾驰感。蜷川幸雄回忆接受东宝公司的邀请时说:“为什么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因为从年轻时候我被这个故事奇妙地吸引着。如果有人问我被吸引的原因,那我只能回答,是那样爱着别人、那样非常快地死去的爱情的速度……所以我导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成了疾驰的爱情故事。”^{[9]8-9}

1974年《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演时市川染五郎扮演罗密欧,中野良子扮演朱丽叶。首演以后,1979年重演、1998年第三次演出、2004年第四次演出。第三、第四次演出的道具变得简朴了,第四次演出时道具都贴着无数年轻男女的照片,这些年轻男女都是为爱情自杀的。

蜷川幸雄前期导演的莎剧作品的代表作是《NINAGAWA 麦克白》,1980年首演。麦克白由平干次朗饰演,麦克白夫人由栗原小卷饰演,演出背景改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16世纪后期),就是日本的战国时代,服装都是当时日本武士的衣服,然而台词没变。演出开始后,两个老妇人从观众席走上舞台打开佛龕,情节故事就在佛龕里展开,演出结束后两个老妇人关闭佛龕走下观众席退场。蜷川幸雄在谈到安排佛龕的缘由时,说:“我回老家在佛龕前焚香,关

了佛龕的小门。那时我从像网眼的小门空隙看见了佛龕里面。我觉得:对啊!《麦克白》的登场人物大都死了。我们面对佛龕时唤起死者,就好像子女在跟死者对话。如果想到这个戏是现在的我们窥视祖先的故事或者是反映我们怀念祖先的心理的,那么在佛龕里演出《麦克白》就是给普通日本人传达这本剧本的意义的有效办法。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灵感。”^[10]

在《NANAGAWA 麦克白》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樱花。勃南森林被改为樱花,第五幕马尔康等的士兵背着樱花前进。蜷川幸雄说樱花是代表日本的国花,自己觉得樱花有死的气氛。

蜷川幸雄后期所导演作品的舞台道具是简单化、抽象化了,但“莎士比亚作品是日本人自己的故事”这种观点没变。虽然不用日本化的道具,但是演员和观众也能理解导演的意图。1998年蜷川幸雄担任彩国埼玉艺术剧团的莎剧演出的艺术总监,以后陆续导演了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蜷川幸雄在彩国埼玉艺术剧场第一次导演的纪念性作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次是他自己选择的,可见蜷川幸雄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喜爱。2013年演出的《威尼斯商人》,也属于彩国埼玉艺术剧场的莎剧演出,那是蜷川幸雄导演的《威尼斯商人》的首演。这次演出跟平常的莎剧演出不同,是与著名歌舞伎演员四世市川猿之助的合作,由他扮演夏洛克,其他演员都是男性,女性角色也是男扮女装的。《威尼斯商人》基本上把夏洛克表现为坏人,用歌舞伎的演出技巧来加以表现。

遗憾的是因蜷川幸雄逝世,他只导演了莎士比亚的32部作品。2018年新的艺术总监吉田钢太郎(彩国埼玉艺术剧场莎剧的主要演员之一)到任后,继续导演剩下的莎士比亚剧本,到2021年演出了《终成眷属》,完成了所有莎士比亚剧本(共37部)的演出。

五、结语

蜷川幸雄打破了之前日本新剧(话剧)以英国舞台演出为正统的莎剧演出的做法,创造性地实现了更接近日本观众的演出形式。蜷川幸雄导演莎剧时所持的核心观点是莎士比亚作品内容不是外国的故事,而是日本人自己的故事。蜷川幸雄的莎剧作品在日本获得了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对在日本普及莎士比亚作品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在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国家得到了高度评价,告知欧美戏剧界莎剧还有另类的演绎形式,丰富了莎剧的舞台演出形式,促进了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蜷川幸雄所导演的莎士比亚作品是日本人探索怎样演出莎剧的成功典范,笔者相信这对中国戏剧界也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恩平.“成长”于千眼千刃:管窥蜷川幸雄导演的自我越界[J].上海艺术评论,2018(2):28.
- [2] 野田学.蜷川幸雄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镜像和文

化错位[J].朱凝,译.黄觉,校.戏剧,2009(4):43.

- [3] 赵雁风.古希腊戏剧在日本的跨文化编演:以蜷川幸雄的《美狄亚》舞台呈现为中心[J].当代比较文学,2021(1):254.
- [4] 韩煦.极简风格与激情万象:从导演视角谈蜷川幸雄《哈姆雷特》的舞台美术设计[J].装饰,2021(2):128.
- [5] 蜷川幸雄.千刃千眼[M].詹慕如,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 [6] 蜷川幸雄.千のナイフ、千の目[M].日本东京:紀伊國屋書店,1993:38.
- [7] 扇田昭彦.蜷川幸雄の劇世界[M].日本东京:朝日新聞出版,2010.
- [8] 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剧接受史[M].陈凌虹,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 [9] 蜷川幸雄.闘う劇場[M].日本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9.
- [10] 秋島百合子.蜷川幸雄とシェークスピア[M].东京:角川書店,2015:17.



引用格式:黄荣杰,时树菁. 高校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的融合探析[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90-96.

中图分类号:G64;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1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90-07

高校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的融合探析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and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黄荣杰¹,时树菁²

HUANG Rongjie, SHI Shujing

1. 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2. 南阳师范学院 党委宣传部,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志愿服务内含的志愿精神及特有的育人意义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国家与高校的重视,志愿服务日益成为高校立德树人、人才培养的有效载体。高校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可以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助推其成长成才;能够推进高校实践育人与整体育人,提高办学质量。审视高校志愿服务现状,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缺乏深度认知、志愿服务运行机制不健全、志愿服务整体质量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实现高校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的融合,应当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明确志愿服务对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优化高校志愿服务管理机制,确保志愿服务对人才培养的良性运行;完善高校志愿服务保障机制,确保志愿服务对人才培养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

高校;
志愿服务;
人才培养;
融合

[收稿日期]2021-07-18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重点项目(2019SJGLX129)

[作者简介]黄荣杰(1964—),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时树菁(1965—),女,河南省南阳市人,南阳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当今世界人才竞争在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愈加凸显,人才培养成为高校的首要职能与神圣使命,高等教育应把着力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的问题作为核心工作,以人才培养水平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尺。新时代背景下培养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必须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摒弃传统教育理念、革新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不仅要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实践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强化社会实践育人,提高实践教学比重,组织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建立健全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1]。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实践育人与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大学生志愿服务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协同融合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拟梳理高校志愿服务发展概况,阐述高校志愿服务对于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针对高校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志愿服务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的路径,以进一步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一、我国高校志愿服务发展概况

在我国,志愿服务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潮流,但现代意义上的志愿服务活动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直至2008年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后,志愿服务活动才开始广泛受到国家与社会的推崇。志愿服务并非形式意义上的义务劳动,从深层次上看它更是一个国家公民美德的彰显,是一个国家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提出,“要把志愿精神作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2]。共青团十八大报告也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给予充分重视,对志愿服务精神在我国青年培养与高校人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予以高度肯定。中共十九大则特别提出“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3]。

志愿服务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起步较早,萌芽于工业革命初期,后来为挽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重大破坏,便出现了一大批专业从事一定人道主义服务的志愿者,此时的志愿服务还主要处于国家与政府间的活动层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志愿服务活动逐渐生活化,也开始步入系统化、组织化轨道,志愿服务意识不断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志愿服务活动开始纳入欧美国家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多数国外高校都十分重视实践教学,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志愿服务被视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效形式。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了“服务学习”,将其视为一种开放体验式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旨在在课堂教学与社区服务相结合中将学生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取新的知识。英国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儿童课业辅导、社会劳工就业服务、弱势群体帮扶等公益性活动。日韩等国也将志愿服务视为高校育人的重要载体。日本多数高校专门设立志愿服务课程并将其纳入必修课程,同时设立志愿服务中心,高校学生志愿者常常成为日本抗震救灾的重要力量。韩国将大学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教育科目,规定学生一年需要参加40小时以上的志愿服务^[4]。

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志愿服务起步较晚,系统化、规范化程度还不够高,但所取得的成效是可喜和巨大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梦想、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5]我国将志愿服务看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各高校都把志愿服务视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部分高校还创建了体现自身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例如,吉林大学以志愿服务活动作为立德树人的平台,提出“让志愿服务成为每个吉大人生活方式”的口号;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将志愿服务列入本科生必修的实践类课程,并配备相应的教材;南京理工大学成立“兰小杉”志愿服务队,并协同其他社会力量设立“兰小杉”志愿服务基地,为大学生参加支教等社会公益事业保驾护航;东北师范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打造出了“红烛志愿者协会”这一全国示范性志愿服务队伍,并实施了诸如“关爱自闭症儿童”“和谐社区”等志愿服务专项计划;南阳师范学院定期开展“大手牵小手·志愿伴成长”志愿服务活动,将专业知识与志愿服务活动有机融合,广泛传播志愿服务精神,积极服务南水北调这一世纪大工程。总之,从政策上看,我国对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高度支持的;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高校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协同融合成效明显,发展空间巨大。

二、高校志愿服务之于人才培养的意义

高等教育不仅在于传授书本知识,更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志愿服务已成为当今高校公认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与载体。以志愿服务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已成大势所趋,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前景不可估量,对高校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1. 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助推其成长成才

其一,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思想道德品质是一个人成长成才之关键,若思想道德不过关,其对社会的危害将是巨大的。志愿服务内含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告诫广大青年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第一粒扣子”更重要的就是指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志愿服务是出于自觉自愿,无偿地为他人与社会付出自己的体力、智力等的社会性服务活动。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是一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在奉献中能获得一种价值感,在传递爱心、传播文明中能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能体会到帮助他人的快乐,有助于帮助大学生形成一定的道德认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二,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可不断提高实践创新能力。志愿服务本身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育人方式,大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可使他们走出象牙塔和纯知识的理论课堂,使自己所学知识发挥实际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如运用得恰到好处,便会进一步增强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信心与热情,即使运用得不够理想也能促使他们检视自己的不足。志愿服务活动的日渐专业化、知识化,促使大学生努力加强理论知识储备,并在实践过程中增强知识转化应用的能力,促使理论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6]。高校志愿服务是一项组织化、系统化的活动,在活动开展之前学生需进行协商并精心设计活动内容,这会在潜移默化中锻炼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与创新能力。此外,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可使他们切实深入社会,志愿服务活动所涉及的关系具有多元化特征,这就需要他们不断

切换身份以更快适应社会上的各种角色,从而增强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

2. 推进高校实践育人、整体育人,提高办学质量

其一,高校志愿服务是高校实践育人的创新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如何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实现实践育人、整体育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绝不是课堂上能说会道而出了校园真正遇到问题就束手无策的学生。在校园中,大学生接受的更多是课堂知识,接触的人更多是同学和老师,缺乏对社会的全面认识,思想往往比较单纯。志愿服务作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学生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帮助学校更加高质量地完成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师范专业的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去做支教,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增强自己的职业认同感;医学专业的学生可在校外进行义诊,这既可为学生提供接触不同患者的机会,又可为学校节省专门组织实习的资金与精力。

其二,高校志愿服务是高校整体育人的有效模式。高等教育不仅要紧抓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也要注重学生发展的整体性,扩大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各项潜能,促进其身心、情感、智力等全面发展。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不能只具有单一的数理思维,也要培养其一定的人文素养;文科专业的学生不能只具备人文社会知识,也要相对了解自然科学常识。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往往需协调各方面人才,这需要志愿者提前了解本专业以外的知识。例如,在看望孤寡老人的志愿活动中,大学生需要学些简单的医疗保健知识或其他音乐戏曲表演知识;在关爱残障儿童志愿活动中,大学生需要了解一些手语或心理学知识。这些都有利于高校从整体上培育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整体育人是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的一大特色,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必须整合社会一切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最大化,形成“高校+”的育人机制,充分调动高校、社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资源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实现由单维教学向双维、多维互动教学转变,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三、高校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融合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缺乏深度认知

随着社会和高校志愿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大学生对志愿服务虽有了相对认知,但仍存在很大一部分学生出于一些特别目的被动地参与这一活动的现象,这体现了对志愿服务活动的意义缺乏深刻认知。在人们的意识中,志愿服务是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抑或是基于某一信仰而进行的慈善活动,其实志愿服务活动是社会活动中的一项体现社会责任感的活动^[7]。现实中不少大学生简单地把志愿服务活动理解为帮助弱势群体免费做好事,还有部分学生把这一活动当作赚学分、赚资历、评优评先的一种手段,更甚者是看别人做这一活动觉得好玩儿便盲目跟风。例如,为了搞形式主义的宣传,养老院老人的脚同一天内被各种形形色色的志愿者洗了十几遍,做好事的条幅一拉,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便一哄而散,这显然是把志愿服务的意义狭隘化了。这样一来,“新鲜感”一旦消失,志愿服务活动便很难持续下去,最终也会降低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2. 志愿服务运行机制不健全

高校大学生虽然大多数已步入成年阶段,但由于绝大部分时间居于校园内,社会接触面比较窄,因此高校志愿服务要想实现其育人效

果最大化,健全有效的运行机制尤为必要。目前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大多由学校志愿服务类型的社团和各个二级学院学生会志工部负责,组织建设与管理相对薄弱,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首先在组织机制上,大多数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学校与二级学院以及二级学院之间缺乏沟通与联系,导致志愿服务活动有时出现重叠现象;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往往也是以临时性的通知为主,并没有将活动的特色与志愿者的个性相匹配。其次在指导机制上,活动开始前需要精心筹划,活动进程中需要各种保障,活动结束后需要进行总结,这些工作则需要专门的老师进行指导,需要对志愿者进行培训。然而很多高校的志愿服务全程大多由学生自己进行,缺乏相应的指导。另外,很多高校志愿服务缺乏相应的监督与保障机制,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缺乏经费保障,在活动过程中也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同时,对优秀志愿者也没有专门的激励举措。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志愿服务的专业性与可持续性,制约了高校志愿服务长效育人机制的构建。

3. 志愿服务整体质量不高

目前我国高校志愿服务往往以捐款救灾、支教助学、探望孤寡老人、关爱残障儿童等形式开展,尽管这些为大学生开展校外实践活动提供了难得的途径,但是久而久之也会形成惯性思维,并因缺乏活动形式的创新性,没有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色与个人所长将活动内容多样化,在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上不能达到最佳优化状态。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往往是在学校周围,不能形成广泛的覆盖面;不少志愿服务活动缺乏接续性与持久性,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抱着走马观花式的心态,形式主义色彩浓厚。此外,一些活动组织者对志愿服务并没有做好

前期准备,对服务对象没有充分了解与调研。比如,在养老院探望老人活动中给老人演唱聒噪的流行音乐、表演时尚的辣舞,这些都不是老人喜闻乐见的节目;在关爱残障儿童活动中,没有考虑他们的心理状态,无意中会对他们造成心理伤害。以上种种现象都会损害志愿者的良好形象,既挫伤了大学生持续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又背离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的,反映出高校志愿服务活动质量亟待提升。

四、以志愿服务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的路径

以志愿服务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明确志愿服务对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

首先,高校应实现志愿服务课程化。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将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高校志愿服务要想实现育人效果,离不开课堂知识的传授,如果只是单纯地安排学生参加活动,不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因此,以课程的形式强化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将志愿服务纳入高校课程体系,构建科学有效的志愿服务课程体系,是实现高校志愿服务规范化和常态化的重要途径,对在顶层设计上明确志愿服务对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至关重要^[8]。目前,国内已有部分高校专门设置了志愿服务的相关课程,将其作为实践课的重要部分并配备了教材。此外,在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上,学校宣传部门应承担主责,善于利用各种类型的宣传媒介,营造人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例如,可利用广告栏张贴各种志愿服务标兵的海报,充分利用新媒体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进行诸如抗疫志愿医生、学生等人物事迹推送;开展多种形式关于志愿服务的比赛,如征

文、演讲、简报制作等,以此作为志愿服务活动的配套活动,提升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认知度。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明确志愿服务对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既可为志愿服务活动的常态化、高质量开展奠定基础,又可深深契合高校人才培养的内在要义。

2. 优化高校志愿服务管理机制,确保志愿服务对人才培养的良性运行

首先,高校应搭建特色化平台。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高校的志愿服务活动基本上没有建立固定的服务平台,大多由学生会组织或者学生个人联系,并没有建立学校与服务机构的官方联系,这样会造成志愿服务活动的无序性。因此高校应加强与校外机构的联系,开展校地、校馆、校企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建立持久性的志愿服务平台。高校应着眼于从学生专业特色、个人特长出发设置不同的志愿活动,如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去景区作志愿导游,法律专业的学生可以深入街头、社区开展普法宣讲,社工专业的学生则可去养老院慰问老人等。其次,高校应规范组织体系。在学校层面应建立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校团委应成立专门的志愿者工作部定期开展相关活动,二级学院学生组织也应成立志工部并配置主管老师,加强志愿服务与人才培养的组织建设。再次,高校应建立认证与表彰体系。高校应对志愿者进行规范化的统一管理,建立志愿者库进行定期注册,实行积分制,针对优秀的志愿者设置荣誉标兵等奖励,并根据积分对志愿者进行评级,通过对志愿者的奖励来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最后,高校应开展高质量的培训。为了提升志愿服务的专业性,有必要聘请专业性强、热心公益的老师对参加志愿服务的学生进行指导,丰富学生的认知体系,不断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提高志愿服务活

动质量。在这一过程中也应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构建符合新时代大学生思想与行为特点的志愿服务模式,使他们各自发挥所长,创造性地开展喜闻乐见的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从自发走向自觉。

3. 完善高校志愿服务保障机制,确保志愿服务对人才培养的有效开展

不同于社会人士开展志愿服务,高校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目的是在实践活动中贯彻立德树人理念,涉及面包括课堂与课外、学校与社会、教师与学生等多元关系,旨在在志愿服务中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这需要“横纵联动”的多方面支持与保障。首先,应进一步做好高校志愿服务的顶层设计,加强志愿服务的制度保障。国家、省市、高校应针对高校志愿服务现状专门出台关于高校志愿服务培养人才的政策规定与实施意见,实现多方齐抓共管,促使通过志愿服务培养高校人才的模式纳入规范化轨道。其次,应加强对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学生的安全保障。社会充满复杂性,学生认知能力相对薄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必须以保障学生安全为前提。学校层面应成立主抓学生活动安全的领导小组,志愿服务队伍也应专门选出一名安全组长,在活动开始前进行安全教育、安全调研,在活动过程中时刻留心安全隐患。再次,应为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大多数高校都有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经费报销规定,但要实现志愿服务活动的常态化,单一的学校经费来源是不够的。学校可以设立志愿活动专项基金,充分发挥老师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社会多方面筹措资金,如可以在志愿工作服上印上企业的名称以从爱心企业获得捐助,这样既可实现爱心传递,也可在募捐过程中锻炼学生的社交沟通能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7-02-28(01).
-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EB/OL]. (2008-10-09)[2021-06-10]. http://www.gov.cn/irzg/2008-10-09/content_1116582_2.htm.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8.
- [4] 张万兵, 李英, 陈应琴. 高校“服务学习成长”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中国成人教育, 2013(21): 91.
- [5] 习近平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N]. 人民日报, 2013-12-06(01).
- [6] 李娜. 论大学生志愿服务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C]//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全国学校共青团2019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 2019.
- [7] 彭干三, 任源梅. 志愿服务与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模式探索[J]. 中国培训, 2017(7): 22.
- [8] 宋青楠. 推行高校青年志愿服务课程化的可行性研究[J]. 长江丛刊, 2018(22): 194.



引用格式:刘珂,乔诗音.数字经济时代会计专业硕士职业能力提升研究[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97-102.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1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097-06

数字经济时代会计专业硕士职业能力提升研究

Research on improv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in digital economy era

刘珂,乔诗音

LIU Ke, QIAO Shiyin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会计的基本职能、工作方式、工作范围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于会计人员的数字化思维能力、数据挖掘能力、业务综合处理能力都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国会计专业硕士的培养现状还难以适应这些新变化。高等院校应融合数字技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师资配置、课程设置、能力考评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持续提升会计专业硕士的培养质量,以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对高层次会计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

数字经济时代;
会计专业硕士;
职业能力

[收稿日期]2021-06-2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SJGLX058Y);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完善研究)

[作者简介]刘珂(1966—),女,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乔诗音(1994—),女,河南省周口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数字经济时代,现代信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益运用到众多领域和各个行业,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商业环境,社会需要大量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环境的会计人员。此外,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高端会计人才的供给明显不足。国家《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面对当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会计从业人员要持续提升素质和加速转型。高等院校是我国培养高级会计人才的主阵地,如何在会计人才的培养理念、培养方案、培养过程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会计专业人才职业能力与时俱进,受到了多方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当从职业道德、通用能力、专业能力三个维度衡量会计人员能力,高校应培养具备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大数据思维的复合型财会人才^[1]。会计专业硕士(MPAcc)旨在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的会计领域专门人才,近年来的招生规模快速扩张。同时,我国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数量在不断扩大,以满足需求和提高质量为主的一系列研究生教育改革措施正在实施之中。本文拟分析数字经济时代对于会计人才职业能力的最新要求和当前会计专业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职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数字经济时代对会计人才职业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经济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新业态也重塑了会计行业,引发财务会计在基本职能和工作方式等方面发生转变。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会计人才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1. 数字经济带来财务数字化转型

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为财务工作提供了更加精良的分析技术和设备,财务部门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为财务中台,实现了从业务端采集数据到财务端整理和分析数据的全面在线、实时互联,并进一步推动了财务自动化、数字化发展。财务数字化转型使得财务中心成为企业的数字神经系统,使财务会计在会计职能、工作范围、工作方式等方面发生重大转变。

其一,会计职能发生变化。会计职能由原来简单的核算、监督向管理、分析、决策等职能转变。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会计人员的生产力,将其从繁琐的凭证处理、重复的操作性业务中解放出来;财会人员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分析预测、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2]。同时,对于高端会计人才能力素质的研究表明,高端会计人才不仅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积累,而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高端会计人才还在越来越多地承担战略决策、风险管理等职能。

其二,会计工作范围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会计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融合,价值创造和数据分析的作用凸显,会计信息不再局限于财务报表等财务信息,而是将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关联整合。新技术的应用使数据利用范围显著扩张,数据来源从财务系统扩大至整个业务系统,提升了数据处理的全面性和及时性,从而实现信息时效性数据支持,满足各环节需要,帮助提升未来发展的预测能力^[3]。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发展,更加专注于将会计信息进行全范围、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分析。

其三,会计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大数据的应用促使会计工作方式发生转变,会计人员的工作内容不仅从以前的会计核算转向管理和监督,其工作重心也从以前的事后算账前移为事

前评估和事中控制^[4]。数据驱动决策,财务成为真正的大数据中心。会计人员需要精通业财一体化系统,通过数据分析给出专业的判断,为公司的经营决策和风控提供支撑。也就是说,会计工作的重心由反映过去转变为预测未来,由传统会计管理模式转变为信息技术管理,由事中监督、事后分析转变为全过程管控。

2. 财务数字化转型对财务人员提出的新要求

财务数字化转型必然会引起人才、管理、组织、技术和战略布局等诸多领域发生变革。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财务数字化转型日益深化,有关财务人员的数字化技能培养也迎来了新变化和新要求。《2019 中国财务共享服务调研报告》提出,数字化人才短缺、企业内部数据管理能力和流程再造是财务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核心挑战。

其一,数字化思维能力需要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挑战,引起传统会计思维发生战略转变。首先,应转变传统财务数据决策有用观,树立全体数据大局观。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获取、加工、处理、利用范围、方式、报告形式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数据从财务数据扩展到包括业务部门数据在内的全部数据,使数据的类型由单一向多种、由静态到动态转变,会计人员必须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实现传统财务会计向数字化模式转变。其次,财务人员应提升系统性思维能力,准确把握数据间内在的本质联系,理清问题的内在逻辑,透过全局数据发现问题和规律,利用数据分析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再次,应掌握数字经济时代会计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适应数字经济思维变革的要求,培养对数据信息的敏感度,发挥数字经济时代会计在服务价值创造、资源合理配置中的作用。

其二,数据挖掘分析评价能力需要提升。

面对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的数字化,财务人员也需要具备数据整理、分析和挖掘能力。首先,与过去相比,会计人员可以获得和利用的数据量非常庞大,如果会计人员没有一定的数据挖掘能力,就难以从大量的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其次,会计信息的获取来源更加广泛,使得数据信息多种多样,需要专业的技能进行挖掘分析,将有潜在价值的信息转变为当前可用信息,以此提高会计信息处理效率和决策水平。会计人员需要运用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决策树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数据挖掘分析技术,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逻辑推理。再次,除通过掌握数据挖掘、分析处理的职业素质和技术能力外,还需要加强培养会计人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其三,综合业务处理能力需要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的会计工作不仅需要掌握会计学、财务管理学知识,还要对统计学、计算机、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有较全面的了解。对于高端会计人才来说,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备跨专业的综合知识和复合型技能。在业财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会计人员不仅需要懂财务,还需要懂业务、熟知业务流程,才能更好地胜任工作,因此对于会计人员的持续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高层次会计人才重视和加快综合业务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提升,发挥在数据分析、风险控制、决策支持等综合业务方面的统筹协调能力和作用。

二、数字经济时代会计专业硕士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全国会计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9 年度指导性培养方案中,会计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国际化会计专门人

才,并要求具备良好的业务能力、职业道德、管理素养和数据处理等能力。这一培养目标和能力要求顺应了当前会计人才的发展方向,科学合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当前多数培养MPAcc的院校都按照此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和开展教学工作。但是在会计专业硕士的实际培养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一,受当前招生范围和招生规模等因素的影响,MPAcc的生源质量存在差异,部分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本专业素养比较差。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招生时允许跨专业报考,注重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因此,生源的本科专业分布广泛,基础会计知识的掌握情况和专业技能水平参差不齐,部分生源在会计专业基础知识方面比较欠缺。

其二,虽然会计专业硕士培养目标明确,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其与学术型硕士培养的差异化 and 区分度不高,导致会计专业硕士未能完全达到培养目标要求。教学过程中虽然存在实习实践环节,但是各个学校大多以结果导向评估实习实践质量,过程管理和监督不够严格,因而导致实践环节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未达到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水准。

其三,当前会计专业硕士培养计划多为管理会计、财务会计、注册会计师方向,其中主要课程内容为管理学、会计学,缺少数字经济时代所应具备的学科融合知识,表现为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窄;会计专业硕士的国际交流项目数量跟学术型硕士相比也少很多,因而会计专业硕士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战略职业能力也相对欠缺。

其四,专业化程度和导师选拔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符合会计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要求的问题,导致会计专业硕士师资队伍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一些校外指导老师与学生的

沟通交流机会比较少,在对学生的实际培养过程中参与度低,导致校外指导老师有名无实。同时,少部分培养单位为了追求热度和经济效益而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实质上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师资力量,因而培养质量难以保证。

其五,部分培养单位的培养目标没有很好地结合地域和学校特色,对会计专业硕士培养目标的定位不准确,特色不鲜明,而且在培养过程中也没有很好地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及时地融合进人才培养方案并加以实施。

其六,当前教学质量评估过程中几乎没有在校生的有效参与,未能及时地了解在校生的职业能力弱项,同时毕业生职业发展和跟踪反馈等评价机制也不够完善,导致无法及时地对教学质量做出科学评估和对教学方案进行有效调整。

综上所述,由于各培养单位的培养质量和培养水平参差不齐,会计专业硕士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不高、特色不鲜明,当前的培养现状与国家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会计人才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根据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会计人才的需求,结合各个高校的人才供给现状,可以看出,会计专业硕士毕业生的职业能力与社会需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提升会计专业硕士的职业能力迫在眉睫。

三、提升会计专业硕士职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会计专业硕士职业能力培养需要积极融合数字经济时代特征和会计人才职业能力的需求变化,做好自身职业能力提升。高等院校应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师资遴选、课程安排、质量考评等方面进行教改研究和实践探索,保障会计专业硕士职业能力建设,持续提升会计专业硕士培养质量,切实满足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会计人才的需求。

其一,完善学生的基础能力。一是应注重基础专业能力和基础通用能力培养。MPAcc的专业背景差异较大,统一教学必然导致培养质量难以统一的情况出现,因而对于基础专业能力和基础通用能力提升而言,应当对学生的基础能力进行评估,发现学生的强项和短板,因材施教,及时给予专业指导。对于跨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可以有意识地将会计与其他学科融合,让这些学生在熟悉的知识领域学习会计专业知识,使其在学科融合中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培养出有专业特长的毕业生。二是应培养持续学习能力。培养单位除需要做好常规教育科目外,还应注重信息化在线教育、互动教育、大数据实践教育等方式,形成持续化学习,将目标任务、能力建设和服务水平都建立在会计转型新要求上,不断完善基础能力。

其二,围绕职业能力强化实习实践,提升学生的个人素质。一是应完善实习实践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实习实践的过程监督,及时掌握学生动态,真正发挥实习实践环节在学生能力提升中的作用。二是应加强实践课堂设置,实现产学研联合培养。例如,可以到企事业单位参观学习、成立实务研讨项目组,让会计专业硕士更加了解会计实务,训练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战略管理思维,同时在实践中体会会计职业在数字化转型和市场需求变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从而更好地了解职业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

其三,加快知识结构重构,优化课程设置。一是应加快会计专业硕士知识结构框架构建,以能力框架为指引完善人才培养内容和方案。以经济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为导向,针对不同研究方向的会计专业硕士设置不同的知识

结构框架,培养学生的多学科知识体系。结合会计人才需求趋势,加强管理类知识课程,并融合金融、税务、信息处理等跨学科知识。二是应优化课程设置,助力国际化人才建设。会计专业硕士有2—3年的学习时间,学校可以在第一学年构建交叉学科为新型会计类方向,如智能财务分析、审计与咨询、税务会计等,以知识结构重构为主;在第二学年根据研究生自身职业规划,选择性增设国际金融、跨国公司会计等课程,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三是应拓宽边界,基于学科融合进行多角度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多维度思考。依托跨学科融合视角提出的创新性理论,设置创新课堂,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力和多学科融合运用能力。

其四,优化双导师培养考核体系,助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一是应落实双导师制,多维度遴选导师。专业导师应通过课堂教学提升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专业技能水平,通过指导学位论文写作提升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实践导师可以由具备实务经验的校内老师担任,也可以从社会各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专家中选任,实践导师应重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应完善导师考评制度。对于校内导师,可以将其与学术型导师考评分离,把学科竞赛、案例教学、优秀硕士论文等内容纳入专业硕士导师考核晋升的条件之中。同时可以将更多符合时代需要的专业职业能力纳入考评范围。对于校外导师,应制定合作导师管理办法,明确工作职责、职业道德和考核标准,实施过程监督,真正发挥出会计专业硕士双导师培养模式的优势。

其五,定位数字化会计人才,提升数字分析能力。一是应结合时代需要增设前沿课程。目前,涉及数据分析和挖掘的课程还比较少,在预算预测、成本分析、决策支持、数据管理等课程

教学中对理论教学比较重视,对实践教学比较轻视。高校应当结合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优化课程设置,增设特色课程,突出案例教学,让学生了解行业发展态势,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二是应培养数字化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设数据分析课程,掌握 Excel、Python、Stata等量化分析工具,提升对系统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能力。积极配合业财融合、管理集成、财务数字化转型开展人才培养交叉融通创新。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学科竞赛、案例分析等实践环节提升学生的全体数据大局观、数据敏感等数字化思维能力。

其六,加强会计专业硕士培养效果的评估和反馈,持续完善培养方案。一是应优化教学过程监督和教学质量评估。高等院校应做好过程控制和质量监管,期中和期末做好适时评价,同时配合教育主管部门开展各项教学质量评估工作,不断持续改进。二是应建立会计专业硕士在校生能力评价机制。建立以专业评价、综

合能力评价、诚信道德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根据评价结果改进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三是应建立培养单位与毕业生的反馈机制。通过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反馈和交流,持续关注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状况,结合社会需求变化调整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完善高端会计人才培养体系。

参考文献:

- [1] PALL R, OGAN Y. Business intelligence & analytic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focu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2018(6):37.
- [2] 谢诗蕾. 探索信息化时代会计人才培养的转型之路[J]. 财会月刊, 2020(1):81.
- [3] 乌婷, 乔引花. 大数据时代管理会计职业能力建设探讨[J]. 会计之友, 2017(19):38.
- [4] 向传殿. 新时代专业会计硕士人才培养改革探究[J]. 财会通讯, 2021(3):167.



引用格式:赵长太,胡耀文.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初探[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103-108.

中图分类号:B-4;G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4.01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4-0103-06

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初探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ao Delin's philosophy education thought

赵长太,胡耀文

ZHAO Changtai, HU Yaowen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陶德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把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在长达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过很多重要的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其哲学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是基于对哲学与现实之关系的思考而形成的,联系实际与塑造民族精神构成了其哲学教育思想的两个向度;精心编写哲学教育教学教材和积极倡导哲学教育教学改革,是其哲学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
陶德麟;
哲学教育思想;
形成背景;
向度

[收稿日期]2021-06-23

[作者简介]赵长太(1968—),男,河南省正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胡耀文(1996—),男,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陶德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把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在长达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陶德麟对哲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过很多重要的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其哲学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深化我国哲学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推动我国哲学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从形成背景、基本向度和具体实践三个方面深入阐述陶德麟对哲学教育的科学认识和重要贡献,以期为更好推动我国哲学专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提供启示和参考。

一、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以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为背景的。基于对哲学与现实之关系的深刻思考,陶德麟认为,哲学应观照现实,应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人和积极参与者,陶德麟立足于改革这一现实实践,对哲学与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由此形成了其哲学教育思想。

陶德麟认为,改革作为亿万中国人参加的历史活动,不仅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政法财经方面的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还需要哲学。针对改革初期人们对哲学的误解,陶德麟指出,“为什么会出现哲学受轻视的情况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长时间的‘左’的错误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另一条是很多干部群众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缺乏正确的理解”^{[1]236}。在对这两个原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陶德麟指出,问题的根源出在哲学教育上,是一些人接受了一

种错误的哲学观,将哲学与具体科学混为一谈。哲学“揭示的是整个世界万事万物之间最普遍的关系,提供的是解决一切领域中一切具体问题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世界观、方法论”^{[1]240}。哲学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哲学不可能具有各门具体科学那样的应用型功能,我们也不应要求哲学具有这种功能。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哲学没有实践价值的结论。“要知道哲学虽然不能直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但是解决任何具体问题都离不开它,只不过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就是了。”^{[1]240-241}解决具体问题之所以离不开哲学,原因就在于,任何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思想和行动都要受其自身哲学观的支配和制约,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具体问题不但解决不了,反而会使我们的具体行动遭遇挫折、多走弯路,会给我们的具体实践带来重大损失。这就是哲学的功能、哲学的用处。“哲学的这种特有的功能和用处,是任何别的科学都代替不了的。”^{[1]241}

陶德麟不仅对哲学的功能和作用有独到的理解、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且还结合当时改革的具体实际对哲学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陶德麟指出,改革不仅离不开哲学,而且还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问题不在于哲学有没有用,而在于我们今天在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1]245}关于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中的作用,陶德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哲学应通过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为改革的深化开路。这是因为,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开始的,“而观念的变革是要靠先进分子去论证、去宣传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哲学”^{[1]246}。在陶德麟看来,改革虽然与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在性质上是很不相同

的,但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活动。作为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活动,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所以,“它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革命。就一定的意义说,它甚至比过去的革命还要深刻”^{[1]247}。因此,就改革的广泛性和深刻程度来看,没有亿万人民的思想观念更新,是不可设想的,而“要实现这样的观念更新,没有哲学的参与也是不可设想的”^{[1]247}。陶德麟对当时影响改革的旧观念作了概括和分析,他认为,不适应改革需要和要求的旧观念有很多,既有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封建观念和小生产意识,又有多年来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僵化观念,也有长期错误宣传造成的“左”的观念,还有从各种渠道涌进来的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如此等等。陶德麟从改革的现实背景出发,认为“这些陈旧观念不改变,不树立与改革的需要相适应的新观念,我们的改革就将寸步难行。而要更新观念,枝枝节节就事论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非从哲学上加以论证不可”^{[1]247-248}。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哲学,加强哲学专业的建设和教育。

二、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的两个向度

陶德麟从20世纪50年代献身哲学教育事业以来,就一直是将哲学作为实践的向导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者来加以认识和把握的,联系实际与塑造民族精神由此构成了其哲学教育思想的两个向度。

1. 联系实际

陶德麟认为,作为高度抽象的一门学问,哲学是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因此,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不能离开这个逻辑结构和范畴体系。“教学形态要力求符合教学对象的认识规律,概念(范畴)的定义要准确,命题的陈述要清晰,论证要合乎逻辑,而且要联系实

际。”^{[1]311}在这里,陶德麟明确将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要进行理论阐述,而这个阐述要遵循哲学自身的“科学形态”,即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二是要联系实际。这就是说,哲学教育教学不能离开概念、范畴和命题,否则,就不是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要将概念、范畴和命题讲清楚,将其内在结构和规律讲出来。这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不可否认,哲学有其抽象性、逻辑性的特征,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范畴和命题上面,哲学的理论效应会受到极大影响,所以,哲学要联系实际。陶德麟认为,哲学要联系实际是由其自身所包含的现实因素所决定的:其一,哲学的根源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陶德麟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其所研究的总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最普遍的问题,其所关注的总是人们的生活原则、处事态度和思维模式,其所把握的总是社会发展的脉搏,其所反映的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陶德麟认为,哲学“最深的根源还是人们的实际生活”^{[1]103}。这是因为,不仅哲学的问题来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来源于人们的具体实践,而且哲学的问题还要随着人们实际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其二,哲学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智慧的产物。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人们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引起并在解决这个社会需要的实践中实现的。“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2]1036-1037}陶德麟认为,哲学作为哲学,不是纯粹的思想物,而是人类实践智慧的产物。

2. 塑造民族精神

陶德麟认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历来都十分重视哲学。哲学既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

富,又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打下一定的民族烙印。每一个民族在其历史上都创造了属于该民族的哲学,从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创造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涵养和塑造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是陶德麟长期以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陶德麟指出,“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近代又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能不在我们民族精神上打上消极的烙印,有许多东西是同现代的要求相矛盾的。所以确实有一个在原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的要求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任务”^{[1]251}。从这一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出发,陶德麟提出了“用哲学铸造民族的灵魂”^{[2]1028}的重要论断。在陶德麟看来,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不是理性神坛的供品,而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提高全民族的哲学水平,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样重要”^{[1]269}。陶德麟由此指出:(1)中国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变化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来说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引起近现代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不可缺少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1036}(2)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陶德麟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与不断变化的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不停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否则就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3]。

三、陶德麟哲学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

陶德麟不仅在自己60多年哲学教育生涯中对有关哲学教育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教育思想,而且在践行自己哲学教育思想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不仅精心编写哲学教育教学教材,而且积极倡导哲学教育教学改革。

1. 精心编写哲学教育教学教材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约李达畅谈哲学问题,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一统天下”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委托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再撰写一部哲学教科书。接受委托后,李达决定编写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从1961年开始,陶德麟在李达的指导下精心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到1965年10月,完成了该书的上卷的写作任务。1978年,经由陶德麟全面修订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唯物辩证法大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文革”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于1985年荣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德麟又先后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需要而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方面作了新的探索。其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至1994年先后五次修订,共发行一百多万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后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这两部教材均受到高度评价,也都获得国家优秀教材奖^[4]。

进入新世纪,为了推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陶德麟又以首席专家的身份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编写。该教材自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为了更及时、更充分地反映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中宣部、教育部组织课题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分别于2008年1月、2009年5月、2010年5月、2013年7月、2015年8月、2018年3月、2021年7月组织了7次修订。该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对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高校大学生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 积极倡导哲学教育教学改革

陶德麟认为,改革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改革。“我这里说哲学需要改革,不是说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成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说需要对我们多年来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丰富和发展。”^{[1]253}那么,哲学如何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改革要从体系上入手,即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陶德麟对此做了深入分析。陶德麟认为,体系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逻辑关系,即概念与概念之间、命题与命题之间在逻辑上的关系;二是表述体系。无论就哪个方面来说,改革的重点不应是在体系上,而应是在内容上,“过分强调表述体系的重要是本末倒置。即使是内在的逻辑体系,虽然比表述体系重要得多,但同内容比起来还是次要的,因为有什么样的内容,才会有什么样的逻辑结构”^{[1]254}。

在陶德麟看来,我们要对哲学教育进行改

革,首先必须分析和解决作为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性问题,否则,无论我们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也不可能实现对哲学的真正改革。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陶德麟将其概括为:从20世纪30年代始形成的“一整套带有方法论意义的观点”^{[1]255}。陶德麟认为,“这些观点实际上成了阻碍我们改革哲学教学内容的障碍”^{[1]255}。因此,哲学教育教学的改革必须注重以下两个基本方面。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功能问题上,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讲透”^{[1]25}。陶德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的区别在于,它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永恒的、终极的真理,相反,它彻底地否定了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够一直站在人类思维的制高点?就因为它不停顿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用人类最新的认识成果来丰富自己,永远不把自己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1]255-256}陶德麟认为,长期以来,虽然这些道理我们在教科书里、在课堂上都讲了,但是,“问题在于讲得不彻底,往往一落到实处就走样了”^{[1]256},所以,哲学教学内容改革的重点之一应当放在这里。此外,将哲学的功能与具体科学的功能相混淆,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改革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过去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有深刻的教训。”^{[1]256}所以,我们应当从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前提出发,充分把握它“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功能”,而不能“代替别的具体科学”,“不能对具体科学领域中的是非作判决”^{[1]256}。陶德麟抓住哲学的功能就是“提供观察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256}这一本质规定性,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哲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正确方向,避免了庸俗化和绝对化这两个极端的做法。陶德麟将哲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重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一位哲学家对哲

学教育的深刻认识。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上,应科学对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针对学界反对哲学中的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划分与斗争的观点,陶德麟作了科学分析和批判。陶德麟反对将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划分与斗争归结为哲学教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教条。陶德麟认为,哲学教育教学和研究中的这个教条实际上是从苏联沿袭过来的做法,即把唯物与唯心的斗争看成哲学发展的全部内容,把整个哲学史仅仅看作这二者“对战的历史”,“把一切具体的哲学争论、全部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都往这个框框里装”^{[1]257}。“日丹诺夫的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多年来我们在课堂上和讲义里也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了这个观点。”^{[1]258}因此,如何讲清楚哲学史,这也是哲学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结语

陶德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当作自己的终身追求,把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将李达等先辈学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优良学术传统发扬光大,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陶德

麟先生承继了李达优良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范,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其理论研究始终与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相结合,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相联系,力图从哲学上回答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陶德麟在长达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哲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过很多重要的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其哲学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在当下,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陶德麟的哲学教育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指导我国哲学教育教学实践,对于深化我国哲学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哲学专业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陶德麟. 陶德麟自选集[M]. 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2.
- [2] 陶德麟. 陶德麟文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 [3] 陶德麟,何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76.
- [4] 汪信砚. 陶德麟对李达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J]. 哲学研究, 2021(1):14.